关于清除党內右派分子的决定彙編

（三）

（党內文件·注意保存）

中共中央监察委員会办公厅編

出版說明

这本小册子里所搜集的，是文教系統党組織所作关于开除党內右派分子馮雪峯、丁玲等五十五人党籍的決議或決定。这些右派分子是混在党內的阶級異己分子和社会主义事業的叛徒。清除这些右派分子出党，是党的事業的一个大胜利。我們出版这本小册子的用意，就是为了使大家能够通过閱讀这些決議或決定，进一步了解这些人是怎样混入党內或怎样墮落成为右派分子的，以便提高警惕，在“兴無灭資”的斗爭中，善于辨風向，識別香花和毒草，勇于拔白旗，插紅旗。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目　　录

中共人民文学出版社支部党員大会
关于开除馮雪峯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

馮雪峯（原名馮福春，曾用名画室等），男，現年五十四岁，浙江义烏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二七年六月在北平入党，同年十一月及翌年十一月曾兩度失掉党的关系。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底曾在上海任左联党团書記、文委書記、江苏省委宣傳部長。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到中央苏区，曾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副校長。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長征，任野战軍九軍团地方工作組副組長及紅軍大学政治教員。一九三六年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离开了党的組織，回浙江义烏家乡。一九三九年春經中共东南局恢复了党的关系，任东南局文委委員。一九四一年二月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关押在上饒集中营，翌年十一月出獄。一九四三年六月，到重庆恢复了党的关系，此后一直在党的領导下从事文化工作和統战工作。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長。

馮雪峯入党多年，始終对党不忠誠，長期向党鬧独立性，进行宗派活动，曾勾結胡風等反动分子反对党的文艺方針和路綫。近年来，又和丁玲、陈企霞在一起，进行反党的小集团活动，抗拒党的領导，破坏党的統一和团結。当党进行整風时，馮雪峯又大肆放火，鼓励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在此次反右派斗爭中，作家协会党組召开了二十七次扩大会議，对丁玲、陈企霞和馮雪峯等人的反党集团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根据所揭發並査对屬实的材料，馮雪峯的主要反党事实如下：

（一）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派馮雪峯到上海，任务是进行統战工作（包括文艺界）和情报工作，在可能时联系和調查上海地下党組織报告中央。但馮雪峯違反中央的指示，他到上海后，不但不和上海文艺界党的組織联系，反而勾結胡風，假借魯迅之名，挑起"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爭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爭，对上海文艺界党的組織实行宗派打击，造成我国进步文学运动中的分裂局面，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威信和党的政策。为了达到对上海文艺界党組織实行宗派打击的目的，馮雪峯竟不擇手段，拉胡風入党，視为心腹；另一方面却用魯迅的名义，公开写文章，誣陷地下党的同志"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力量""借革命以营私"，並且还惡毒地說："怀疑他們是否系敌人所派遣。"此外，他还假借中央名义，决定停止左联党团的活动。馮雪峯的这些反党活动，給当时处境非常困难的上海文艺界地下党帶来了严重的損害。

（二）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后，在激烈的阶級斗爭和革命高潮面前，馮雪峯却因与个别領导同志意見不合，發生爭执，情緒消沉，竟置党的工作于不顧，擅自脫离党組織，由上海回浙江义烏家乡。在他脫离組織的期間，党的負責同志曾对他多次調遣，他都違抗不去。一九三九年，党給馮雪峯恢复了关系，因为当时形势紧張，曾命令他轉移，馮雪峯仍然違抗党的指示，留在家乡，以致被国民党宪兵逮捕，造成毫無代价的損失。

（三）一九四三年馮雪峯到重庆后，和胡風以及叛徒姚蓬子等关系密切，推心置腹，对党则格格不入。重庆文艺界批判胡風分子舒蕪反党反馬克思主义的論文"論主观"，馮雪峯則坚決为舒蕪辯护。他写了"論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等反党論文，为胡風的主观唯心主义辯护，贊美胡風集团的作品，詆毁进步文艺作品。他公开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文艺路綫，譏笑說："政治性""艺术性"的說法經不起"一連反問三次"，說这样看問題"把什么都弄糟了"。一九四六年，一些党員同志在香港發动对胡風思

想的批判，馮雪峯又公开支持胡風，成为胡風的附合者和辯护者。

（四）全国解放后，党委託馮雪峯主編"文艺报"，他和丁玲、陈企霞勾結在一起，他們不把这些工作看成是党的事業的一部分，反而看成是个人的地盤，是借以和党抗衡的"陣地"。他們抗拒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針，以貴族老爷式的态度，压制新生力量，排斥党內外有成就的作家，使"文艺报"成为离开党的方針路綫的"独立王国"。一九五四年，当党檢查"文艺报"时，馮雪峯採取陽奉陰違的态度，表面上檢討，背后却和丁、陈結合起来，对党进行誣蔑和攻击。他猖獗地說：党檢查"文艺报"和处分陈企霞都是錯誤的，是"妨碍团結"的。

（五）当一九五五年作协党組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展开斗爭，並批判了馮雪峯的反党言行后，馮雪峯便积極参与丁陈集团的反党活动，企圖推翻党檢查"文艺报"的決議，推翻一九五五年作协党組扩大会議的結論。他积極和丁玲共謀策划，要丁玲把所謂丁陈事件"拿到群众里去"，他告訴丁玲說："你最好裝病，就作出一付給人打倒了的样子"。整風时，他还指示陈企霞制造讀者来信，以配合右派分子攻击領导同志。丁玲、陈企霞等企圖公开退出作协，分裂文艺界的計划，也曾征求过馮雪峯的意見。事实說明，馮雪峯已經成为丁陈反党集团的主要分子之一。

（六）去年春天，当資产阶級右派向党瘋狂进攻，天空中烏云乱翻的时候，馮雪峯認为反党的有利时机已到，就猖狂地在会上叫喊"洪水已經冲进了大門"，說"有寃报寃，有仇报仇"，他說"党內对党外要和風細雨，党外对党內不妨暴風疾雨"，"鬧大民主也不要紧"，又說"肃反的錯誤是严重的，現在再也不会有一批人整另一批人了。"他还一再向党外右派分子舒蕪等煽火，鼓励和支持他們向党进攻，被右派分子視为"馮青天"。

也是在右派活动最猖獗的时候，馮雪峯还和右派分子陈涌、唐因、唐达成等籌办同人刊物，企圖以此来搞垮党領导的"文艺

报"，他們拟定的这个同人刊物的撰稿人，大多数都是后来被揭發出来的右派分子。馮雪峯还曾猖狂地說：搞刊物"要在文学上打天下"。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最为嚣張的时候，馮雪峯的反党野心家的面目也就充分显露了。

此外，馮雪峯的修正主义思想，無政府主义与虛無主义思想也是極为严重的。解放前他曾在論文中反对强調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性，他認为胡風所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是"非常好的"。他对党、对社会抱着極端陰暗的心理，他曾說"我們的民族已走上灭亡的过程"，"中国民族的人的素質，已經变得十分'病态'"。肃反运动后，他曾对人說：肃反时他天天准备被捕。匈牙利事件后他又曾表示"人类沒有希望"。他的反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也是他的反动政治思想的一个方面。

以上事实說明，馮雪峯的自我中心的極端个人主义思想已發展到極其严重的程度。他一貫对抗党的領导，反对党的文艺方針，而且坚持錯誤，拒絕改造，一直墮落成为危害党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为了严肃党的紀律，純潔党的队伍，維护党的团結和統一，根据中央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党內右派分子的原則，經支部大会全体党員以20票通过，开除馮雪峯的党籍，並建議行政上撤銷他的作家协会副主席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長的职务，撤銷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保留全国文联委員和作家协会理事，另行分配工作。

一

中共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党員大会关于开除丁玲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六日通过

丁玲，原名蔣冰之，女，湖南临澧人，現年五十三岁，家庭出身破产地主，本人作家。一九二二年参加無政府主义党，不久即退出，一九三〇年参加上海左翼作家联盟，一九三二年春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后，曾担任全国文联党組副書記，文艺报主編，中央文学研究所主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艺处处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丁玲入党多年，始終对党不忠，曾經犯过自首变节，散佈反党言論等严重政治錯誤，全国解放后，她和陈企霞等一起，进行过反党小集团的活动，今年春天这个反党集团又和党外右派勾結，向党进攻，在此次反右派斗爭中，作协党組召开二十七次扩大会議，对以丁玲为首的反党集团进行了斗爭，根据所揭發並查对屬实的材料，丁玲的主要的反党事实如下：

（一）丁玲曾于一九三三年五月，由于其丈夫馮达的告密，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不久便在南京自首变节，並接受特务津貼，与特务顧順章、徐恩曾往来密切，並繼續和其特务丈夫馮达同居。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丁进入陕北根据地，向党隐瞞了自首变节問題，恢复了党的关系。此后，党曾几次审查她的历史，对她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她仍繼續隐瞞，直到一九四三年，丁始作了部分交代，此次，丁才承認其在南京的自首变节行为。

（二）一九四二年，当革命处于困难之时，丁在延安發表了“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等杂文小說，誹謗党的革命，並

且組織与發表了托派分子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反党分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等反党文章，給党的事業帶来重大損失。国民党特务机关曾以“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等文章，作为反共的宣傳材料，加以印發。

（三）全国解放以后，党委托丁玲担任文艺报主編兼任中央文学研究所主任，她辜負了党的委托，驕傲自滿，不把这些單位看作党的文学事業的一部分，不把自己看作是受党委托来担任工作的，却把这些單位看作她个人的資本和地盤，並和陈企霞勾結在一起，以文艺报作为独立王国，进行反党集团的活动，拒絕党的領导和监督，違抗党的方針、政策和指示。到处散播資产阶級腐朽的个人主义思想，提倡驕傲，提倡一本書主义，並狂妄的吹嘘自己，以制造个人崇拜，同时对党內外有成就的作家，採取宗派排斥的态度，破坏文艺界党內外的团結。当党檢查“文艺报”时，她就在背后对党进行誣蔑与攻击。一九五五年作协党組召开了党組扩大会議，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活动，作了严肃的批判和斗爭。会后向中央作了报告，該报告經中央同意並批發各省市委。丁玲不但沒有認眞的檢查自己的錯誤，痛改前非，反而採取兩面派的手法，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党集团的活动。

（四）一九五六年，波匈事件發生以后，国际上出現了一股反共浪潮，特别是今年春天，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以丁玲为首的反党集团認为时局对他們有利便猖獗起来，丁玲和她的丈夫陈明一起，与馮雪峯、陈企霞、李又然、艾青、罗烽、白朗等党內右派分子秘密策划，进行反党活动，同时这个反党集团又勾結“文匯报”的右派分子及江丰反党集团猖狂向党进攻。她到处說，她是“剛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人”，是党內的“貧僱农”，在会議上，蔑視組織，公然要追查过去处理她的問題时的中宣部部長会議的記录，並質問部長办公会議性質，誣蔑党对她的批評是宗派打击，是“政治陷害”，以此煽惑人心。丁、陈反党集团的另一毒辣陰謀，就是企圖公开分裂文艺界，丁玲和陈企

霞等共同密謀在今年七月原来准备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公开制造分裂，登报声明，公开退出中国作家协会。以此打击党的領导和造成文艺界的分裂局面。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丁陈反党集团分子之間又訂立攻守同盟，企圖向党狡賴到底。

上述事实說明，丁、陈反党集团的严重危害性質是在于它反对党对于文艺事業的領导，抗拒党的文艺方針路綫，宣傳資产阶級的文艺思想，並且和党外資产阶級右派互相勾結，破坏社会主义的文艺事業的团結。丁玲作为这个反党集团的首腦，尤其負有严重的主要的責任。丁玲墮落成为反党集团的首腦分子决不是偶然的，她的極端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虽經党屢次教育和挽救，都因她对党一貫採取不老实的态度，拒絕徹底改造，以致在几个革命时期的严重关头，均未經得起考驗，特别是此次資产阶級右派猖狂向党进攻时，她积極勾結党內外右派分子，向党大举进攻，因而完全丧失了一个党員的起碼条件，墮落成为一个資产阶級右派分子。根据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党內右派分子的原則，根据丁玲的反党罪行和她的檢討，为了严肃党的紀律，維护党的团結和統一，經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大会全体党員以一百二十一票一致通过开除丁玲的党籍。並建議行政上撤銷丁玲的作协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員、全国文联委員的职务，取消其原来的行政級别；丁玲的人民代表名义，建議提請人代常委会处理。

中共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党員大会关于开除陈企霞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日通过

陈企霞，浙江省鄞县人，现年四十四岁，家庭出身商人，本人成份职員。一九三三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六年轉党。一九五〇年因乱搞男女关系，受当众劝告处分。一九五五年一月，因拒絕党的領导和监督，受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至今尙未撤銷。

陈企霞自参加革命以来，長期反党反領导，全国解放以后和丁玲等一起，进行反党集团活动。今年春天这个反党集团又和党外右派勾結，向党猖狂进攻，在此次反右派斗爭中，作协党組召开二十七次扩大会議，对以丁玲、陈企霞为首的反党集团进行了斗爭。根据所揭發和查对屬实的材料，陈企霞主要的反党罪行如下：

（一）一九四二年，当革命处于困难之时，陈在延安編过反党的墙报"輕騎队"。並在丁玲的主使之下，經手發表过托派分子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反党分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等反党文章，誹謗党和革命，給党的事業帶来重大損失。

（二）全国解放以后，党委托陈企霞担任文艺报的副主編，他却把工作單位看作个人的資本和地盤，实行發号施令、施展权威的家長式的領导。使文艺报成为独立王国，狂妄蛮横地拒絕党的領导和监督，違抗党的方針、政策和指示。在編輯部內公开提倡"抗上就是美德"和"士为知己者死"等反动思想。一九五四年十月党中央檢查文艺报的工作，陈企霞不但拒不檢討，反而誣

蔑党是借胡風的手"整"他，是"吳三桂借兵"。一九五五年一月，党为了教育陈企霞，决定給他留党察看一年处分。陈企霞竟蔑視党紀，背地里和其姘妇周延（党內右派分子）密謀，一連向中央写了三封匿名信，捏造事实，說檢查"文艺报"是"打击压制"、"假公济私"，誣蔑中央"偏听偏信"，誣蔑作协党組織"摧殘民主"、"無中生有"。陈企霞还充滿仇恨地說："我有一支手槍有七粒子彈，留最后一粒打死自己。"同年八月作协党組召开党組扩大会議，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活动，作了严肃的批判和斗爭。会后向中央作了报告，該报告經中央同意並批發各省市委。陈企霞不但沒有認真的檢查自己的錯誤痛改前非，反而变本加厉地和丁玲、馮雪峯等勾結一起，进行反党集团的活动。

（三）一九五六年波匈事件發生以后，国际上出現了一股反共浪潮。特别是今年春天，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陈企霞說："現在的空气对我們有利！"于是他便猖獗起来，不断地和丁玲、陈明、李又然、艾青等秘密策划，进行反党活动。同时陈企霞还指使其姘妇柳溪（党內右派分子）勾結文艺报的右派分子，猖狂的向党进攻，他到处散布反党的讕言。李又然嚷"我要杀人！"陈企霞叫："我真想放火！"在会議上，他更公然瘋狂地叫囂誣蔑肃反运动，說作协是"無反乱肃"，說一九五五年党对他們的批評，是"瞞上欺下"，是"違法乱紀"，並多次煽惑肃反对象翻案。丁、陈反党集团的另一毒辣陰謀，就是企圖公开分裂文艺界。陈企霞和丁玲等共同密謀在今年十月原来准备举行的第三次文代会上公开制造分裂，登报声明，退出中国作家协会，以此制造文艺界的分裂局面，打击党的領导。反右斗爭开始以后，陈企霞还和陈明、柳溪等右派分子用秘密通訊的办法，多次訂立攻守同盟，企圖向党頑抗到底。

上述事实說明，丁、陈反党集团的严重危害性質是在于它反对党对文艺事業的領导，抗拒党的文艺方針路綫，宣傳資产阶級的文艺思想，並且和党外資产阶級右派互相勾結，破坏社会主义文

艺事業的团結。陈企霞作为这个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应負重要的責任。

陈企霞墮落成为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他的極端严重个人主义思想發展的結果。陈企霞自参加革命以来，一貫地目無組織，狂妄蛮横地反党反領导。在道德品質上，腐化墮落，严重地違法乱紀。他几年以来，一直和两个女人（都是右派分子）同时姘居，並利用她們制造假材料，抄写匿名信，猖狂的向党进攻。陈企霞为了满足个人腐朽的墮落生活，經常向别人騙錢来揮霍浪費。他的严重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虽經党屡次教育和处分，都因他对党一貫採取抗拒的态度，拒絕徹底改造，以致在留党察看期間，沒有經得起党的考驗，特别是此次資产阶級右派猖狂向党进攻时，积極勾結党內外右派分子，向党大举进攻。因而丧失了党員的起碼条件，墮落成为資产阶級右派分子。根据陈企霞所犯反党罪行的性質及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原則，为了严肃党的紀律，維护党的团結和統一，經中共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大会全体党員以一百零二票一致通过开除陈企霞的党籍。陈企霞的反党罪行和違法乱紀的罪行是非常惡劣的，本应建議行政上給予極严厉的处分，並应向法院起訴給予刑事处分。但由于他在党的教育和帮助之下，交代了一些問題，表現了一定的悔悟。因此建議行政上免于法律起訴並从輕处分，即撤銷作协理事，降低行政級别六級（由十級降为十六級），监督劳动。

中共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党員大会关于开除罗烽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四日通过

罗烽，原名傅乃琦，男，現年四十七岁，辽宁省沈陽市人，个人出身学生，家庭成份职員。一九三零年在哈尔濱入党。一九三四年六月被哈尔濱日本領事館逮捕入獄，翌年四月出獄。一九三五年冬或三六年春，在上海恢复了党的关系。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后失去了党的关系，一九四一年恢复了党籍。曾任延安文抗第一屆主席，合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旅大文委書記、文协主任，东北文化部副部長，現为專業作家。

罗烽的反党思想和行为是一貫的，他曾在敌人面前自首变节，並对党隐瞞。他与党与領导的关系長期以来就是不正常的，近年来他参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向党进攻的活动，已墮落为与党为敌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在反右派斗爭中，作协党組召开了二十七次扩大会議，对丁、陈反党集团进行了严肃的斗爭，根据所揭露並查对屬实的材料，罗烽的主要反党事实如下：

一九三五年罗烽出獄后到上海，和肖軍、胡風往来密切，和党的关系很不正常。三五年冬或三六年初，上海党組織为罗烽接上党的关系，但罗烽却說自己的关系恢复在党的"小組織"之上，甚至誹謗当时在上海坚持党的文艺工作的党組織和負責同志是"違反中央指示，个人扩大組織，巩固宗派。"

一九四二年，罗烽在延安發表了反党文章"还是杂文的时代"。誣蔑延安也有"可怕的黑暗"和"使人嘔心的膿瘡"，号召作家們用杂文的"短劍"来对党攻击。同年，他还和肖軍、艾

青、白朗等人联名發表另一反党文章"太陽里的黑点"，主張暴露解放区的"黑暗"，誹謗党和革命。

全国解放以后，党給罗烽以重任，但罗烽却辜負了党的信任，坚持反党立場，繼續进行反党反領导的活动。一九五三年四月，罗烽和白朗等人趁东北局总結四年来文艺工作的机会，进行非組織活动，煽动群众，向党进攻，並对領导东北文艺工作的同志进行惡意的攻击。一九五五年作协党的組織根据东北对白朗、罗烽的檢举，和当时斗爭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党組扩大会上所揭發的材料，召开了支部扩大会議，对他們进行了思想批判。罗烽不但沒有很好的檢查自己，接受教訓，反而对党不滿，从反党反領导的立場出發，进一步参与丁、陈集团的反党活动，成为这个反党集团的成員。

作协在一九五五年批判罗烽等反党行为时，並未作过任何組織处理，本来無案可翻，但是，当丁玲、陈企霞"翻案"向党进攻时，罗烽也竟然向党提出翻案，借此攻击作协党的領导，並企圖要挾組織承認他在东北四月会議上的反党反領导是合法的。罗的这些做法，都是在与丁玲共謀策划和互相鼓励之下进行的。反党集团首腦丁玲曾对罗烽說过"处理你們的問題，正是处理我的問題的序幕"。罗烽和丁、陈反党集团就是这样有計划有步驟地向党进攻的。罗烽为和丁玲共謀翻案，肆無忌憚地違反党的紀律，將参加总支会議听来的有关处理丁、陈問題的意見告訴丁玲，把总支写的关于批判罗烽、白朗等人問題通知草稿送給丁玲看，尤其严重的是罗烽以支部書記的身份，向中宣部党委副書記探听党委对丁、陈問題的处理情况，然后由其妻白朗告訴丁玲，給丁玲增添了反党的資本。今年作协党組扩大会之前及反右派斗爭开始之后，罗烽又积極向丁玲献策，提示丁玲在發言时要注意策略，並劝丁玲赶快写反右派的文章，企圖帮助丁玲隐蔽反党面目，使反党集团逃避应有的斗爭。

罗烽專業創作几年以来，一直沒有写出作品，創作劳动是極

其不好的。

解放后發現罗烽早在二十三年前，就有变节的行为，他在一九三四年六月被捕，关押在哈尔濱日本領事館獄中，曾承認自己是共产党員，供出了党的組織和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示悔改，並辱駡了党，是自首变节的行为。对于这一个严重的問題，罗烽一向对党隐瞞，並时常伪称自己在獄中“保衛了自己的政治节操，保衛了党的利益”。东北局組織部曾对他这一段历史情况作調查，罗烽竟說这是“东北局組織部对党員的政治生命無顧惜的戕害”，說这样做“是有其惡毒的政治企圖的”，一九五六年审幹时，作协审幹委員会已將罗烽这一自首变节問題調查清楚，掌握了确鑿的档案材料及同案人的証明材料，再三地进行啓發和帮助，但罗烽坚不吐实。在作出了审查結論后，罗烽虽說結論正确，但却仍自相矛盾的說沒有欺騙組織，拒不檢討。

此外，罗烽的道德品質也是很惡劣的，一九四八年他曾因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受到党的書面劝告处分；一九五二年又重犯男女关系上的錯誤。

上述事实說明，罗烽具有極端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違背党的原則，抗拒党的教育，以致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員的起碼条件，墮落成为危害党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根据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党內右派分子的原則，为了严肃党的紀律，純潔党的队伍，維护党的团結与統一，經中共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大会全体党員以八十九票一致通过开除罗烽的党籍，並建議行政上撤銷其作协理事职务，降低行政級别五級（即从八級降为十三級），另行分配工作。

中共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党員大会关于开除李又然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日通过

李又然，原名李家齐，又名李罗曼、李則蘭，現年五十二岁，浙江省慈谿县人，家庭出身資本家兼地主。一九二六年在上海加入国民党，不久即脱离。一九二八年在法国留学，加入法国共产党，一九三二年自动脱党。一九四一年到延安后，又經丁玲、江丰介紹重新入党。現为文学講習所教員。

李又然于一九三二年在法国留学时期，深受托派影响，曾經自动脱离法国共产党，宣揚托派思想。重新入党以来，始終对党不忠实，品質一貫惡劣。在延安时，就和丁玲、陈企霞关系密切，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以来，和丁玲、陈企霞公然勾結一起，进行反党集团的活动，今年春天鳴放期間，又拉攏党外右派分子，瘋狂向党进攻。在此次反右斗爭中，作协党組召开扩大会議，对这个以丁玲为首的反党集团进行了斗爭，根据所揭發並查对屬实的材料，李又然的重要反党事实如下：

（一）一九三二年李又然在法国自动脱党以后，即开始狂热地宣揚托派思想，誣蔑第三国际和法共中国支部，頌揚托洛斯基为"偉大的天才"、"有大功劳"，並表示准备加入托派組織。一九三二年回国后，他宣称"帶回对托派的同情"和"对共产党的失望"。在上海与托匪王独清过从甚密，宣傳"中国只有全部工業化以后才能进行無产阶級革命"及"一国建設社会主义就是放棄世界革命"等托派謬論。

（二）一九四一年李又然在延安重新入党以后，惡劣的品質

和資产阶級反动的人生观並未得到改造，他誣蔑共产党人的光荣称号，說“在延安做党員如同在南京做汉奸，容易做，也不得不做”；誣蔑做保衛工作的某中央負責同志是“四只眼睛，陰森可怕”；誣蔑中央組織部是“做特务工作的”。那时他就和丁玲、陈企霞、肖軍、艾青等人結为至友，对托派分子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大加讚美，並主張將王实味的“政治家与艺术家”發表在“谷雨”的首頁上。斗爭王实味时，他不仅不和党站在一起，反而同情和支持王实味，积極为王实味辯护，並动員肖軍去毛主席面前为王实味开脫。在此时期，他自己也發表过恶毒攻击党的“鞭屍”等文章。

一九四七年，李又然在东北工作期間，破坏土改运动，包庇地主子弟，並为地主隐藏浮財，引起农民極大不滿，为此受到党內警告处分。

（三）全国解放以后，李又然身为文学講習所教員，对党的工作消極厭倦，生活糜爛，爭級别，鬧待遇，打击和排斥积極分子，在同志間制造糾紛。一九五四年，中央檢查文艺报时，他同情和支持陈企霞向党抗拒，陈企霞誣蔑党对文艺报的檢查是“吳三桂借兵”，李又然則恶毒地說“这是武裝西德”（誣蔑党檢査文艺报对胡風反革命集团有利）。肃反运动前，李又然和胡風骨幹分子盧甸、魯藜等来往密切，相互吹捧。肃清胡風反革命集团开始时，李又然竟公然抗拒运动，表示同情胡風分子，並为之辯护。肃反运动中，抗拒党审查他的历史，拒絕在結論上签字。和陈企霞一起到处叫囂肃反是“侵犯人权”、“殘害人命”；是“政治陷害”和“宗派打击”。以此煽惑群众对党的不滿和仇視。一九五五年作协召开党組扩大会議，在斗爭丁、陈反党集团的同时，也揭發了李又然的反党言行，李又然不但沒有知过悔改，反而对党更加仇恨，进一步投靠丁玲，参与丁、陈反党集团，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党活动。

（四）一九五六年波匈事件發生以后，国际上出現了一股反

共浪潮；特别是在今年春天，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以丁玲为首的反党集团，認为时局对他們有利，便猖獗起来，李又然嚷着：“我要杀人！”陈企霞就叫着“我真想放火！”在今年六月召开的党組扩大会上，李又然对党瘋狂地叫囂：“我仇恨！我仇恨！”更陰毒地是他竟然丧心病狂地誣蔑毛主席“耳朵聋了”，偏听偏信，竟然写信給毛主席，劝毛主席“退休”（未發）。与此同时，李又然积極拉攏、勾結唐祈、吕劍等党外右派分子，为他們提供反党材料，將丁、陈問題洩露給他們，鼓励他們为丁、陈翻案，並通过他們串联文滙报的右派分子，企圖利用丁、陈問題，包圍和打击党的領导。煽惑因叛党而被清洗出党的吕劍，提出恢复党籍，乘机翻案。对党的領导同志，表現了刻骨的仇恨，狂妄地誣蔑某領导同志是“宗派主义的根源”，並威胁說：“你要通过社会主义这一关，須要我批准，否則过不去！”丁、陈反党集团的另一陰謀是企圖分裂文艺界，李又然对唐祈、吕劍表示，如反党不得逞，他將退出文学界。反右派斗爭开始以后，他即和党內外右派分子，訂立攻守同盟，企圖向党狡賴到底。

李又然墮落成为反党集团的成員，絕非偶然，他的腐朽透頂的人生观，極端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虽經党多年教育和屡次挽救，都因他一貫对党採取不老实的态度，拒絕徹底改造，終于在国內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中，积極勾結右派分子向党大举进攻，墮落成为一个資产阶級右派分子。根据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党內右派分子的原則，根据李又然的反党罪行及其檢討态度，为純潔党的組織，严肃党的紀律，經中共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大会全体党員以一百零二票一致通过开除李又然的党籍。並建議行政上撤銷其教員职务，降低其級別由文艺四級降为行政十七級，监督劳动。

中共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党員大会
关于开除白朗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四日通过

白朗，原名刘莉，女，辽宁沈陽人，現年四十五岁，家庭出身旧官吏，本人作家。一九四一年到延安，一九四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文抗理事、东北日报副刊部部長、东北妇联执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員等职，現为專業作家。

白朗参加革命以来，一貫堅持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立場，長期和党的关系不正常，以致發展到和丁玲、罗烽等結为反党集团，进行反党活动。在此次反右派斗爭中，作协党組召开二十七次扩大会議，对丁陈反党集团进行了斗爭，根据揭發並查对屬实的材料，白朗的主要反党事实如下：

一、一九四二年在延安当革命处于困难之时，白朗和罗烽、肖軍、艾青等联名發表反党文章“太陽里的黑点”，号召写暴露延安陰暗面的作品，誹謗党和革命。

二、全国解放以后，白朗由于党委派的工作及写出了一些作品，她沒有把这看作是党的培养的結果，反而驕傲自滿起来，拒抗党和同志們的批評。一九五三年她和罗烽等乘东北局总結东北地区四年来文艺工作时，进行非組織活动，煽动群众，向党进攻。並对領导东北文艺工作的同志进行惡毒的攻击。当他們的錯誤言行遭到反对时，白朗仍然堅持反党立場，激昂慷慨地說：“我不动摇，不屈服，不投降！”一九五五年作协党的組織根据东北轉来的对白朗、罗烽的檢举，和当时斗爭丁陈反党集团的党組扩大会上所揭發的材料，召开了支部扩大会議，对白朗的反党

言行进行了批判和教育。白朗不但沒有很好的檢查自己，接受教訓。反而对党仇恨在心。誣蔑党对她的批評是“打击”、“侮辱”和“誣陷”。

三、早在一九五六年，白朗和罗烽就与丁、陈反党集团首腦丁玲进一步勾結起来，参与丁陈反党集团的活动，与丁玲、罗烽共謀，推翻一九五五年作协党組关于丁、陈反党集团的結論和党組織对白朗等所作的批評。白朗誣蔑党和同志們对她的批評是“是非不明”，是“無中生有”，是“害了陷害狂”，是“压制民主”，是“含蓄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动机和目的”；白朗甘心情願为丁玲翻案到处奔走，当罗烽以支部書記身份探取党委对丁、陈問題处理情况后，白朗馬上向丁玲通風报信，大大助長了丁玲的反党气焰。丁玲要“通天通地”，白朗就散布流言蜚語，說斗爭了她們，文艺界因而就“貌合神离”；並在一位中央委員同志面前作歪曲事实、顛倒黑白的申述，为丁玲的反党罪行辯护，以达到他們所謂“通天”的目的。波匈事件以后，白朗的反党气焰更为高漲，今年春天在作协党組与总支召集的会議上，白朗經过事前和丁玲密謀，甚致連她在会上的發言稿也事先唸給丁玲听，丁玲說：“攻击目标不太集中”，于是白朗态度更加蛮横無理，气势汹汹，在党的会上，狂妄地叫囂“我就要出气！”在党的会議上声言：“我在丁玲倒霉时也和她来往！”並辱駡作协党組、总支对他們的批評是“买空卖空”。集中一切惡毒字眼来辱駡党。

上述事实說明，白朗是丁陈集团的成員，她入党以来，一貫驕傲自滿，拒絕批評，她的極端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虽然經党屡次教育，都因她对党採取不老实的态度，而未得到徹底改造。在她和罗烽的关系上，当組織已掌握确鑿材料証明罗烽在历史上自首变节，白朗不仅沒有站在党的立場忠实地向党提供有关材料，反而对罗烽欺騙党的行为百般开脱辯护，並写材料說她敢于向党保証，罗烽在敌人的法庭上沒有任何招供和屈服。白朗在几个重要关头均未經得起考驗，特别是此次資产阶級右派分子猖狂

向党进攻时，她积極参与丁陈反党集团向党大举进攻，因而完全丧失了一个党員的起碼条件，墮落成为一个資产阶級右派分子。根据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党內右派分子的原則，根据白朗的反党罪行和她的檢討，为了严肃党的紀律，維护党的团結和統一，經中共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党員大会全体党員以八十九票一致通过，开除白朗的党籍。並建議撤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撤銷全国文联委員，取消其文艺（原文艺一級）級別。

中共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党員大会
关于开除艾青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日通过

艾青，原名蔣澄之，浙江省金华县人，現年四十七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作家。一九三二年因参加"美联"被国民党逮捕判刑，在獄中自首变节。一九四五年入党。一九四七年因在男女問題上犯錯誤，受当众警告的处分。一九五三年因政治上消極墮落和在男女問題上屡犯錯誤，受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已按期取銷）。一九五五年因在男女問題上違法乱紀，受留党察看兩年和劳役半年緩期一年半的处分，上述兩个处分均未撤銷。

艾青在留党察看兩年的期間里，不仅沒有低头認罪，痛下决心改正錯誤，反而对党怀恨在心，和丁玲、陈企玲、江丰等勾結一起，进行反党的陰謀活动，墮落成丁、陈反党集团的成員。艾青的主要反党事实如下：

一、积極支持和参与丁玲、陈企霞翻案和反党的陰謀活动。波、匈事件后，国际上出現了一股反共浪潮，特别是今年春天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艾青和丁玲、陈企霞密切

配合，互相呼应，穷凶極惡地进行反党活动。艾青大量地制造和散佈各种流言蜚語和反党言論，說党斗爭丁陈是“殘忍的”，是“宗派打击”和“政治陷害”；說“党內一批人專門整人，一批人專門挨整”，以此誣蔑和攻击党的領导，为丁陈反党集团爭取群众。在党組扩大会議期間，丁玲和艾青密謀对策，丁並主使艾青發言，艾青就在会上为丁玲、陈企霞“伸寃”。丁陈反党集团积極勾結党外右派向党进攻，陈企霞主使柳溪勾結文匯报右派分子姚芳藻和梅朵陰謀在报上利用丁、陈問題攻击党，艾青則招待該兩記者到他家中密談，向他們揭开所謂“文艺界的兩个底”，誣蔑丁陈問題和江丰問題是文学界和美术界的宗派打击。

二、积極为江丰反党集团辯护和出謀献策。反右斗爭前，当江丰受到党的批判时，艾青即表示憤憤不平，捏造党对江丰是“宗派打击”和“一棍子打死”。今年五月，江丰煽动一批画家，抬着他們的画幅到文化部示威的前夕，江丰反党集团的一部分人即被艾青邀請到他家里密謀，艾青亦參与策划。

一年来，艾青积極的奔走于丁陈反党集团和江丰反党集团之間，傳遞消息，联絡組織，成为兩个反党集团之間的联絡員。

应該指出，艾青墮落到反党的泥坑中去絕不是偶然的，这是他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發展的必然結果。艾青在延安时，曾和反党分子肖軍、罗烽等人联名發表反党文章“太陽里有黑点”。一九四五年艾青入党以来，和党的关系一貫不正常，他以“大詩人”自居，自視特殊党員，向党要名誉、要地位、要照顧，拒絕批評监督，拒絕思想改造。他的个人慾望不能得到满足时，就到处散布党不重視他，群众重視他，国內不重視他，国外重視他的反党謬論。並捏造他在文艺界受排挤，誣蔑党要臧克家（民主人士）担任作协書記处書記和“詩刊”主編，是对他的压制和打击。艾青在男女問題上，屡次違法乱紀，道德敗坏；在个人生活上，揮霍浪費，糜爛墮落，过着荒淫無恥的生活，和吳祖

光等右派分子結为知己，甚至將党內秘密，大量的洩露給吳祖光，完全丧失一个共产党員起碼的道德品質。一九五五年作协召开党組扩大会議，在斗爭丁陈反党集团的同时，也揭發了艾青严重的反党言行，艾青不但沒有醒悟悔改之意，反而对党更加仇恨，进一步和丁玲、陈企霞結为反党集团，勾結党外右派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党活动，墮落成一个資产阶級的右派分子。根据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党內右派分子的原則，根据艾青的反党罪行和他的檢討，为了严肃党的紀律，維护党的团結和統一，經中共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党員大会全体党員以一百零二票一致通过开除艾青的党籍。並建議行政上撤銷艾青的美术家协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員和“詩刊”、“收获”的編委职务，取消其文艺級別，分配到基層工作，並参加一定劳动。

中共人民出版社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曾彥修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通过

一

曾彥修，現年38岁，家庭出身錢庄高級职員，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到延安，同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至四八年在延安馬列学院、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宣傳部、新华总社工作。一九四九至五四年在南方日报、中共华南分局宣傳部、广东省教育厅作領导工作。一九五四年調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兼副总編輯。

曾彥修在这次整風运动中，即在阶級斗爭的紧要关头，配合社內外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因而充分暴露了他的阶級異

己分子面目。

曾彦修身为当时人民出版社整風領导小組組長，曾及时听到上級党委有关指示和傳达报告，知道党中央对于整風运动的方針；但是他不去努力貫徹执行这个方針，却利用自己的領导身份，不顧上級党委的批評和建議，仍然讓四月中旬本社动員学習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文件时，由他倡議成立的一个成份复杂的（其中，除曾本人外，还有四个人后来都是右派分子）学委会来領导整風，使整風領导小組一度实际上陷于完全被动地位，失却党的領导作用；他又支持右派分子篡夺黑板报的領导权，使黑板报一度成为右派分子进攻党的重要工具。正当社內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曾彦修接二連三的在座談会和党支部会議上，發表誣蔑党的謬論，並且散布悲观失敗情緒。他誣蔑共产党为"把持政权"的宗派集团；他声言不但人民出版社党支部，就是全党都已經有"蛻化变質"的危險，"入城七、八年已有类似国民党的迹象"，党与群众的距离已是"十万八千里"，他居然說許多人"对共产党已是敢怒而不敢言"，而共产党員已变成"依靠党的政权"吃飯的"特权人物"。曾彦修的反党謬論集中表現在六月二日对右派分子盤据下的黑板报發表的"答記者問"上。这篇惡毒的反党謬論，等于給社內右派分子打响战鼓，掀起了右派"端党內宗派"的反党高潮。在这个反党高潮当中，虽然与曾彦修的企圖相違背，党的队伍並沒有因此渙散，党員的斗志也並沒有因此而松懈，但是在短短的一个时期內，曾彦修的这些謬論曾經使相当数量的群众暫时迷失了政治方向，有些甚至陷入右派思想中。

二

作为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兼副总編輯的曾彦修，完全清楚中央和文化部对出版工作是有方針、有領导的。但是在整風前夜（三月、四月）和整風中（五月）的一系列会議和座談会上（例如宣

傳会議、人民日报座談会、文化部的座談会），曾彦修却大肆攻击党和政府在提出“百家爭鳴”方針以前对出版工作旣“沒有方針”，也“沒有領导”。曾彦修同时惡毒誣蔑苏联出版机構和制度都是一套“落后的”“束縛思想的教条的东西”，他居然咒駡我們学習苏联的結果“妨碍了出版事業的發展”，妨碍“思想自由”和“科学發展”。他把社会主义出版計划化攻击为“大一統”，建議“砍掉出版局”，提倡各出版社分别去找“后台老板”，妄圖恢复資本主义的“出版自由”。由此可見，曾彦修所追求的是一套資本主义的出版方針。

在整風运动中，曾彦修以实际行动来实現他的反党的出版路綫。例如他五月十七日在人民出版社总編輯办公会議上就提出聘請有潘光旦、費孝通、錢端升、李景汉这些右派分子参加的編委会領导人民出版社的政治書籍的选題和出版；曾彦修这一反党行动由于其他同志的反对而沒有得逞。

三

曾彦修在政治上具有十分强烈的修正主义思想，这是他的右派反党言行的思想基础。这次反右派斗爭所揭露出来的材料，以及曾彦修本人在运动中陆續向組織交代的事实，証明曾彦修的修正主义思想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这些反动的思想只是在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由于国际修正主义風暴的誘导才逐漸暴露，而到了整風运动才突出地爆發。

曾彦修所攻击的（以及他自己交代，虽然未曾实行攻击，而心中已在怀疑的）正是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来反对馬克思主义。他把宣傳馬列主义的書籍一律誣蔑为“教条主义小册子”；他反对把人定为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說这是“宗派主义的作法”；他衡量出版事業有沒有成績是从出版了代表資产阶級思想的著作来作标准的；他公开反对哲学要从党性講起；他怀疑並反对馬克思主义关于資本主义制度下經

济危机的理論，以及無产阶級絕对貧困化的学說；他錯誤地理解我們党提出的学术上"百家爭鳴"政策，首先就否定了馬克思主义的領导和無产阶級的立場，並且認为政策也可以爭鳴。曾彥修的修正主义思想，已經逐漸形成有系統的一套，集中表現在他在整風运动前夜所写的"教給人們聪明的科学"这部讀書笔記（因为反右派斗爭已展开，沒有出版）中。

曾彥修一年多以来所写的一部分杂文，十分明白地表露出他否定社会主义建設和反对党的領导、反对無产阶級專政的傾向。例如他所写的"官要修衙、客要修店"这篇杂文，就流露出否定一切社会主义建設的情調，他用"滿城多空屋，来客宿街头"的"詩"句来惡毒地歪曲現实。他写的一篇"便宴及其他"十分强烈地表現他对党的領导，对监察机关、工会、审幹等机关和措施的反感。

从他在运动中交代的思想看来，他是不同意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的。正如我們党八次代表大会所指出的，有些人从右的方面离开了党的总路綫，曾彥修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他認为农業合作化"太猛烈了"，使农民的"积極性"降低了；他認为工業化"太快了"，因而对农民照顧少了。他甚至認为党中央这样做"会犯历史性的大錯誤"。他强烈地反对苏联，站在右派的立場来找苏联的缺点和錯誤。在他心目中，苏联的內政外交彷彿都一無是处，特別是苏联改正自己錯誤的时候，他还是对苏联心怀不滿。他对斯大林所採取的态度是全盤否定，和我們党中央的看法完全是背道而馳的，他的这种对斯大林深惡痛絕特別是对肃反扩大化的深惡痛絕，在一年多以来的編輯工作中是造成了某些不良的影响的，而这种思想的实質就是否定苏联，否定社会主义建設的修正主义。因此他自己交代，他对無产阶級社会主义革命能否在最發达的資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沒有信心，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对革命和共产党發生了根本性动摇的必然表現。

四

所以曾彥修墮落为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完全不是偶然的，这有着阶級的和历史的根源。曾彥修虽然很年輕就参加革命，很早就加入共产党，但是入党以后一直沒有徹底抛棄他原来的剝削阶級立場。他是帶着資产阶級的立場观点加入共产党的，这种資产阶級反动思想只是在抗日的前提下和党当时的要求是一致的，而他入党以后不但沒有跟自己的反动思想作不疲倦的斗爭，而且讓它日益發展，形成了有系統的一套修正主义思想。可以說，曾彥修入党十九年，思想的主流却是和党背道而行的。

曾彥修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入党后，和党的关系就"若即若离"，如他自己所說的"象油花浮在水面上"一样；他入党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成名和兴趣，因此，入党不久即对党的生活厭棄。一直到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时期，还是不大願意过党的組織生活，連交党費也成了負担，对上級党組織的劝告和批評也往往是抱着抗拒态度的。

在历史上大轉折的时期，即在关鍵时期，以修正主义这种資产阶級观点为主流的曾彥修，就發生了問題，这是絲毫不奇怪的，例如在一九四二年前后，解放区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蔣介石集团的联合进攻，处境十分艰苦，曾彥修在这样的关头就站不穩了，他在晋西北写过反党的杂文"殉葬"，誣蔑革命烈士，又写过信夸大解放区的个别缺点，誣蔑根据地沒有革命味道；当时曾彥修曾强調团結中农和利用富农生产力，而不强調貧雇农路綫。党在当时着重的批評教育了他，因此，他才沒有公开發展这些十分錯誤的思想，但是他並沒有从根本上放棄这些思想。

到了全国解放后，当阶級斗爭激烈化起来，作为南方日报社長和华南分局宣傳部副部長，曾彥修对一九五一年的鎮反运动是抱着不同看法的，总觉得"人杀得多"了，会引起社会震动；对当时党要建立宣傳网和在报紙上加强宣傳馬列主义問題也是抱着

完全不同的态度的。他不是坚决的貫徹党的方針决議，而是多方設法取消实現这些方針决議的具体措施。

难怪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及我們党提出“百家爭鳴”口号以后，曾彦修就認为有机可乘了，以为他的修正主义毒药可以拿出来大行其道了。到了整風前后，他也和社会上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一样，錯誤地估計了形势，立即由动搖怀疑轉到猖狂向党进攻。

十九年来每到緊要关头，曾彦修原封不动的反动立場和思想就暴露出来了。党不断地跟他进行斗爭，三番几次地对他进行过批評教育，但是他的思想主流並沒有絲毫改变，反而与日俱增地站到与党相敌对的立場，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向党进攻。这样，混入党內的阶級異己分子的丑惡面目，就完全赤裸裸地暴露。

中共人民出版社支部大会在討論了运动中所揭發的曾彦修的全部反党言行后，一致認为曾彦修已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員的資格，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和共产党員不相容的。为了純潔党的队伍，为了加强党的战斗力，为了粉碎資产阶級右派从党內向党进攻，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开除右派分子曾彦修出党。

中共人民出版社支部相信：我們全体同志必能从曾彦修墮落成为右派分子的事实中取得深刻的教訓，应該認識修正主义思想对于共产党員和社会主义事業的危害，並且跟它作不疲倦的斗爭；必須加强自己的党性鍛煉，提高自己的阶級覚悟和政治警惕性，忠誠地为实現我們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而奋斗。曾彦修墮落为右派分子的事实，对于我們知識分子党員具有特別的教育意义：它清楚地証明，必須在生产劳动和实际斗爭中將自己加以徹底的鍛煉，才能够成为一个無产阶級的真正战士。

中共人民文学出版社支部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聶紺弩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三日通过

聶紺弩，原名聶畸，男，五十四岁，湖北京山人，出身为破落地主（父亲开大烟館）家庭。一九二三年参加国民党。一九二五年底曾到莫斯科讀書，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叛变革命，即被送回国。一九二七年九月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訓育員，以后又曾担任国民党中央通訊社編輯、副主任等职。一九三一年去日本，在东京和胡風相識。一九三三年因左联和社联在日的支部相互爭論，引起日本政府注意，有大批留学生被捕，聶与胡風也同时被捕，遣送回国，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一九三五年由吳奚如介紹参加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前，曾在桂林、重庆、香港等地作文化工作。从一九五一年起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編輯，一九五五年肃反期間因历史不清被审查（聶的十分复杂的政治历史及社会关系，在审查前从未向党交代）。

聶紺弩入党以来，一貫不遵守党的組織原則，与党的关系不正常，与国民党反动派接触或接受他們的錢，从不向党报告，自己轉移工作地点既不向党請示批准，也不向党要求轉移組織关系，独来独往，目無組織。因之几度脫离組織关系，並且長期以来，沒有接受党的教育进行改造，严重地敌我不分，丧失共产党員立場。其中与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澤、谷正綱等关系很好，几次接受他們的錢。解放后又利用共产党員的身份，包庇与掩护反革命分子，介紹反革命分子混入国家机关，把重要党內机密洩露給胡風，与有夫之妇吳向真搞不正当男女关系，严重的違法乱紀。肃反后期，党予以留党察看的处分，聶沒有認識到党在挽救他，給

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並且不同意結論中某些論証，要求修改。在党号召全党进行整風时，聶帮同右派分子周穎（聶的爱人）惡毒的攻击污蔑党的肃反政策，並与社內右派分子張友鸞、金满成等勾勾搭搭，直接間接起煽風点火的作用。其主要的反党錯誤事实如下：

（1）聶于一九三五年入党以后，曾被派往成都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澤那里搞情报工作，但聶並沒有为党好好工作，反而借此接上了旧的关系，屡次接受康澤的錢，六十元至一百元不等，前后总計約三百多元。一九四八年，解放战爭中，康澤被我軍俘获，聶在香港發表"記康澤"一文，居然把康澤描写成为一个"民族英雄"，为康澤吹嘘捧場。又当党派他与国民党三战区政治部主任谷正綱接洽事項时，又接受了谷的錢（三十元）。此外，聶还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如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書記長卓衡之，国民党文化运动委員会張道藩等人也都有来往，並且也接受过上述这些反革命分子的錢。聶身为一个党員，竟与敌人勾勾搭搭接受敌人的錢物，而不向組織請示报告。而于敌人被捕后，还写文章为特务吹嘘捧場，不仅严重的敌我不分，丧失了共产党員的立場，而且也迹近流氓作風，丧失一个普通人的品質。

（2）聶在解放以后，在武汉工作时，一九四九年曾介紹特嫌分子姜斌到台灣去作策反工作，聶並自动要求一同和姜去香港，在港数月，工作毫無成績，而特嫌分子姜斌在聶的掩护下，得以往来台港之間，毫無阻碍，客观上，聶已为姜斌所利用，或已將我方情报出卖与国民党。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四年，聶又曾先后將有血債的反革命分子王鏡淸介紹进武汉第一紗厂，又把反革命分子庄涌（該兩犯均已逮捕）及有政治問題的李石峯等人介紹进国家机关，其錯誤的性質也是十分严重的。

（3）聶紺弩与反革命分子胡風的关系十分密切，曾將党的重要机密（高饒事件）向胡風洩露，这是中央負責同志在高級幹部会上三番四次关照不許外傳的，否則即以党紀处分，但聶並不为意，过几天就向胡風透露此項机密（此外又告訴过党內外其他

的人），严重地違反党紀。聶在整風期間，还認为“胡風不逮捕也可以打垮”，“胡風要夺取政权搞不清，已公布的三批材料不能解决这个問題”。聶不仅未能与反革命分子胡風划清界限，居然还为胡風辯护。

（4）聶紺弩在他的日常言行中，經常散布一些反党和歪曲党的政策的言論。一九四五年聶在重庆發表“不許打內战”一文，完全失去共产党員的立場，把党的自衛战爭和蔣匪挑起內战說成一样。当毛主席去重庆和談时，聶在桂林“野草”上發表“毛澤东先生与魚肝油丸”一文，侮辱党的領袖。在文学出版社工作期間，也經常汚蔑、歪曲党的政策与誹謗党的領袖，散布流言蜚語，並在日常工作中对抗与欺騙党的領导，在二編室經常誹謗中央文艺界負責同志說：“沒有一个懂得文艺”，辱罵中宣部“不內行”，“不了解下情”，“官僚主义”等，在群众中散布極为惡劣的影响。在社內一貫採取拉攏、排斥、打击幹部的手段，搞宗派性活动，在二編室封官許願，培植他个人势力，作为他对抗領导的資本。

（5）一九五七年春天，当資产阶級右派掀起反共的高潮时，聶紺弩認为反党的有利时机已到，帮助右派分子周穎（聶的爱人）向党进攻，兩次帮周穎修改發言稿，惡意地攻击、汚蔑党的肃反政策，在發言稿中写着“如果他是一个冷靜的人，他就会覚得斗爭他的人在說謊，如果他是个有風趣的人，他就会覚得斗爭他的人在念咒；如果他是个急躁的人，他就会覚得恐怖寃屈，是非顚倒，天昏地暗，总之他会感到眞理正义不在斗爭的人那一边，而在他这一边，这样的心理狀态，那怕只存在一秒鐘，我認为也是对我們光荣的偉大的正确的共产党威信的損失”。並为周穎策划，叫她“过火的話不說”“应明显地表示出是为了‘爱护党’”其手段是十分毒辣的。当周穎被斗爭后，聶不但沒有主动向党交代錯誤，还对右派分子金滿成气憤地說：“周穎把我在家中發的牢騷都公开了……我是否被株連也还成問題”。並袒护周

說："她沒有篡夺領导的野心"，意指邮电部对周穎斗錯了。

此外，聶与社內外其他右派分子張友鸞、顧学頡、李易、金滿成、矿業学院胡建文等，整風时来来往往向他們煽風点火，如五月九日聶与以上右派分子聚餐时，对張說："你又想說又怕說"。当时正是張友鸞向党瘋狂进攻的时候，客观上起了煽風的作用。对肃反对象陈啓明說："你談了沒有"（意指向党进攻）。並在这些人面前散布許多反党言論。如說"肃反运动是党跟李希凡、藍翎跑，如果肃反为了审查幹部就說审幹好了，何必說肃反"，对胡說肃反时斗他是放屁，还說他十个月反省中得出一条眞理，即"党是一点也碰不得的，否則就得毁灭"等等。更严重的当反右斗爭开始后，聶仍繼續攻击党說"磕头求人家提意見，提了又說反党、反社会主义……这近乎騙人，人家不講一定要講，講了又大整"，又說"有什么可反的，当了右派有什么了不起，反正今天斗斗这个，明天斗斗那个，总得搞个什么分子"，完全暴露了聶紺弩反党的丑惡的面目。

以上事实証明，聶紺弩的極端个人主义已达到頂点，一貫抗拒党的領导，坚决拒絕改造，当資产阶級右派發动对党猖狂进攻时，聶也就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以达到反党的目的，終于墮落成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当党对聶展开斗爭后，聶一直頑强抵抗、狡賴，直至現在态度还十分惡劣，不肯低头認罪。为了严肃党的紀律，純潔党的組織，維护党的利益，根据中央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党內右派分子的原則，經支部大会全体正式党員以十八票通过开除聶紺弩的党籍，並建議行政上撤銷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編輯、二編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字改革委員等职务。級別由旧文艺二級降至編輯六級。

中共"文艺报"支部
关于开除鍾惦棐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通过

鍾惦棐，男，三十八岁，四川江津人，家庭出身城市貧民，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到延安抗大、魯艺学習。一九三八年五月入党。全国解放前历任魯艺普通部助教、班主任，华北联合大学美术教員，晋察冀文联美協常委，晋察冀軍区抗敌剧社美术队長，冀中十分区文工队指导員、宣傳科副科長，冀中新华書店編輯部長，华北局宣傳部幹事等职。一九四九年九月至一九五一年三月任文化部艺术局办公室副主任。一九五一年三月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其間曾于一九五四年四月至十一月任中央新聞电影制片厂第二总編輯。一九五七年一月起任文艺报編委兼艺术部主任。行政十一級。

（一）鍾惦棐的右派言行

（1）否定党的文艺方針，反对党对电影事業的領导，抹煞党对电影事業領导的成績，企圖把电影事業拉回資本主义道路。

一九五六年八月，鍾惦棐在中宣部文艺处負責电影工作期間，化名金銹龙在人民日报上發表了題为"如此科学观"的杂文，攻击电影事業的党的領导。他在文章中說："从电影的制片方法說，我們现在是'科学'多了，有局有厂，各司其职，而且裝备与制度，都可以說是最新式的。但就是出片少，而且好片少！这岂不是捧着金飯碗討飯——方法是科学的，結果却不佳。"

一九五六年十月，鍾未向中央宣傳部領导請示，擅自召集光明日报記者，供給他們資料，要光明日报發起电影問題的討論。

文匯报記者姚芳藻从他那里得到这个消息后，就急忙向浦熙修建議，搶先發起了电影問題的討論。文匯报关于电影問題討論的組稿計划都經鍾看过。当文匯报發表了司馬瑞的文章，反駁討論中的一些錯誤論点时，鍾就打电話給文匯报北京办事处，批評他們不該發表这篇文章。並且很快就用朱煮竹的化名写了“为了前进”一文，在文匯报發表。他在这篇文章中公然主張电影事業应該倒退到解放前的資本主义道路上去。一九五六年十二月，鍾惦棐又以“文艺报評論員”的名义發表了“电影的鑼鼓”，支持由文匯报的右派分子所掌握的所謂“电影問題討論”，否定党的文艺方針、攻击电影事業的党的領导。在这篇文章里，他污蔑电影的工农兵方向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根源，反对党对电影事業的領导，並且片面地宣傳所謂“票房价值”，这是文艺界最早出現的一篇反党的綱領性文章，为右派分子向党的电影事業进攻放了第一把火。这篇文章的主要論点是从他为人民日报編輯部写的“論电影指导思想的几个問題”一文中移植过来的，中宣部的領导同志早就駁斥了这些論点，不贊成他發表这篇文章，人民日报編輯部在討論那篇文章时也否定了鍾的論点，但他坚持反动立場，蒙騙了文艺报編委会的領导，改头換面在文艺报發表了。

今年二月間，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議和宣傳会議上对“电影的鑼鼓”进行了严厉的批評，但鍾惦棐仅仅在文艺报的支部大会上作了一次極不深刻的口头检討，而在背后却向人表示：“电影的鑼鼓”这場爭論，“將来历史上怎么写，現在还很难說。”在他写給右派分子何迟的信上对于中央对他的严肃批評抱有严重的抵抗情緒。

（2）利用文艺报編委职权，在整風初大放毒牌，向党进攻。

整風开始后，鍾惦棐利用文艺报編委兼艺术部主任的职权，勾結党內外右派分子向党發动了更加猖狂的进攻。他亲自主持了長影演員座談会，在会上散播所謂“电影的鑼鼓，救了电影局的

官僚主义”的謬論，向演員們点火。会后，要艺术部助編罗斗根据他的意見写出了“長影的第一个声音”这篇煽动性的报导，惡毒地攻击电影事業的領导，散播露骨的反党言論。此外，鍾惦棐还指使艺术部的記者採写了“張权同志的‘关于我’發表以后”等几篇煽动性的报导，对党所領导的音乐、戏剧等艺术事業进行歪曲和汚蔑；他还派遣艺术部記者罗斗、周文博分赴長春、上海等地放火”，並且写了七封密信給周文博。在这几封信里除了指使周文博在上海向文艺界展开全面的进攻外，还惡毒地咒罵党的領导。在这同时，他先后亲自訪問了話剧、电影方面的个别演員，煽动他們写攻击党的領导的文章。

（3）經常散播流言蜚語、攻击党的領导同志；配合丁陈反党集团向党反扑。

鍾惦棐長期以来，用自己陰暗的眼睛观察党的生活，在一些同志面前散播攻击文艺界負責同志的言論，說什么“下面的單位有小宗派主义，中央机关有大宗派主义。”在一九五四年中央檢查文艺报和一九五五年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問題上，他完全同情丁玲、陈企霞、馮雪峯的反党立場，汚蔑对丁、陈、馮的批判是宗派打击，說毛主席和中央在这个問題上是受了蒙蔽。

当作协党組扩大会第四次会議以前，丁、陈向党瘋狂进攻的时候，鍾惦棐在一次党小組会上要一位同志貼他的大字报，連題目他都想好了：“鍾惦棐，你是否怕丢掉編委这頂烏紗帽？”以便于他好趁机在党組扩大会上配合丁、陈向党进攻。只是因反右派斗爭开始了，他才沒有来得及在会議上放毒。

鍾惦棐对馮雪峯的反党文艺思想極为欣賞、引为同調。認为当前我們党的文艺理論中心是馮雪峯，但文艺界对馮太不重視，其原因是毛主席不重視馮。鍾对坚决执行党的文艺方針的同志則恨之入骨。在他給何迟的信上曾汚蔑党的文艺領导同志是“躺在‘延安文艺座談会講話’的身上或躲在‘講話’的背后”。

（4）在青年中散播毒素，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和波匈事件以后，鍾惦棐自命为"革新派"，对党的方針政策如关于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原則和对社会主义的城市建設方針甚至社会主义制度都进行攻击，認为我們党目前的一切措施都是顚倒了的，为此写了"略談拿頂"一文，要求把过去一切都"重新顚倒过来，加以改造"。他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方針，認为是对資产阶級、小資产阶級的讓步。他和"中国青年"社記者、右派分子昌滄的談話中，贊美北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是"五四精神复活了"，認为党是靠青年运动起家的，現在却脫离了青年群众。污蔑党內只有唯唯諾諾的人才被認为是"好幹部"、"党性强"、說"稍有一点独立見解，不是扣右傾，就是扣'左傾'"，又說"人民日报"的思想有些僵化，"中国青年"有一种"隐伏的危机"。在和"学習杂志"的文子易、沈美理的談話中，鍾污蔑我們今天存在着封建等級制度，說"我們的政府机構比国民党时代还要龐大，人浮于事，只能产生官僚主义"，在和他的老师赵其文的一次談話中，鍾惦棐認为我們党的領袖是"終身职"，是不民主的表現。他反对党內彙报制度，認为这就是"六亲不認"的社会原因。他还認为在审幹工作中对某些老党員的历史进行审查是表示党对幹部的不信任。

（二）反右派斗爭开始以后的表現

反右斗爭开始以后，鍾惦棐企圖蒙混过关，匆忙地写出了一篇檢討，要求文艺报編委会赶快發表。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誼会于八、九兩月中先后举行了十五次大会和六次小会揭露和批判鍾惦棐的右派言行。在斗爭的过程中，他对会議中所揭露的他的大量反党事实虽然都表示承認，但却很少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在会議初期和中期，他还曾以"动机是好的，是为了党的事業，但客观效果却反党"的謬論来为自己解說，后来又强調客观原因，說自己的反党言行是受了别人的影响。經过与会同志的駁斥，最后才承認自己的根本立場已經站在資产阶級右派方面，因而毒汁浸透了全身，以致犯下了严重的反党罪行。会議結束后，鍾惦棐又写

了几份材料，对自己犯錯誤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进行了分析，但很不深刻。

（三）反党的根源

鍾惦棐入党近二十年来，他的个人主义思想是在日益發展。長期以来，一貫地向党鬧名譽、地位和待遇問題，达不到目的时就对党埋怨。一九四七年他在冀中新华書店和华北局出版科工作时，就因为名譽地位問題与領导对立。一九四九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沒有要他参加，他也非常不滿。一九五一年到中宣部以后，因为發表了一些文章，就更进一步發展了名譽地位观念，埋怨党沒有提升他而心怀不滿。由于他的日益强烈的个人野心得不到滿足，于是便把領导同志看成是所謂"当政者"，把自己看成是"在野者"。他以陰暗的眼睛观察党內生活，把那些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坚持貫徹党的方針政策的同志污蔑为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和"唯唯諾諾的人"。同时，他又頑强地站在資产阶級的立場上反对党的文艺方針，攻击党的文艺事業，拜倒在資产阶級文化艺术的面前。当他在电影問題方面的錯誤受到党的批判以后，他不但不接受党的劝告和帮助，反而怀恨在心，变本加厉地發展自己的錯誤，以致終于墮落为資产阶級右派分子。

上述事实說明，鍾惦棐長期以来，坚持反党立場、反对党的文艺方針，反对党对电影事業的領导，抹煞党对电影事業領导的成績，企圖把电影事業拉回資本主义道路。当"电影的鑼鼓"受到党中央的批判以后，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在整風开始以后，利用职权，大放毒草，向党猖狂进攻。並且散布流言蜚語，攻击党的領导同志，配合丁、陈反党集团向党反扑，同时在青年中散播毒素，攻击社会主义制度。鍾惦棐已失去共产党員起碼的条件，从極端的个人主义發展为个人野心家、墮落为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他的反党言行已对革命事業造成严重損害。在反右派斗爭中悔改不好。根据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党內右派分子的原則，为了严肃党的紀律，純潔党的队伍，支部大会全体党員以十

票一致通过开除鍾惦棐的党籍，並建議行政上撤銷其文艺报編委和艺术部主任的职务，监督劳动。

中共中国美术家协会支部
关于右派分子彥涵的政治結論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簡历

彥涵，男，四十岁，江苏东海人，家庭出身小商人，本人学生成份，一九三八年七月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延安入党。历任延安魯艺研究生、教員，太行抗日根据地木刻工場工作，华北联大、华北大学教員，杭州美分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版画組副組長、創作研究室研究員。級別为文艺二級。

历史上的重大問題如下：

彥涵于一九三六年在杭州艺專时，参加过反动組織复兴社，入党时隐瞞了这一段历史。一九四二年在延安参加整風审幹时，初步交代了参加过复兴社，但仍旧隐瞞了受过特务訓練等具体活动，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才被迫作了詳細的交代，未予处分。此外，一九五一年彥涵曾因遗失党內文件，受过当面警告处分。

（二）主要錯誤事实

一、彥涵是江丰反党集团主要分子，积極为江丰反党集团策划，抗拒党中央的批評，进行反党的小組織活动。

彦涵向反党分子江丰、莫朴等献策，拒絕党中央、毛主席責成江丰、莫朴回杭檢查工作的命令，要他們“在北京搞清楚再去杭州”。彦涵並与江丰、莫朴合謀，如去杭州檢查工作，必須向文化部提出三个条件：1、中央应派人一同前往杭州；2、过去在华东分院工作过的人，都要調回杭州参加檢查工作；3、要保証江丰、莫朴有充分的發言权。彦涵四处散佈流言蜚語，說“毛主席偏听偏信”，“浙江省委的反映是錯誤的”，以及文化部、美协是宗派，打击江丰……等等。为了抗拒中央的檢查，彦涵授意莫朴准备“材料”，慫慂莫朴对“宣教动态”上关于华东美分院的报导，向中宣部提出抗議；莫朴給中宣部的信，是經彦涵过目的。彦涵曾約同莫朴去动員刘开渠为他們講話。彦並表示宁可犧牲創作时間，也要去杭州为江丰等出力辯护。

二、彦涵积極为江丰反党集团招兵买馬，是反党的“五月会議”的主要組織者之一。

彦涵和江丰在今年五月党宣佈整風后，認为时机已至，即策划組織“反攻”，彦涵曾向張凡夫、刘迅表示：“江丰問題去年沒有解决，今天应該解决了！”

彦涵在辛寺胡同人民美术出版社創作室、北京市美术工作室及部队一部分画家中散佈江丰反党集团的影响，拉攏張凡夫、刘迅、艾炎等进行反党活动。彦涵借美术出版社取消油画訓練班事件煽風点火，散佈“这是切斷我們老幹部的生命線”等讕言，煽动对党不滿。並与美院油訓班的江丰集团分子合謀，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組織了反党的座談会，猖狂向党进攻。彦涵有意識地不讓江丰参加这些座談会，居于幕后指揮。彦涵在事前曾向江丰报功，說“三八式要开火了！”“你的問題可能提出来！”。彦涵是这个反党座談会派到文化部“請願”的代表之一，“要求”文化部部長們亲自到場“听取意見”。五月二十四日，彦涵参加了江丰反党集团的密謀会，这个会上拟訂了在五月二十五日美术界座談会上向党进攻的佈署，並“邀請”党外人

士廖静文出来为他們說話。彥涵在五月二十五日座談会之前和会上，曾向許多美术家点火，佈置"集中搞錢俊瑞、蔡若虹的宗派"，"把他們搞臭！"彥涵还曾向江丰表示决心："破釜沉舟也要幹一下，拼出党籍不要！"江丰为此"感动"得落淚。"五月会議"后，彥涵兴高采烈，認为江丰反党集团已获得胜利，竟狂妄地說："这次会議將来要写进美术史。"

三、彥涵对肃反运动不滿，对党採取兩面派手法，並污蔑肃反运动。

彥涵的历史問題在肃反运动中經过审查之后，一九五六年4月作了正式結論，並免予处分，当时，彥涵向美协党組織表示：党审查他的历史是正确的，必要的，处理也很寬大，自己毫無意見。但在背后，却向江丰、艾炎、刘迅、張凡夫等人發牢騷。彥曾向刘迅說过："我被斗爭的时候，連一只破鞋都不如！"說自己是"被污辱、被損害过的人！"經江丰煽动之后，彥涵对党更加不滿，附和"肃反成績不是主要的"。"文艺界肃出了什么特务？"等右派言論。說如果不是一个不杀，"这次肃反运动，不知多少人要冤枉死的。"

四、反右斗爭开始后，彥涵是江丰反党集团陰謀"暫时退却、保存实力"的策划者、組織者之一。

彥涵听到文化部陈克寒同志关于反右斗爭的报告后，即到处通風报信，並与江丰、楊角、張曉非等右派分子密謀对策。他們建議江丰在人代会上再作一次發言，"积極反右"；讓江丰立刻切断与龐熏琹反党集团之間的联系。彥涵則在美协"积極"批判右派分子郑野夫，为自己打掩护。为了蒙蔽党的檢查，彥涵和秦征等在辛寺胡同創作室及美院油訓班把"五月会議"說成是"自發的"。彥涵曾表示"决不出卖江丰"，並在江丰反党集团分子中强調："十个手指头，一个松了，也就全都松了！"鼓动頑抗到底。彥涵在美术界反右派斗爭大会上，出面"揭發"江丰一些不关重要的尽人皆知的材料，（稿子事先經張曉非、楊角看

过）企圖欺騙組織，迷惑群众。

五、彥涵是江丰反党集团准备在第三次文代会上大举向党进攻的策划人之一。

江丰反党集团在"五月会議"上認为取得"胜利"之后，还計划在將于十月間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上，大举向党进攻，推翻党对美术事業的領导，分裂美术界的团結。根据現有材料，这一陰謀和文学界丁、陈反党集团是有联系、有配合的。彥涵也是这一陰謀的策划人之一。

彥涵和江丰曾具体分析了全国美术界可供他們拉攏利用的力量，作出了很"乐观"的估計。彥涵並在江丰授意下，在美术界散佈將来美协領导要"民主"选举，反对領导上提出候选人名單。他們甚至已內定了美协領导机構的人事安排，以"建立以江丰为首的王国"。彥涵並和江丰說过，要与文学界"配合一起搞"，"把这些官僚主义者搞下去！"。如果这一陰謀不能得逞，他們就要退出美协，分裂美术界的团結。

（三）錯誤的根源

彥涵所以会犯以上的錯誤，是有其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

彥涵在入党时，即隐瞞了自己参加过复兴社的历史；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时，虽然作了初步的交代，仍然隐瞞了受特务訓練等活动；直到解放后，彥涵在为其他复兴社分子写証明材料时，竟然还予包庇。長期以来，彥涵在思想、立場上一直和党是兩条心。

肃反运动中，党审查了彥涵的历史，严肃地作出結論並予以寬大处理之后，彥涵不但不深刻反省自己对党不忠誠的严重錯誤，反而污蔑肃反运动是"整人"，發展到与反党分子結成集团，进行反党活动。

由于彥涵和党是兩条心，一貫把个人的利益摆在党的利益之上，"党員"不过是他獵取名誉地位的招牌。因此，当他在版画

創作上有了一些"成就"时，他並不看成这是党和人民对他的培养，却看作是"个人奋斗"得来的。甚至当作向党威胁的資本。虽然党对于彥涵的創作时間、条件以至級別、待遇，都給予了优厚的照顧，但仍不能滿足彥涵个人的私慾和野心，最后走到公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四）对錯誤的态度

經过美协、美术界大小会議的揭發批判，彥涵对自己所犯的罪行，已基本上交代清楚，本人已表示低头認罪，願意悔改。由于彥涵历史上表現对党不老实，慣于玩弄兩面派手法欺騙組織和迷惑群众，这次是否眞誠改过，必須長期加以考察监督。

（五）結　　論

根据以上事实及分析，彥涵具有腐朽的資产阶級的个人野心，在江丰反党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中，起有極重要的謀划、宣傳及組織作用。彥涵惡意地攻击党的領导，反对党的文艺政策，誹謗肃反运动，並进行反党小集团的組織活动。以上錯誤的性質已經不是一般党內錯誤間題，事实証明，彥涵已墮落变質成为一个党內的右派分子。

（六）党內处分

一九五八年一月八日，美协党支部召开了党員大会，經过严肃地討論同意以上結論。同时討論了对彥涵的党紀处分問題，到会正式党員十八人一致通过。为了純潔党的队伍，开除党內右派分子彥涵的党籍。（表决时本人棄权，但發言表示同意以上处分。）

中共外文出版社圖書年鑑
編輯部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
刘尊棋的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刘尊棋，男，四十六岁，湖北鄂城县人。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七月被国民党逮捕入獄。一九三三年五月自首变节被釋，从此便为張学良的特务系統搜集情报。一九四〇年于伪中央社总編室工作期間領到国民党党証。一九四一年一月在軍統特务头子戴笠的安排下，派遣到新嘉坡的“南洋商报”工作，並为軍統搜集情报。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入美国新聞处任中文部主任，从而积極为美帝献策，忠实效劳。一九四七年三月随晏陽初赴美考察新聞工作。一九四八年由美返抵香港主編英文周刊“远东公报”。一九四九年二月混入我革命队伍，任南京軍管会新聞处副处長。一九四九年九月任新聞总署国际新聞局副局長。同年九月二十三日隐瞞了个人反革命历史，混入我党組織（經中央組織部决定重新入党）。

刘尊棋在外文出版社任副社長期間，在幹部工作中一貫採取反党的路綫，他曾吸收了一批政治面目不清的和历史反革命分子来我社工作，並予重用，但对我党老幹部和能堅持原則的党員加以歧視。他对党組織所进行的幹部政策檢查工作採取了消極对抗和陽奉陰違的态度。在業务工作中也一貫堅持資产阶級的新聞观点，反对新聞工作中的党性原則。上級領导虽然兩度檢查了他所領导的杂誌的右傾，但他採取了兩面派的手法，口服心不服。

肃反初期，他利用职权庇护反革命分子，反对批判反革命論

調，說什么："不能光憑着是党員就批評人家"。在肃反运动进入联系实际揭露和批判反动言行的时候，刘曾借文化部有指示为名，沒有通过五人小組負責人，就擅自責令五人小組办公室停开斗爭会。

尽管党組織給刘尊棋最大信任，批准他重新入党，但他在入党时，特别是在肃反运动中並未低头認罪，主动地向党交待自己的历史反革命罪行，仅在确鑿的証据面前作了很不徹底的交待。

肃反后，刘被調到英文部作核对工作，这对他来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反省悔过机会，但他並無悔改之意，反而經常在群众中夸大工作中的缺点，散布对党組織和行政領导不滿的空气。

这次整風运动中，他配合我社的右派分子向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在会上和墙报上發表了極其惡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他企圖借此机会进行翻案，歪曲肃反运动中組織上对他的审查。他还以过去領导人的身份出来为右派作証，他說："三四星期以来同志們所揭發的事实，有不少我可以印証，完全是对的"。他否定肃反成績，揚言說："肃反前几年中，在政治上被怀疑的幹部名單不是逐年縮小，而是逐年扩大"。他誣蔑党的幹部政策是"宗派主义"，挑撥党和知識分子的关系，造謠說党对知識分子"交而不信"。又說："几年来对非党幹部猜疑打击过重，团結帮助太少，党群关系紧張。"他煽动知識分子脫离党的領导，說："对非党知識分子的积極作用估計过低，忽視他們对革命事業的热忱，蔑視他們可以貢献的力量"。过去我社領导的党員对非党幹部的观察估計是夸大缺点，抹杀优点，只看过去，不看現在和將来……"並誣蔑党員幹部說："……硬把德才不兼备的党員放在負責崗位上。"甚至他狂妄地要党員下台，說："有自知之明的同志应該响应……号召。"最后，他攻击党的領导核心，說："領导人可以忙于一切其他事，就是不必鑽研業务，掌握業务，好象在一切其他方面都不能有錯誤，而在業务上搞得多么糟也不算失职。"

反右斗爭开始以后，他看情势不对，便採取了先發治人的办法，曾在黑板报上，大会上作了檢討，也写了書面材料，但在所有的这些“檢討”中，都沒有徹底揭發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質。

鑒于上述事实，足以証明刘拿棋是一个叛党的变节分子，也是一个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虽然我党曾給他重新入党的机会，但他並未自新悔过向党誠恳坦白自己的反革命罪惡事实，反而当他的罪行已經被揭露，仍不做徹底交待，並在事后寻找各种机会，特别是这次鳴放时期，向党进行惡毒地进攻又成为右派分子。据此，支部全体十九名与会正式党員經討論一致通过將叛党变节分子兼右派分子刘拿棋开除出党，以純潔我党队伍。請上級党委予以批准。

中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業管理局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英敏的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李英敏，原名何世权，曾用名李毅生，男，四十二岁，广东北海市人。家庭出身小資产阶級，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李自入党后，历任广东合浦县委宣傳部長、合浦县白石水区区委書記、瓊崖特委宣傳部副部長、瓊崖縱队政治部宣傳部長、瓊崖区委宣傳部副部長、海南島区区党委宣傳部部長等职。一九五四年由电影剧本創作所調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業管理局副局長。

李参加革命后屡犯錯誤：一九四〇年在广东合浦县白石水区任区委書記时，因不服从調动受到党的口头警告处分。一九四八

年三查三整运动中，因自由主义散布流言蜚語受到降职处分。一九四九年在海南島五指山根据地处理特务案件时，因刑訊逼供錯杀人命，受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此次整風运动前后又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錯誤，定为一般右派分子。

李英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言行如下：

一、整風运动前后，曾写四篇反党文章，夸大缺点，抹煞羣众文化工作成績，攻击党的羣众文化方針。他說："文化館只有几本破書，經常鎖着門""許多生龙活虎的幹部到了文化館就意志消沉"。又說："农民的生活就是生产、开会、睡覚""工人职員在假日無聊到数电綫杆，在街头上閑逛。"他認为产生这些严重問題的根本原因是領导不重視，"方針上大有問題"，說領导上只重視"錦上添花"的工作，不重視"雪里送炭"的工作，"重公輕私，重大輕小""重專業团体，輕羣众文化""一艺术，二电影，談到羣众文化沒有影"。他以羣众文化領导者和文化館幹部的关怀者自居，为羣众請命，企圖达到独創局面，显赫自己的个人野心。由于这些文章在报紙上和內部刊物"文化館工作"上發表，毒素散布全国，在文化館幹部中有了不小的影响，使社文工作受了一定的損失。

二、煽动羣众，攻击領导。在一九五七年五、六月間召开的城市文化館工作座談会上，他几次写条子給代表，鼓动他們攻击領导，有些代表提出用"送上門"去的办法到人民日报去，几乎鬧事；他在这种情况下，採取縱容的态度，說："当然不主張鬧事，但羣众一定要鬧，我們也沒有办法"。他还鼓动文化館处幹部把北京文化館幹部鳴放座談会上有右派言論的記录送一份給周总理。

三、散布破坏中苏友誼的言論。匈牙利事件發生后，他說："大国沙文主义与干涉內政提法不同，实質是一样的""中苏共管中長鉄路，苏联在旅大駐軍以及新疆合营有色金屬公司等"事实說明了苏联干涉了中国的內政。"

李英敏上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錯誤是严重的，而且在历史上一再犯錯誤，党对他过去所犯錯誤虽曾进行多次的教育並予以紀律处分，但沒有引起他的警惕，資产阶級的个人主义思想不仅沒有克服，反而一天天的發展，在最近一次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撤銷不久，又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的政治性錯誤，这說明他由一个党員墮落为一个反党分子，失去了党員应有的条件。为純潔党的队伍，严肅党的紀律，支部大会全体党員一致通过，决定給予开除党籍的处分。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中共"新观察"杂誌社支部党員大会关于开除戈揚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通过

戈揚，女，四十一岁，江苏省江都县人。个人成分学生，家庭出身地主。一九四一年六月参加革命，同年八月入党。曾任新华社苏北分社、山东大众日报、山东潍坊日报、新华社华东总分社、解放日报北京办事处主任、採訪部主任等职。一九五〇年任新观察杂誌社主編。

近年来，戈揚参加过多次政治运动，但每次她都以"左"开始，以"右"結束。她的机会主义思想是严重的。一九五六年肃反总結时，她的右派思想已很明显，到一九五七年整風运动中，戈揚就更进一步墮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在反右派斗爭中，新观察編輯部前后开过十一次会議，对她的反

党言行进行了严肃的斗爭，根据所揭露並查对属实的材料，戈揚的主要反党事实如下：

五六年十月肃反总結时，戈揚附合右派分子黄沙、張鳳珠等人对肃反的攻击，否定肃反的成績，認为肃反不应採取羣众运动的方式，她說："如果苏共二十次党代会早开半年，我們可能不用这种方式搞肃反运动了。"又說："民主人士曾对我們的肃反提过意見，中央沒接受，出了偏差，現在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是党的自我批評。"不仅如此，肃反总結会上，正当作肃反工作的同志遭到惡毒的攻击之后，她还誣蔑說："党員过去拿政治唬人，今后可不行了。"

整風运动中，正当社內外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戈揚显得很活躍，曾經有一次在編輯部的很多人面前說："过去历次运动，我都是战战兢兢怕犯錯誤，唯有这次反教条主义，我是心情愉快的。"又說："教条主义束縛人，过去作一个党員，不是当瘋子，就是当死人，心里話只能在自己房里講講，进办公室后就不同啦！"右派分子黄沙說："思想改造是科学問題，現在却动不动就查祖宗三代，……"戈揚立刻拍拍地主家庭出身的謝光昭（亲屬中有人在一九五一年鎮反时被鎮压）的肩膀說："咱們这些地主出身的人，体会就更深刻。"这里不难看出：戈揚坚持自己剝削阶級立場，抗拒党的思想改造是多么剧烈；她所謂的"教条主义"，实际就是馬列主义、就是党。这一点从她的另外一些反党言論里可以得到証实。她在反教条主义的同时，一再表示她自己过去就是一个严重的教条主义者，原因是她参加革命的二十年，正是斯大林当政的二十年。她还对黄沙說："文化界有三害，就是周揚、錢俊瑞、陈克寒。"

她認为官僚主义是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是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她說她自己就是一个官僚主义者，但是另外的人处在他的地位，也不免要犯官僚主义，要徹底解决这个問題，只有从制度上改变。黄沙說："資本主义有一套完整的机

構，把什么人按上都不会犯官僚主义。”戈揚对这話很贊賞。黃沙說，有人說內务部本身就是官僚主义机構。戈揚也很称贊，胡考要黃沙把它写成文章，戈也同意。

戈揚站在她的反党立場，把反党美其名为“有独立思考”，誣蔑执行党的政策、堅持党的原則的同志为“沒有独立見解的人。”她說：“我过去凈作听話的党員，今后对誰的話也要独立思考一番，就是对中央負責人的話也不例外，因为党也是会犯錯誤的。”

由于戈揚已墮落成为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同时她又担任着“新观察”主編这样重要的职务，因此，在工作中对党起的破坏作用也是严重的。从五六年十月肃反总結以后，她就公开在羣众中打击那些堅持党的原則的党內外老組長，說他們是“教条主义者”，是“老狗攔路”，使他們难以进行工作，后来就更进一步借故把他們从工作崗位上調开，使他們無职無权，或干脆調出去。而另一方面，她又大力扶植右派分子黃沙、龔之方、張鳳珠和有右派思想的朱行、盧盛法等，說他們是“先进派”是“新生力量”。就这样，新观察的右派在她的支持与鼓励下，在編輯部形成了一股有力的反党逆流，便刊物向右倒，越倒越深，發表的毒草越来越多。戈揚还利用职权，派人各处調查，專門揭露所謂社会“黑暗面”。在党內戈揚也打击好同志，扶植右派，她曾提議張鳳珠作支委，理由是她可以代表一批人（即代表黃沙、朱行、龔之方、盧盛法等）。总之，戈揚在篡改新观察的政治方向上，起了重要作用；在新观察的右派向党进攻中，她充当了組織者与指揮者。至于由她組織和經她手發出的毒草，那就不必一一例举了。

右派头子費孝通，通过他的学生黃沙入新观察以后散佈了不少反党論調，戈揚都接受了，費孝通說新观察还沒“解冻”，戈揚立即召开編輯部会議，研究如何“解冻”，並且自己还写了兩篇短文“春風及其他”（五七年九、十期），宣傳費的“春寒”

論点。費孝通写的歪曲农業合作化的"重訪江村"一文，她認为很好，而且給加了按語，發表在刊物的重要版面上。

五七年五月底六月初，戈揚的反党已达到瘋狂地步，那时刊物已經放出很多毒草，可是戈揚还嫌"鳴放"得不够，又一次召开了編輯部会議，决定"大鳴大放"，採用本刊記者向編輯部匯报的方式發表文章。于是調兵遣將，分头到教育界、文学界、戏剧界、美术界採訪。結果又写出了一批更加有毒的文章，那就是黄沙和朱行合写的"北大学生是不是在鬧事？"李今写的"为什么放得不够？"和朱叔和写的"工艺美术界的風波"。戈揚自己又亲手写了一篇批評"人民日报"标題的短文，認为"人民日报"六月四日將李維汉同志在中央統战部报告中所說的"有相当一部分意見是錯誤的"作为标題，是沒有貫徹"鳴放"方針。当决定黄沙等去写煽动学生鬧事的"北大"文章时，費孝通曾怀疑戈揚"抗不住"，黄沙向戈揚轉达了費对她的怀疑，她却坚决回答："我要拿党籍来幹！"文章写成以后，戈揚大加贊揚，說"这是有高度馬列主义思想的文章。""北大"文章在付印后（六月八号），戈揚已經看到中央关于不准报道学生大字报的指示文件，她不立即执行中央指示，反而把这份中央文件（电报）拿給羣众看。作协党組决定抽掉"北大"文章那天，費孝通在她家，为另补文章的事，費孝通在旁边对她說要給写一篇"言者無罪"，她未加反对，但因費馬上要去开会不能写。接着費又向她建議："你發一張美丽的照片，叫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被开了天窗了！"果然，就在刊物的头一版發了一張堂·吉柯德的画。她写的批評"人民日报"标題的文章，被"人民日报"同志發覚后，再三劝她抽下来，而她最后还是頑强地把它的內容稍加修改，又加在李今写的"为什么放得不够？"一文中。

此外，戈揚与文艺界一些反党集团——丁、陈反党集团、江丰反党集团、吳祖光的二流堂等，都有一些关系，对他們的反党言行，寄予了不同程度的同情与支持。

以上事实說明，戈揚的反党罪行是严重的，她已經墮落成为向党进攻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根据三中全会处理党內右派分子的原則，为了严肃党紀，純潔党的队伍，維护党的团結与統一，經中共新观察支部全体党員大会以十一票一致通过开除戈揚的党籍。並建議行政撤銷其新观察主編的职务，降低級別三級（由行政十一級降为十四級），另行分配工作。

中共团中央宣傳部支部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陈緒宗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三日

陈緒宗，男，三十九岁，湖北黄岡县人，家庭出身資产阶級，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九年一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四零年三月参加工作。一九五五年六月以前是青年团二屆中央常务委員，任中国青年报社总編輯、社長。在肃反初期因与反革命分子胡風有联系被停职反省，后来又由于审查他和他的妻子反革命分子金怀瑾的关系問題，至一九五六年八月始恢复工作。現無职务，級別十級。

陈緒宗在过去与反革命分子胡風有較長时期的来往，向胡風洩露了很多党的机密，犯有严重的政治錯誤，丧失了党員的立場。当一九五六年三月，陈緒宗的反革命妻子金怀瑾的案件被揭發后，他拒絕党的多次批評教育和忠告，猖狂地反对党所作的金怀瑾是反革命分子的結論，一再为反革命分子金怀瑾翻案；並且打着"老党員""負責幹部"的招牌出庭为反革命分子金怀瑾辯护，在法庭上攻击党，污蔑党；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时，又企圖通过社会上的右派为金怀瑾翻案；並且違法和罪犯来往及私通信

件。这样，陈緒宗已完全变为党的叛徒，成为反革命分子在党內的代言人，墮落为右派分子。为了保持党的純潔，严肃党的紀律，支部大会决議將陈緒宗开除出党。

以上决定于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六日經支部大会通过。到会十四个正式党員全部贊成。

附：关于右派分子陈緒宗的政治結論

一、簡历

陈緒宗，男，現年三十九岁，湖北黃岡县人，家庭出身資产阶級，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九年一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四零年三月参加工作。一九五五年六月以前是青年团二屆中央常务委員，任中国青年报社总編輯、社長，因与反革命分子胡風有联系被停职反省，在肃反中又由于审查他和他的妻子反革命分子金怀瑾的关系問題，至一九五六年八月始恢复工作，現無职务，十級干部。

二、竭力为反革命分子金怀瑾翻案，走上叛党道路

（一）反对党对金怀瑾所作的結論

金怀瑾是混入党內的阶級敌对分子，是現行反革命犯。从一九五二年七月到一九五五年十二月，金怀瑾在中国青年报社工作期間，先后發出了十封匿名信：制造混乱、破坏肃反运动；捏造事实，陷害革命幹部；仇恨、污蔑、恐吓党和領导同志。这些罪恶活动給党造成了严重損失（見附件九十二頁——一百一十三頁）。一九五六年三月金怀瑾反革命案揭發后，公安机关將金犯依法逮捕，並由檢察院向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这时，陈緒宗千方百計为金怀瑾辯护，猖獗地反对党所作的：金怀瑾是反革命分子的結論，到处散布团中央对金怀瑾处理不当的謬論。党对他进

行了多次批評教育和斗爭，甚至提出“不改变观点，要考虑党籍”，他不仅不听党的忠告，反而对党深怀不満，在給罪犯金怀瑾的信中謾駡党是“主观主义者”（見附件五十四頁），借他母亲之口誣蔑“共产党拆散人家的夫妻，不近人情”等反动言論。

（二）扛着“老党員”、“負責幹部”的招牌，在法庭上污蔑党，攻击党。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金怀瑾为反革命分子，判处三年徒刑后，陈緒宗的反党鋒芒走向高峯。到处奔走，为金翻案，甚至扛着“老党員”的招牌亲自質問法院“为什么判金怀瑾是反革命”，写信埋怨金怀瑾在法庭上“辯护軟弱無力”。虽金已認罪，但陈緒宗不服，要她翻案上訴（見附件五十三頁）。法院受理金怀瑾的上訴后，陈緒宗竟不請示党而代金怀瑾請律师，向律师（非党員、右派分子）洩露中国青年报某些幹部的政治情况和公安部偵察特情的党內机密；又拒絕党委的劝阻，亲自出庭为反革命分子金怀瑾辯护，他不以为耻說：“我認为一个共产党員到法庭上去辯护是可以的，宪法和法律上都有这样規定，而宪法是党参与制定的。”他还与右派律师分工，由律师辯法律部分，他辯事实与理論部分，在法庭上用尽了一切惡毒語言污蔑攻击党（見附件三頁一二十八頁）。他歪曲事实，顛倒黑白，將金犯有意制造机关混乱，陷害革命同志，說成是出于“良好动机”；將金犯辱駡恐吓領导，要杀領导全家，說不是出自金犯“眞心”；更卑鄙的是在法庭上扛着“老党員”、“負責幹部”的招牌，將金犯的罪責嫁禍于党，說金之所以犯罪“是她的意見沒有引起領导上足够的重視，或重視了而未採取积極行动”的結果，“造成了罪果不能完全由被告担負”。說金怀瑾承認反革命性質是由于“在报社隔离期間别人啓發”和“預审員一再追問的結果”。

（三）陰謀依靠資产阶級右派力量，为金怀瑾翻案。

陈緒宗为了保护反革命妻子金怀瑾，抱着“不怕丢掉飯票、

选票、党票的决心”和党斗争到底。他准备在高級人民法院維持原判时，上訴到最高人民法院。說是“为了眞理”。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他感到“是气候”。許多右派言論都引起他的共鳴，說“譚惕吾的發言还能自圓其說”，認为“黃紹竑关于法制自治言論很对”。当他看了黃紹竑講的“百分之二、三的錯誤案，不知多少人家破人亡”的謬論以后，就决定依靠所謂民主人士即資产阶級右派向党进攻。五月十九日，他背着組織通过金怀瑾的右派分子哥哥写信給金的資本家父亲，以亲朋密友的面子請邵力子和右派分子黃紹竑等去为金怀瑾翻案。他对人說：“我母亲、金怀謹的父亲和哥哥去找邵力子都好見，他們去找民主人士是可以的，唯有我是共产党員，不好出头”。反过来他又对撤銷他的人大代表感到可惜的說：“我去年是人大代表，現在被撤銷了，否則我也可以去法院查卷的”。(見附件四十八頁、六十六頁)他的这些罪恶活动是与金怀瑾共謀进行的，在反右派开始金甌坦白了这件事后，他唯恐金怀謹被动，立即非法找人轉告金怀瑾“金甌已坦白，找民主人士的事不行了”，要金怀瑾准备交待（見附件三十九頁）。

（四）陈緒宗違法和罪犯来往及私通信件。

陈緒宗为了与反革命金怀瑾私通消息，串通口供，除通过右派律师和医院医生以外，还違犯法律規定，秘密和金怀瑾通信。在金上訴未判时，金曾于一九五七年六、七月通过兩个女犯人私自帶三封信給陈緒宗。他明知这是違犯法規，不但不向組織主动交待，反而撕毀罪据，企圖隐瞞。当別人揭發后，他才不得不承認。他还將兩个送信的犯人看为知遇恩人。在事情揭發后，他怕处分送信的女犯人，写信給領导說：“我感到良心上很痛……我請求政府酌情給这女人以寬大处理，最好不要給她刑事处分。如果要給予刑事处分的話，我請求讓我为她做兩件事：（一）在她受刑期間我愿意負責撫养她的兒子……（二）給她一些在监獄制度上不可能办到的物質帮助”。由此可見，陈緒宗与党完全站在

对抗的立場上了。

此外，陈緒宗在中国青年报社工作期間，他还利用党給予他的职权，在金怀璀写十封匿名信的过程中，將組織上掌握一些人的历史問題以及公安部傳达的敌情告訴了金怀璀，致使金怀璀进行反革命活动得逞。同时他又根据金所捏造的"反革命活动"材料，造成了很多同志政治上被怀疑。不經上級党委和公安部門批准，决定金怀璀监視某些幹部，为金怀璀进行反革命活动火上加油。金怀璀入獄后，又写信或通过医院医生指导金怀璀如何斗爭：要她有要求可以向监獄积極爭取"作正面斗爭"，告訴她法院有很大可能会改判，說"你要有充分信心，我是决定为眞理为事实而奋斗到底"；要金怀璀經受起"打击"；告訴金怀璀"目前正在搞反右派斗爭，法院是否会受当前空气和外力的影响，則很难說"等等。

陈緒宗在与反革命分子胡風来往中，也犯有严重的政治錯誤，丧失立場。一九三七年在汉口时，陈由于崇拜胡風，給胡風写了第一封信，期待胡風解决他"寂寞和苦悶"的心情。一九三八年，胡風到复旦大学任教授，陈緒宗在該校讀書，和胡風的来往更加頻繁。由于臭味相投，陈緒宗到延安后还与胡風通过信，一九四九年胡風从香港到解放区，他們又恢复了密切关系，不是互相走訪，就是函件来往。陈緒宗向胡風洩露了很多党內机密，並且肆意对党进行誣蔑。如說延安整風时整了許多人，自己也挨了"整"，流露自己对党审查不满；告訴胡風团中央高級幹部的情况，洩露和夸大我們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散布"土改中曾有杀人多少为發动群众与否的标准"等誣蔑党的話。陈緒宗还介紹胡風分子罗洛到团华东工委和华东青年报工作，介紹梅志（胡風的老婆）和新少年报、少年兒童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接洽刊載或出版梅志的"作品"，吹噓罗洛是个"人材"，梅志是"有名作家"。在梅志写的有严重錯誤的"小青蛙脫險記"上批"我已看过，很好可用"，要新少年报登載。这一作品在文匯报登出后，

不久即受到批判。

一九四九年陈还要胡風要求入党，認为胡風已够入党条件，並建議胡風有意見“可向中央提”。这与胡風反革命集团的反党策略“不謀而合”。当右派向党进攻时，他看到林希翎說胡風不是反革命分子也表示同情，五月十九日他和右派分子金甌發洩了过去党对他审查不滿以后說：“老实說，我在胡風問題上所犯錯誤沒有什么了不起”。並在趁党整風机会为自己翻案，說肃反时叫他停职反省“是不必要的”，“是与中央精神不符的”，攻击团中央当时的正确措施。

陈緒宗的叛党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大資产阶級家庭，入党后沒有認真改造自己。在党的历次运动中，又不認真改造，始終对党抱有二心，最后走上了叛党的死路。他說：“兩年来我积累了三条經驗：（一）千金易得，知己难求；（二）信任是虛，本領是实；（三）人事复杂，天真不得”。这就完全暴露了：他的資产阶級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对党对新社会的極端惡毒的污蔑。

三、运动中表現

陈緒宗在反右派斗爭中，抱着抗拒的态度，毫無真誠悔改之意。在未批判他之前，就緊張的布置防綫：埋怨右派分子金甌不应該揭發他講的不要“三票”和“民主人士的問題”（見附件四十九頁）；布置不要把“监獄犯人帶信給他的事說出来”；（見附件四十七頁）；甚至还企圖同右派分子陈模的妻子訂立攻守同盟（見附件四十五頁）。八月十三日批判他的会議开始后，开始力圖用所謂“事实邏輯”来“說服”大家，待辯論繼續深入以后，他因理屈詞穷害怕“兇多吉少”，“不愿再辯論下去”，並且狡猾抵賴，公开頑抗。在最后一次批判大会上他仍說：“在金怀譴是反革命这一点上，我还沒想通”。他的書面檢討也極不深刻，也很不老实，还是避重就輕，就事論事，不接触問題的本質。

在肃反运动中，开始审查与胡風的关系問題，态度上也是極

不正确，抵触情緒很大，在停职反省的当天下午竟撕毁載有和胡風关系的日記。

四、結論和处理意見

陈緒宗虽然不是胡風反革命集团的成員，但他在与胡風接触中，犯有严重的政治性錯誤，丧失了党員的立場。

陈緒宗抗拒党的多次的批評教育和劝告，为反革命分子金怀謹翻案；並且出庭为反革命分子金怀謹辯护，在法庭上攻击党污蔑党；在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时，又企圖通过社会上的右派为金怀謹翻案。他已完全变为党的叛徒，成为反革命分子在党內的代言人。反右派斗爭中态度不老实，最近还恳檢查。給予开除党籍撤銷原有职务实行留用察看的处分。

註：附件从略

中共中国青年出版社編輯部支部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庚的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二日

一、簡历与概況

李庚原名李賡，笔名孟凡、顏浩，男，四十一岁，福建閩侯人，出身于官僚家庭，本人学生成份，大学文化程度。一九三七年九月入党，曾被停止党籍。一九四五年六月重新入党。现为国家行政級十級幹部。

二、主要右派言行

（一）搞反党小集团，散布反党言論，策动社内右派分子制造所謂“李庚事件”，向党进攻。

“鳴放”期間，他积極地策动了党內右派分子彭子岡、邢舜田、刘重和特务嫌疑分子姚平及其他一些对党不滿的人，向党进攻，他一方面通过他們了解掌握出版社的“鳴放”情況（註：当时李已調美术学院），另一方面又向他們散布了許多反党言論，供給了他們向党进攻的彈葯，他宣揚社內“左傾”严重，說去年党組扩大会議对他的批評很不“公道”；揚言他所以离开出版社是因为“处得不愉快”的緣故，“現在总算跳出是非圈了”，說什么“我是有缺点的”，但“是非自有公論”，表示自己受了委曲，是被“宗派”排挤走的。在李庚的煽动下，我社右派分子彭子岡等人就異口同声地說李庚离社是“党內宗派的典型例子”，掀起了一个有八十多人签名“要求徹查李庚离社眞相”的反党高潮。当时，出版社党組几次要求李庚回社向群众作解釋，但他却幸災乐禍地說什么“公道自在人心”，始終拒絕党組的要求。在这个問題上連彭子岡自己也承認，他們几个人是个“無形的小圈圈”；刘重也說李庚一走，自己大有“孤死兎悲”之感。由此可見他們之間已形成了一个反党小集团。

（二）进行恢复“开明書店”的陰謀活动，企圖搞垮中国青年出版社。今年初，李庚一面請求調离出版社，一面开始活动恢复“开明”；就在今年春天，社会上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李庚的活动也就更加积極起来。他一方面背着出版社党組，以私人名义上書陆定一部長和出版局黃洛峰、金燦然等同志，要求恢复开明書店，提出了包括人事、經济、出書方針等恢复开明的具体方案。同时还欺騙領导，說原“开明”同志也“頗有此意”。另一方面，他裝出領导上有意恢复“开明”的模样，向原“开明”上層人物如叶聖陶、顧均正、唐錫光、覃必陶、叶至善

等同志进行鼓动。总之，他欺上瞒下，积極活动恢复"开明"，蓄意搞垮中国青年出版社。他說"自己走了，'青年'怎样，好象不关我事了"，又說自己"是不惜拆散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这些話就充分地說明了他在恢复"开明"，搞垮"青年"的陰謀目的了。

（三）攻击新中国出版事業，反对学習苏联先进經驗，主張恢复資本主义的"出版自由"。李庚反对党对私营出版社的社会主义改造，說这"不是改造，是取消"，是"根本不承認中国近代出版事業有什么自己的傳統和經驗"說"实在沒有道理"，"是对民族遺产虛無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現"；又說学習苏联是"仿苏的一套，有許多不妥当"的地方，說出版工作計划化是"作茧自縛，产生了許多罪果"；在他"看来'出版体制'是非变不可了"。因而主張从根本上改变出版事業的現狀，主張恢复"商务"、"中华"、"开明"等旧書店，說旧开明"什么書都出"是好"傳統"，"开明"是一个很好的"爭鳴园地"。他提出了从"根本上改变今天的編輯工作制度"的办法，企圖把社会主义的編輯幹部蛻变成为"一批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自由职業者"。他还鼓励右派分子陈斯庸办"同人書店"；並且揚言自己也要搞一个"同人刊物"，与"中国青年"唱对台戏。

（四）惡毒地攻击党的政治工作和政治运动。李庚攻击党"不了解知識分子"，"把农村的一套带到城市里来了"，他認为知識分子在党內也是受压抑的，所以在看了費孝通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以后，感触頗大，揚言自己也要写一篇"党內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气"，甚至主張党內"办一个刊物"，讓大家自由"討論对工作的意見，自己的思想"，这样来开辟反党陣地，發洩他所謂"党內知識分子"的"抑郁"心情。他又攻击我社历次政治运动都搞"左"了，認为肃反也有扩大化；並且暗示这一切錯誤的来源是在团中央。他認为由于中央指示了百分之五的比率，下面就"反右了"，"把面斗寬了"，所以怀疑中央

“是否对运动估計过高”。他支持肃反被斗的特嫌分子姚平写墙报来攻击肃反；同时他又誣蔑“三反”运动，煽动“三反”被斗的人起来翻案，並且揚言在运动中批評他右傾也是错的，甚至說我社的政治工作“不是在建立党的政治威信，而是在破坏党的政治威信”。

（五）策应江丰反党集团向党进攻。李庚在中央美术学院参加了江丰布置向党进攻的“五月会議”。同时又給江丰反党集团出主意。及至江丰集团被揭露后，他又主动地为江丰打掩护，給反党集团骨幹洪波、馮法禩等通風报信，透露了文化部領导的反右意圖；並且一再上書文化部党組、錢俊瑞部長，还亲自找夏衍部長談話，为江丰遮盖，說他“有長处”，还說“只是思想問題”，不是反党活动。总之，李庚在江丰反党集团被揭露的前前后后，充当了策士和保鏢的角色。

（六）反对党对文化艺术工作的領导。他攻击文化部“文化不多，武化多”，他駡周揚同志是“总結家”、“教条主义的老根子”。在文艺思想上主張明知是毒草，也不要“一棍子打死”，並且公开著文反对文艺界对“草木篇”反动詩的批判，說这篇反动詩不过是“充滿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身上一种不健康的气味”而已。

三、历史上的政治錯誤和日常工作表現

李庚出身于官僚家庭，存在着極端严重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虽然經过了党二十年来的培养教育，他並未得到改造；总是屡犯錯誤，一貫反党。远在入党以前参加地下学联工作时，就曾被捕自首，出卖学联組織和同志。后来隐瞞了这个历史关节混入党內。入党后，曾大量貪污革命基金，生活腐化。一九三九年又企圖建立一小資产阶級政党，与国共兩党鼎分天下，还写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文章，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但他拒絕党的教育，坚持錯誤，因而被停止党籍。一九四四年五月在

苏北工作期間，因严重貪污和政治嫌疑被扣押五个月。一九四八年起与其××姘居，再受党紀处分；“三反”中又因右傾遭到批評。他平日私自抄摘机密文件，經常不过組織生活，不按規定繳納党費，生活作風上有严重的資产阶級傾向，也受到过党內批評。所以他一直对党不满，到了“鳴放”期間，就乘机向党猖狂进攻。

四、运动中表現

李庚在运动中避重就輕，及至大量事实揭發以后，才逐漸低头認罪；但背后却对人說：“象我这种人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些人“今天批判我，但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以后，还不知道到底誰敢站在前面？”。而且提出了二十九条所謂“与事实不符”的意見經批判后認罪。

五、結論和处理意見

从历史上看，李庚是一个長期混入党內的阶級異己分子，是一个老牌的右派分子，清除李庚出党，行政上給予撤銷原有职务，实行留用察看的处分。

中共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二支部
关于开除彭子岡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三月七日

彭子岡已經墮落成为右派分子，茲决定开除彭子岡的党籍。

附：关于右派分子彭子岡的政治結論

一、簡历

彭子岡，女，北京人（原籍苏州），現年四十四岁。家庭出身資产阶級，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四年調旅行家杂志任主編。行政級别十一級。

二、主要右派言行

（一）彭子岡是右派分子利用"左叶事件"向党和人民政府进行惡毒进攻的急先鋒。她根据文匯报右派分子刘光华歪曲事实的报道，替文匯报写了一篇題为"尊重新聞記者"的社論，咒駡党对新聞事業的領导。她在社論中說："卑視新聞記者在我們国家是有傳統的，遺憾的只是这个衣鉢竟傳到如今。"誣蔑人民政权仍是"把新聞記者看作討厭人，防范而不是合作，卑視而不是尊重，种种旧作風还是存在的。"借以挑撥新聞界对党的不滿。並叫囂說："我們可以下这样一个定律：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記者、怀疑記者的。"她公然号召："这倒也是新聞工作者应該不平則鳴的时候了。"煽动新聞界起来反对党和人

民政府。

（二）鳴放期間，彭子岡大量著文，攻击社会主义新聞事業，吹捧資产阶級旧报紙的傳統。她認为解放后新聞事業是“以量取胜”、“埋沒人才”、“無法發揮記者的新聞敏感与創造性”，党报的領导同志是些“不知在作些什么的人”。她否定今天的記者工作，說記者們对工作“並無兴趣”，写的“稿子質量不高”，“不見記者的神笔与慧眼。”她把解放后的新聞事業描写成糟糕得很，毫無可取之处。但他对資产阶級旧报紙的傳統却歌頌备至。她宣揚旧大公报的傳統是“勤勉与效率”，吹嘘旧大公报的記者的“独立思考精神”；把反动的文人政客、旧大公报的老板說成是放手信任記者”，“不常向記者指示什么”非常尊重記者的“独立作战能力”、开拓“自由天地”的聖者和賢人。因此，她認为現在新聞不自由，主張自由办报、自由採訪。反对新聞送审制度，宣揚記者要“独立思考”、“痛恨时弊”，“暴露陰暗面”。並主張“由几个志同道合的人”来“自由結合”办“同人报紙”或“同人刊物”。其目的就是不要党来領导报紙和刊物。

（三）正因为彭子岡竭力响往資产阶級旧报紙的傳統，对党所領导的社会主义新聞事業怀着强烈的不滿情緒，因此，在右派分子进攻之时，她就积極参与了章罗联盟指揮新聞界右派向党进攻的內应和謀士。她曾积極帮助儲安平篡改光明日报的政治方向，参加儲安平所設計的“編輯顧問团”，她建議光明日报从民主党派监督党的角度出發，报道物价、日常用品供应困难，家庭主妇排队买菜等新聞，反映“小百姓”的不滿，煽起人民对党的不滿。对光明日报內部主要人物安排，排挤共产党員、重用右派分子等一系列活动，她都向儲安平献了策。与此同时她也参与了大公报社右派分子朱啓平、肖离、肖鳳等复辟旧大公报的陰謀活动。

（四）六月八日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論和批判儲安

平的"党天下"文章發表后，彭子岡又先后兩次与右派分子浦熙修、費孝通、徐盈等秘密集合于她家和費孝通家策划向党进行反扑。她一方面竭力支持浦熙修發儲安平辞去光明日报总編輯职务的專电；一方面密商要写文章反駁人民日报，为儲抱不平。她还献策約王鉄崖来写反駁人民日报的文章。並到处奔走替儲安平辯护說，儲在統战部的發言（攻击党的發言）是幽默，中国人不象外国人那样懂幽默，所以一批評到領袖罪就大了。

（五）攻击党的領导，誹謗党的幹部政策和肃反运动。彭子岡在六月四日發表的"我社的內部矛盾"墙报中，大肆散布"外行不能領导內行"的謬論，攻击团中央的領导。污蔑团中央对出版社的領导是"一陣風主义"，是"以搞青年运动的方式来搞文化事業"。她認为团中央要办出版社是过去"教条主义地硬搬苏联經驗的結果。""要求团中央領导好出版社是过高的要求"，因为"团中央領导不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工作"，所以，"無論在出版社政策上、在人事政策上都是扭曲着的"，都是生硬得不符合文化工作的規律。

她污蔑党的幹部政策是"死扣政治条件，不問業务条件"，因而"造成政治和業务分家的恶性循环"。她污蔑党統一分配幹部的政策是無異古人所說的'学养子而后嫁'的一样不合道理。她認为我們"不認識知識分子的特点"，污蔑我們把知識分子看成是"旧"、"老"、"落后"，而且是用"一股歪風教育着青年人"，叫他們"看不起和怀疑旧知識分子"。並說出版社的宗派主义很厉害，李庚的走就是宗派主义排挤走的，到处为李庚抱不平。

（六）她反对党对私营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她認为"并掉开明，是当时政策上的偏差"，她說："我相信，开明書店会恢复的"。她攻击蔬菜業的合作化，她認为蔬菜業合作化搞得人民排队，引起苦惱，主張取消蔬菜公司，她否定解放后人民生活的改善，說今天的小孩子多是"瘦弱無精神"，連咸菜都吃不

上。

（七）利用职权，篡改"旅行家"的方向，栽植毒草，造成許多政治事故。彭子岡曾不止一次地企圖摆脫党对旅行家杂志的領导，以实現其办同仁杂志的目的。在編輯部內部打击党团員，对外拉攏右派作者，以致使旅行家杂志在一个时期中脫离了团中央規定的方針，閑情逸志和政治上反动的文章不断出現。据旅行家杂志初步檢查，不少的右派分子文章是彭子岡亲自約来的。这些文章中許多都是有問題的。

三、历史情况和表現

从这次斗爭中揭發的材料証明，彭子岡早在民主革命阶段，就是一个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作了許多反党反人民的事。一九四五年毛主席到重庆进行和談时，曾在一个妇女界集会上講話，当时的講話內容毛主席再三囑咐不要公开發表，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員的彭子岡竟在第二天就在大公报上發表了毛主席談話的新聞，使我党陷于被动。她在大公报当記者期間，写了很多污蔑党、丑化八路軍、污蔑进步人士的文章，而对国民党却歌功頌德。她把反共大本营的重庆，說成是"东亞的灯塔"，把蔣介石說成是"青天"，把司徒雷登說成是"爱中国也爱美国的和平老人"。解放后，党决定她去天津大公报工作，她抗令不去，並几次向人說她不想当共产党員了。以致失掉組織关系二年之久。由此可見，彭子岡虽然披了二十年共产党員的外衣，但她灵魂深处的資产阶級思想、立場、观点，却絲毫沒有得到改造，反而变本加厉地發展。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的时候，他就原形畢露，終于墮落成向党进攻的極右分子。

四、对錯誤的态度和处理意見

自反彭子岡右派言行开始以来，社內社外大小会議开了不下三十余次，彭子岡一直是拒不承認，無恥狡辯，态度蛮横，挟起

皮包要退会。在大量事实面前無法否認时，又避重就輕，假裝糊塗，用辞职、回苏州老家当家庭妇女等手段拒絕上班和繼續檢查交代，絲毫沒有一点願意重新作人的表示，直到今天，还在企圖翻案。态度極为死硬。因此，我們建議开除党籍，行政上給以撤銷原有职务实行留用察看的处分。

中共中国青少年报社第二支部关于开除反党分子陈模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日

陈模，男，三十五岁，江苏泰兴人，出身于貧农家庭，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八月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五月入党。（十一級）

陈模虽然入党多年，受过党的長期教育，並也曾为党做过一些工作，但是思想上並未得到徹底改造，在最近二年来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發展到極端严重的程度，狂妄地相信自己的能力已超过了党的組織，想以自己的"資本"跟党較量，在肃反期間，小組未执行肃清一切反革命的神聖任务，反而利用职权保护反革命分子金怀瑾；在鳴放期間，不仅放出"青年倒退論"对团中央进行惡毒的攻击，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歪曲党中央对团中央坚强的領导是"抽像的領导"，並借团的"三大"之机，亲自指揮記者到代表中去找矛盾、找問題，搜集所謂陰暗面的材料，进行点火活动；报社反右斗爭开始后，他以領导身份叫嚣斗爭右派分子刘宾雁的方針有問題，阻碍斗爭的开展，並为右派分子王亞生，詹寰等人开脫。陈模已經墮落成反党分子，为了保持党的純潔，根据中央关于清除右派分子出党的决定，和中国青年报社整

風領导小組对他的政治結論，决定开除反党分子陈模的党籍。

附：关于反党分子陈模的政治結論

一、簡历

陈模，男，三十五岁，江苏泰兴人，出身于貧农家庭，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八月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五月入党。一九四一年到延安后，曾在中央党校学習、工作，作过彭眞同志行政秘書；一九四五年后去东北，先后担任中共樺甸区委書記、中共哈尔濱市委学委書記、团哈尔濱市委書記、团松江省委副書記等职；一九五一年三月調来中国青年报，現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編輯。共青团中央委員。十一級。

二、主要反党言行

（一）在肃反問題上資敌叛党。

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时，陈模是报社肃反五人小組負責人。但是他在肃反工作上不但未执行肃清一切反革命的神聖任务，反而利用职权保护了反革命。开始，他对配备肃反專职幹部不积極，但又拒絕团中央派人帮助。在肃反对象排队的工作上，他一味坚持报社沒有那么严重問題。更严重的是表現在对待肃反对象、叛党分子陈緒宗的問題上，对团中央五人小組的領导一直採取对抗态度。党布置审查陈緒宗，陈模不但不以为然，反而無微不至地給以关怀和安慰，一再地洩露肃反情况和上級重要指示机密給陈緒宗。說：“你的問題中央說是政治問題，不叫你坐汽車是上級布置的……”，並把天津有人檢举××是托派，××入党問題不清楚等情况都告訴了陈緒宗，陈緒宗又轉告他的妻子、反革命分子金怀瑾，金利用了这些材料写匿名信，进行反革命活动。在陈緒宗已作为肃反对象情况下，他还把金当作积極分子使用，在

金的伪造材料下，搞了个假反革命小集团，使报社肃反运动曾一度發生混乱。当反革命分子金怀瑾案件破获，金犯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后，陈模还怀疑金犯是不是反革命，当陈緒宗給金怀瑾生活上無微不至照顧时，陈模竭力給以方便。

鳴放前期，当社会上右派分子大叫"肃反一团糟"时，陈模竟积極支持叛徒陈緒宗为反革命分子金怀瑾翻案，甚至憑靠前五人小組負責人身份，去法院摸金案將如何宣判的"底"，然后又把法院对此研究情况以及报社肃反中审查金的一切情况洩露給陈緒宗，积極支持陈緒宗上法庭，向党进攻。

（二）鳴放期間放出"青运倒退論"毒箭，惡毒攻击团中央，否定团的工作成績，抗拒团中央对报社的領导。

陈模在团中央机关整風座談会議上，一口否定了几年来青年运动的巨大成就。他說："几年来团的工作进展不大，不少方面处于停滯狀态，甚至有些工作还比过去落后了。"他毫無根据地誣蔑团中央在最近一年多来，既"沒有搞增产节約运动""更沒有研究过如何調动青年的积極因素問題"特別是"沒有研究过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他認为团的工作"严重地脫离实际，脫离党的中心工作"，在群众中已"失去了威信"，說："如果学生鬧事，团中央說不要去，他們一定不会听話"。由此，他即謾駡团中央是"可恥的"。"团中央沒有完成党中央的委託，工作是失敗的"。他說"現在的团中央是否还称得起团中央呢？称不起了。""党說我們青年团是它的助手，我覺得忠实倒是忠实的，但实际上是靠不住的"。

他以反党的宗派主义观点誣蔑团中央有宗派主义。他硬說团中央工作所以"今不如昔"，是因为"团中央把許多优秀的幹部輕輕流过去了"，並別有用心地說："南翔同志走后，学生工作有一蹶不振之势"。他明知是党中央有計划地調动和配备团中央的幹部，却偏偏要說成是团中央書記处把某些同志排挤走了。

他抗拒团中央对中国青年报的領导。他把团中央对团报的領

导诬蔑为"簡直是干涉，甚至是粗暴的干涉"。他丑化耀邦同志"是最大的，最典型的官僚主义者"，"不及一个党的县委書記实事求是"。他所以抗拒团中央的領导，丑化耀邦同志，实际上是要篡改中国青年报的政治方向。

（三）攻击党中央，否定党对团的領导作用。

陈模在整風座談会上，还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他歪曲党中央对团中央坚强的領导是"抽象領导"。他說："党中央对团中央的領导的要求是不够严格的，抽象的領导多一些，而沒有具体檢查。""党中央似乎也把团中央忘記了。"他还挑撥青年团和党委的关系，說"基層党委根本看不起团委書記，党委开会要叫你来就来，要抓就得来"。

（四）"三大"期間，配合社会上右派，企圖火燒"三大"。

陈模是"三大"副秘書長和报社"三大"报道組長，他違背大会宣傳方針，反对宣傳成績介紹經驗，亲自指揮記者到代表中去找矛盾、找問題、搜集所謂陰暗面材料，进行点火活动。在制訂和执行报道計划中，还玩兩面手法，在送团中央审查計划时，把"揭露五方面問題"提綱塗掉，但在批准后又指示記者仍执行原計划。

他还亲自到"三大"代表中散布不滿情緒，說"大会批評少，不合整風的精神"；並支持团哈尔濱市委書記郭永澤（右派分子）給党中央写信攻击团中央。当右派分子王亞生写反党文章"当前全国团代大会和整風精神相距十万八千里"时，陈模給他看报社五个代表給团中央書記处的意見書，对王亞生的向党进攻起了支持和鼓励作用。当党中央小平同志指出这篇文章的反党性質之后，陈模仍为右派分子辯护說这篇文章"精神是好的"。

（五）阻碍反右斗爭，保护右派分子。

报社在反右派斗爭开始，揭發出右派分子刘宾雁时，陈模却叫嚣斗爭刘宾雁的方針有問題，是"一棍子打死"的办法。他反

对把刘宾雁的罪行見报，强調刘还有所謂才能，这些謬論曾引起一部分思想右傾的同志的共鳴，在斗爭初期，起了極坏的阻撓作用。在討論編輯部“关于几个宣傳錯誤的檢查”的会議上，他也主張右派分子王亞生、詹寰的問題不要見报。

（六）誣蔑农業合作化搞“糟”了。陈模去年二月回乡，与当地部分农業社社員开座談会，要社員幹部提意見，引起一些落后群众及坏分子攻击合作社和社幹部。致使幹部的威信遭到了破坏。陈模在会后曾到中共口岸鎮委說当地合作社工作有問題，並在以后写了“見聞和建議”（情况材料），硬說合作化搞糟了。

三、平时表現

陈模虽然过去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但思想並未得到徹底改造。在最近二年来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發展到極端严重，狂妄自大。一心想成名成家，醉心于“一本書主义”，羡慕右派分子刘宾雁的道路。他極端狂妄地相信自己能力超过了党的組織，猜疑团中央不重用他，因而对党、对团中央怀有不滿，想靠自己的“資本”来和党較量一下。最后終于墮落为右派分子。

四、在运动中的态度

报社从七月二十七日起开了四次編委扩大会批判陈模的反党言行，他的檢討很膚淺。在团中央常委扩大会开始批判他时，他認为是“牆倒众人推”，直到团中央常委扩大会开过五次，严正批判了他的反党言行后，他虽然承認了自己是反党分子，但对同志們对他的批判一直抱有極大不滿，說：“他們明有二分硬說成八分。”表面上承認錯誤，但心里不服。經領导上几次談話后有所轉变，对其錯誤有所認識。

五、結論与处理意見

根据以上事实，陈模是有严重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反党

分子。根据他的严重罪行和态度，我們对他的处理意見是：一、开除党籍；二、撤銷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

中共中国青少年报社第二支部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刘宾雁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日

刘宾雁，男，三十二岁，山东临沂人，家庭出身职員，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四四年九月入党。

刘宾雁是有政治野心的資产阶級右派在党內的代言人，是極右分子。他猖狂地攻击党中央和党的各級領导，誣蔑丑化党的幹部，誣蔑党內政治生活。他否定党領导的文化艺术事業成就，挑撥党和作家的关系；誣蔑党的肃反政策，和民主集中制，說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他反对党对报紙的領导，竭力想把中国青年报引向資产阶級政治方向，成为反党的报紙，他已經篡改了工商部的报道方向，腐蝕了許多編輯和記者。他否定党領导青年工作的成績，反对党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在鳴放期間，他兴風作浪，进行了一系列猖狂的反党活动，他利用二支部書記职权，操縱二支部党員大会，把大会开成控訴会，誣蔑党的肃反工作。

根据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决定，和中国青年报社整風領导小組对他的政治結論，决定开除極右分子刘宾雁的党籍。

附：关于右派分子刘宾雁的政治結論

（一）簡历

刘宾雁，男，三十二岁，山东临沂县人，出身职員家庭，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四三年九月参加工作，一九四四年九月入党。一九四六年后先后在哈尔濱市民青、团市委、青幹校、东北团委宣傳部工作；一九五一年調来中国青年报，现任中国青年报編委兼工商部主任。十三級。

历史上（一九四六年七月）曾失掉关系，一九四六年重新入党，后經东北局直屬机关党委批准，恢复一九四六年十月以前党龄，肃反、审幹时未作复查。

（二）主要右派言行

一、猖狂地攻击党中央和党的各級領导，誣蔑、丑化党的幹部，誣蔑党內政治生活。

今年五月他在对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人員的一次講話中，对党进行了極其狂妄兇惡的进攻。並說"阻碍整風的最大阻力是党內的高級幹部"。他还猖狂地攻击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对"三大"作出的評价。他說："团代会毛主席說开得好，群众（？）說开得不好，我說开得不好！"实际上是誣蔑毛主席沒有代表群众說話。

他竭力丑化党，把党描繪成自私自利的統治集团。他在"給毛主席的信"中叫嚷："党內高級幹部中一个特权阶層已經形成。"在他的日記上也說："党內一批貴族出現了"他还惡毒地誣蔑党的省市書記对中央指示"总是行动迟緩，甚至陽奉陰違"。还說党委第一書記往往是代表保守力量"。說他們存在着

不同程度的"土皇帝思想"。他要毛主席不要听信他們。他要中央採取措施："首先是——不給这种人以'生命保險'，'幹得好叫他幹，不好——請他走'"。实际上是要把我們忠誠于党的事業的老幹部赶下台去。

他極端仇視党的各級領导幹部，並用尽刻毒的字眼，謾罵、侮辱他們是："市儈"、"革命自身保衛者"，"犬儒主义"、"爬行主义"，"一些人愚蠢，守旧，不学無术，阻碍生活前进！一些人政治热情衰退，疲疲蹋蹋，無所用心或貪圖享乐！另一些人自私，怯弱，不敢講話，怕丢烏紗帽，不敢坚持党的利益！"是"恐惧病患者"、"变色龙"。

他誣蔑党"發展了大批'不說話'的党員"說"入党者是少說話，少想事的"。他把党培养出来的幹部，罵成"是唯唯諾諾的傻瓜"。他把下面的党員視为一群懵然無知的笨蛋。

所有这些刻毒的謾罵和誣蔑都出于反动的"党的衰退論"这一观点。他認为"党組織在衰退，党內民主發揮得不好，組織渙散，活力不足。"他的"党的衰退論"反动謬論，也突出地反映在"本报內部消息"特写中，从这篇特写中实际上得出兩个反动的公式：誰作了領导幹部，誰就要"落后"，誰入了党誰就"衰退"。

二、否定党領导的文化艺术事業的成就，惡毒地挑撥党和作家的关系。

他在"上海在沉思中"誣蔑我們的文化艺术事業不如反动統治时期，大叫今不如昔。他說："反动統治时期上海是全国出人出書出戏最多的所在，解放后反而有点蕭条。"他罵党的文艺工作領导同志缺乏文化素养，領导不了文艺工作。他誣蔑党对文艺工作的領导是："有权有势的教条主义左右風云不可一世"，扼杀了創作自由空气。他挑撥作家与党的关系，說："今天所以不可能有一个二十多年前胆敢与周揚抗衡的魯迅，乃是由于一个作家与党委宣傳部長的关系不同。"公开煽动作家反党。

他的文艺观点也是反动的。他要求文学創作要"絕对自由，否則就写不出好东西来。"他反对文艺工农兵方向，認为"工农兵方向限制了文艺的發展。"他反对作家要改造思想，說"延安的整風限制了作家的思想"，認为"馬列主义多了就限制了作家的想象力"。他竭力宣揚"文学要暴露黑暗""作家要写陰暗面"，借介紹特写經驗为名，販卖他的反党文艺观点。

三、誣蔑党的肃反政策，誣蔑我国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

他在电台的座談会上公然發表謬論說："新三反以后，人的尊严受侮辱，肃反中錯誤更大。不大会尊重人。把人的尊严看成微不足道的。"並說"这是全国問題、历史性的問題，也是小小的悲剧"。

他誣蔑我国的民主生活，說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原因是"中国沒有經过資本主义，所以民主权利受到限制，有了也不会用，不知道和不敢去行使。"他热中于資产阶級議会的"民主"，認为資产阶級民主更可爱，选举热鬧，尽管选的都是反人民的。"他認为："一件事全体一致通过就是不民主，有人反对就民主。"

四、反对党对报紙的領导，竭力想把中国青年报引向資产阶級政治方向，变成反党的报紙。

他把党对报紙的領导看成是保守力量的压制，視为"干涉"，反对党中央和团中央对中国青年报的領导。說"团中央不懂报紙"，"党中央喜欢用自己的一套来要求团和团的报紙。"把党中央領导同志和省、市委書記对中国青年报善意、公正的批評，惡毒地叫作"圍攻"，說"他們压制批評的方法很巧妙，叫你奈何不得。"还說"报社的遭遇最可怕的不是别的，是党內保守力量，特别是党內权威人士的保守力量。"

鳴放期間他竭力讚尝文匯报的資产阶級政治方向，說文匯报"对于活躍全国民主生活起了有利的作用。"他竭力頑抗团中央对报紙鳴放报道按兵不动的方針，要我們报紙象文匯报一样向党

进攻。在几次会議上，他嚣張地說："不报道'鳴'、'放'就脫离生活，甚至要挾說"如果鳴放問題不解决，我們只好辞职。"耀邦同志为了貫徹这一按兵不动的方針亲自来报社召开二次座談会，而刘宾雁却在發言中和耀邦同志針鋒相对，攻击团中央和耀邦同志，叫嚷"按兵不动不是办法。"事后还写了"疑問与顧虑"（未發表）文章，繼續大肆攻击譏諷，說我們报紙不"鳴放""成为一个巨大时代潮流的孤島"，还譏諷說："不懂兵法。但'按兵不动'至少不能說是积極进攻，'不动'自然也不是兵家的基本态态。何况，司馬懿的不动，比青年报要多一些理由。"

他在办报問題上，有系統的反党的資产阶級新聞观点。他主張的报紙实际上是不要党領导的报紙，認为报紙受党領导，报紙就办不好。要求扩大报紙权限，要党报代替党，党要听党报的命令，他要报紙、記者駕凌于党組織之上。他主張报紙要党允許記者無限制地"提出問題"，"干預生活"。他排斥报紙对中心工作和生产活动的宣傳，尽量支持"群众"的意見。他反对在报上宣傳馬列主义，少搞思想一日談，甚至公开提出取消学習修养組。他主張报紙要說"实話"，不要保留太多的机密，实际上是讓群众处于無組織的狀态，瓦解群众斗志。所有这些观点，不仅到处宣傳，而且在他的特写"本报內部消息"和"記者这一行"中，集中地、系統地加以鼓吹。

他蓄意要把中国青年报办成反党的报紙，他已經篡改了工商部的报道方向。他腐蝕了許多編輯和記者，他鼓动記者"报道陰暗面"、"搞問題"，專找党的缺点。要"敢于向太岁头上动土"（指党省市委），"抓大的"要"追根"。記者李运鴻（右派分子）問他反保守怎样报道，他提供了"保守主义者，不求有功但求無过者；本位主义者；驕傲自滿等方面的报道思想。

五、否定党領导青年工作的成績，反对党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

他誣蔑青年团的工作"有原則性和路綫的錯誤"，要青年团去"干預"一切。他說："青年团不能不对党所領导的国家工作各个方面，加以过問和插手。"实际上他要把青年团变成一个駕凌党之上的，干涉党、干涉国家的組織。

他别有用心地說："三反之后青年有苦悶，但不敢說話"。說几年来青年被压制，甚至"青年的政治积極性下降了。"認为党对青年有偏見，青年的思想受束縛。他說"党只要青年好好劳动，不要青年关心国家大事。"他把党对青年进行馬列主义思想教育，詆毀成在青年中造成教条主义的束縛，和宗派主义的影响。

他把自己伪裝成"革新家"的面貌，利用特写、座談会、在报上写文章等形式，广泛地向青年宣揚青年要"独立思考""干預生活"等。說"星星看来比月亮小得多，但可爱的是它發射着自己的光"。叫囂："宁肯要十个也許不完全正确，但有一定根据的新意見，也不要一百个沒有錯誤，但是鸚鵡式的学舌。"

六、鳴放期間兴風作浪，进行一系列猖狂的反党活动。

五月間他在上海，看到資产阶級右派瘋狂向党进攻，兴喜若狂，認为向党进攻的时机已到。他首先写了"上海在沉思中"毒草，誣蔑党的整風运动，和"鳴放"政策。說"上海的放，仅仅是开始"，但人們"仍未暢所欲言，怕'釣魚'、怕秋后算賬"。說"这种顧虑与过去党的領导某些反复無常表現分不开的。""去年的一放与秋后的一收，以及今年3月中的一放一收，人們記忆犹新。"他还进一步煽惑說"党內幹部有的比党外人士顧虑还多"，"党的負責幹部参加会，不說話，沒表情，也不知打的是甚么主意！"接着，又写了"路上憂思"、"記者这一行"（未發表）等反动文章。他生怕停止鳴放，連夜写信給毛主席（未寄出），狂妄地企圖以他的思想影响毛主席。他还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进行点火活动。

六月間回报社后立即在报社內部"点火"，利用二支部書記

职权，操縱二支部党員大会，号召"大鳴大放"，說"你們有什么苦悶？放出来！你們有什么顧慮？鳴出来！"他还指名点姓要党員"鳴""放"，还說，"鳴放以来，有許多党員一声不响。里面有兩种人：一种是他本身，就是'三害分子'，怕人家揭露他；另一种人是沒有思想的人！"，对党員施压力。把大会开成控訴会，誣蔑党的肃反工作。事后还將發言記录用大字报形式公布，企圖通过这次大会，煽动报社党員和群众向党进攻。

（三）运动中的态度

报社对刘宾雁进行了严肃、尖銳的斗爭，从七月八日起开了六次大会、六次中型会、四次小組会，揭發和批判他的罪行。第一、二次大会，他抗拒斗爭，說："我感到突然，大家也感到突然"，而且当場攻击了积極分子，态度頑劣。自第三次大会以后，在充分的事实和說理批判下，开始低头認罪。以后比較徹底交待了，表示願在劳动中改造。这期間，也积極揭發了别的右派分子的材料。

（四）結論与处理意見

刘宾雁是有政治野心的資产阶級右派在党內的代言人，是極右分子。处理意見是：开除党籍；撤銷原有职务，实行留用察看。

中共中国青、少年报社第二支部关于开除吳一鏗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日

吳一鏗原系本报編委兼文艺部主任十二級，入党十九年来，一貫坚持其資产阶級思想立場，在党內爭名夺利，並因此而对党不滿，在历史上有数次反党表現，發展到一九五七年鳴放期間，則更变本加厉向党进攻。他猖狂地攻击了中宣部和团中央对报紙的領导，反对团中央为我报規定的“按兵不动”的方針，指揮記者“放火”，並亲自在报紙上大量編發“点火”文章。吳一鏗在鳴放期間的言行，表現了他是一个政治上的右派分子。根据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决定，和中国青年报社整風領导小組对他所作的政治結論，决定开除吳一鏗的党籍。

附：右派分子吳一鏗的政治結論

（一）簡 历

吳一鏗，女，三十九岁，四川閬中人，家庭出身大地主兼資本家，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四月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七月入党。曾任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团長、延安解放日报資料員、張家口鉄路医院护士長、合江农民报主編、合江軍区医院副院長、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創作組組員等职，現任本报編委兼文艺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員。十二級。

（二）主要反党言行

一、反对和誣蔑党对报紙的領导。

“鳴放”初期，吳一鏗在“新聞与出版”十五期上写了題为“我們需要支持”的文章，集中地攻击了团中央，同时也猖狂地攻击了党中央。以后，在其他几次座談会上，对团中央繼續大肆攻击。

（1）攻击和反对团中央对报紙的坚强領导。她誣蔑說：“我們的报紙办給誰看呢？好象是办給耀邦同志和書記处看的，而不是給群众看的。报紙办的好坏，不是以群众的喜欢来衡量，而是看書記处的臉色，团中央来的电話便是聖旨。”她又說：“团中央不了解报社特性，不了解报紙工作。”她毫無根据地說，团中央对报社文艺部不关心，沒有領导。因此要求团中央成立文艺处，由她来作文艺处長，兼报社文艺部主任。

（2）把党中央、团中央領导同志对我們报紙宣傳上的錯誤和缺点提出的批評，惡毒地称之为“棍棍棒棒”，“有时甚至打得我們暈了头”。妄圖以反对“棍棍棒棒”为名来取消党对报紙的領导。

她也攻击了党中央宣傳部，硬說党中央宣傳部不关心本报文艺部。

在惡毒地攻击了团中央和党中央对我們报紙的領导以后，她还别有用心地說：“按照党今天对党內、党外知識分子处理的精神回忆起来，眞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她大声疾呼：“我們需要支持”，实質上是要資产阶級右派支持她，反对团中央。

（3）反对团中央关于鳴放报道“按兵不动”的方針，極力想把报紙办成資产阶級政治方向的“文匯报”。她說：“团中央压着不讓报紙‘鳴’‘放’”。“团中央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开三大会”。她叫囂：“不能以不变应万变。”“我看文匯报有主見。”他甚至公然在报社內貼条子，叫囂要报紙“大鳴大

放”，煽动反对团中央和耀邦同志。

（4）誣蔑团中央有宗派主义。她說：“被团中央認为是好的幹部，而在群众中威信不高。”說团中央团結不了象李庚（右派分子）那样有“才能”的人。她誣蔑团中央提拔幹部是用人唯亲，說：“我要去給耀邦同志当一年秘書，出来也是个委員。”

二、鳴放期間，猖狂地进行“点火”活动，亲自策划“左叶事件”的报道，积極指揮記者“放火”，向党进攻。

（1）吳一鏗一手策划了所謂“左叶事件”的报道。当她从“文匯报”右派分子梅朵处得悉“文匯报”要在报上搞这一事件，她竟与他們竞賽搶先向党进攻，亲自布置和督促記者写稿，去农業部核对事实，她根本不听农業部領导同志的意見，于是“部長助理和攝影师”在她亲手策划下見了报。事后还写“侧記”，“大丈夫能屈能伸”，企圖把“左叶事件”再扩大，攻击农業部党組和刘瑞龙同志。

（2）“鳴放”期間，她主持編發了十数篇“放火”的稿件。除右派分子刘宾雁的“上海在沉思中”外，“救救雕塑事業”是美术界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火把”，也是在她的授意和支持下搞的。“春風不渡武汉关”，是谷声蒙把武汉文艺界“鳴放”动态作为內部情况写給編輯部的，吳亲自把这封信編改后發稿，而且有意把信中已經提到“武汉市委領导正研究如何發动‘鳴放’等語刪掉。

她亲自主持、組織了“鳴放”座談会，右派分子杜高、田庄、王正參加了“青年剧作者座談会”，右派分子彭子岡參加了“报刊文艺編輯工作者座談会”。这些右派分子都是吳特地邀請的。特別是“报刊文艺編輯工作者座談会”，成了“訴苦”会，右派分子彭子岡在会上大肆攻击了团中央。

（3）积極指揮記者“放火”。她要記者写“对运动起促进作用的”消息。她对記者說：“不能再沉默了，过了的老皇历不

能再翻了。”她要記者学写刘宾雁的“上海在沉思中”放火文章。她給上海記者的信中說：“‘上影’，还未全‘解冻’……‘春寒’未去，党內、党外，这派之間意見也未消除。”要記者“也可以反映一些‘封冻’的消息。”从这里可以看出她和社会右派是一脈助承的，思想、語言、观点是一致的。

三、否定党对文艺的領导，否定解放后的文艺的成就

她說：“許多門外汉在那領导艺术，笑話百出，也有許多門內汉，因变成‘官’也成了門外汉了”。因此她說：“解放前可以出京剧界四大名旦，話剧四大名旦，而解放六年来，沒有培养出在群众中有影响的人来。”

（三）历史上的其他錯誤

吳一鏗历史上也有过几次反領导反党錯誤。“三反”中，因进行反領导，無組織無紀律，受党內当众警告处分。但她無視党的批評教育，拒絕改造，与党离心离德。

（四）运动中态度

反右斗爭开始时，吳一鏗伪装左派，宣傳自己“对党是有感情的”，但又在群众中散布說：“我是有問題的，都已向領导小組交代了”。后經几次編委扩大会批判，态度稍有好轉，但只談思想作風問題，不談政治問題。直到最后在全报社的批判大会上，在群众中揭發的大量事实和說理批判之下，她理屈詞穷，才低头認罪。

（五）結論及处理意見

吳一鏗是个一貫堅持其地主資产阶級思想立場，在党內爭名爭地位，鳴放期間則变本加厉，向党进行了瘋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处理意見：开除党籍。降职、降級、降薪。

中共中国青、少年报社
第二支部关于开除刘紹棠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日

刘紹棠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青年文学作者，但因他一貫坚持卑鄙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强烈的名利慾望，拒絕思想改造，發展到鳴放期間終于恩將仇报，反戈一击，向党进攻。他大肆宣揚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猛烈攻击党对文艺的領导，反对党的文艺路綫，否定我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事業的成就，並进行了宗派性的反党活动。徹底墮落成了右派分子，成了青年作者中最典型的反党急先鋒。根据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决定，和中国青年报整風領导小組对他的政治結論决定开除刘紹棠的党籍。

附：关于右派分子刘紹棠的政治結論

一、簡历

刘紹棠，男，22岁，河北通县人，出身于破落地主兼商人家庭，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五三年五月在通县中学入党。一九五五年五月，从北京大学棄学。来中国青年报文艺部帮助工作；一九五六年四月从事專業創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員。

二、主要右派言行

（一）猛烈攻击党的文艺路綫

（1）否定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

他狂妄地把这一代表党的文艺路綫的文件割裂为"綱領性理論"和"策略性理論"兩个部份。把文艺为政治服务和以普及为主的文艺工农兵方向，都歪曲为"策略性理論"。並說："策略性理論已經过时了"。他歪曲說：策略性理論的指导作用即是："根据某一宣傳意圖写出作品"，"只要它比空口講白話形象一些就可以"。他反对作家热情地迅速地为政治服务並歪曲說：要求文艺及时地为政治服务，是違反唯物論的原則的"。而且"会陷入公式化概念化的泥坑。"他說文学作品"只有艺术价值才是眞正的价値"，"追求作品的强烈的政治目的，是会損伤作品的艺术含蓄与魅力的"。这些謬論的实質是要全盤否定毛主席"講話"中的根本原則，否定党的文艺路綫。

他反对文艺的普及。說"普及和通俗化的問題，作家沒什么責任"，而是"国民教育的普及"的問題。他百般譏諷赵树理等坚持文艺工农兵方向的老作家。他誣蔑周揚同志把赵树理等称为艺术大师，是因为赵树理是党員，要占个"席位"而"赵树理是不考虑艺术和不顧艺术价值的"他借攻击赵树理等同志，攻击党的文艺政策。他大叫："今天应該以提高为主了！"他还狂妄地呼吁作家們丢开作品的思想性去追求所謂"艺术价値"。他借口"提高"，徹底地反对了以普及为主的工农兵方向，宣揚了徹头徹尾的資产阶級反动的艺术至上的思想。

他还否定在毛主席的"講話"指导下的十五年来文学事業的巨大成就，他認为一九四二年后以工农兵为主題的文学成就不如一九四二年以前十五年。他說："十五年来的主要成就，就是那些文艺宣傳作品——政策条文的形象化圖解。"这些作品的"寿命的暫短，並不比一則新聞通訊来得長。""尤其表現在某些电影文学劇本上，甚至可以說是不算小的悲劇！"

刘紹棠还更恶毒的攻击否定了偉大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学事業近二十年的成就。

（2）誣蔑党对文艺的領导是教条主义的"統治"。

他說："全国解放以后，我們的理論指导思想是守旧的"；是因为所謂毛主席的"講話"中的"策略性理論"部分一直被做为"正統思想傳襲下来"；而且还是"机械地、守旧地、片面地、夸大地执行和闡發了毛主席指导当时文艺运动的策略性理論"。所以，"形成了教条主义的束縛"，于是"教条主义把艺术的生命拖到了死亡的边沿""最可怕的是教条主义的批評和行政力量相結合"他更煞有介事地說："我自己的思想中也不是沒有教条主义的毒，这正是一般青年作者自身的悲剧。不过这不可怕。只要勇敢起来，闖起来，这些孽障会消除的，但是，不勇敢也不敢闖，怕要釀成終身悲剧了。"他正是这样打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来猖狂向党进攻的。

（3）要求取消党对作家的領导，反对对作家进行思想改造。

他要做"自由鳥兒"，"要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写就怎样写"。他把党对作家的正当的領导和批評，都說成是"干涉"、"限制"、"清規戒律定得太多，十分可怕"，还把对他的批評誣蔑为"最后一招法宝……这批鍬头是常常使人頗伤腦筋的"。

他認为"近年来，我們的作品粉飾太平的多，描写眞实的少。有的作品在生活的描写中掺了假"他提倡的"写眞实"，即是所謂"揭露陰暗面"。他要党"檢查一下几年来我們作品中存在的說謊現象"。他說，只有"眞实地恰当地揭示生活中的落后面，这才是現实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才是現实主义忠实生活眞实的精神"。他要求党給他宣傳农村中社員打破了社主任的头、抗日英雄搞破鞋的写作"权利"和"自由"。鳴放期間，他在"新港"上發表的反党小說"田野落霞"，就是他捏造"陰暗面"，誣蔑党的老幹部的反动作品。此外，他还从理論上攻击了社会主义現实主义的創作方法。

（二）組織上搞反党宗派小圈子

以刘紹棠为核心，有青年作者中的右派分子从維熙、邓友海、

鲍昌（邓、鲍之間尚無联系）等参加，已經形成一个反党的宗派小圈子。刘紹棠和从維熙等早在鳴放初期，就开始了共謀反党的活动，如刘紹棠在北京市委宣傳会議等处散布的反党言論，他們事先即有过商談。他們还共同打击赵树理、老舍等老作家。他們还想与“新港”、“东海”等刊物的右派分子糾合起来，企圖利用这些刊物做为向党进攻的陣地。他們还曾計划倡办一个不要党来“干涉”、“过問”的反党同人刊物。刘紹棠是有政治野心的，他曾提倡一种所謂約請撰稿人的“組閣式”刊物，企圖用来篡夺“北京文艺”的領导权。

（三）反党的政治观点

他認为官僚主义是党“执政以后才产生的”。他認为党的高級領导幹部中有“貴族”。对中央和党的領袖，他誣蔑为：誰当权有势力誰就正确”。他認为“过去工农幹部改造知識分子，今后是知識分子改造工农幹部。他攻击粮食政策，說：“給农民留的粮食少，老百姓很苦，缺吃少穿”他誣蔑党內斗爭是“墻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他誣蔑今天的社会“只有同志沒有朋友，說話都得注意。”他硬說集体主义教育，是对大学生的束縛。他的反党小說“西苑草”，宣揚了这种思想。

三、运动的态度

第一次批判並定他为右派分子后，並未真誠向党低头。后經数次小会批判，才比較全面系統地交待了自己的反党言行，但在交待中还宣揚自己的名望。团中央、中国作家协会等联合举行的三次批判大会后，他表示服气了，但对自己反党錯誤的認識仍不够深刻。

四、結論和处理意見

刘紹棠是帶着“光宗耀祖，出人头地”的“家訓”和卑鄙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强烈的名利享受慾望，从事創作和入党的。

他平时極端狂妄，不知天高地厚，自命为“神童”、“才子”，他不但無視党和人民对他的培养教育和帮助，而且坚决抗拒思想改造。最后恩將仇报，向党猖狂进攻，成为青年作者中最典型的反党急先鋒。处理意見：开除党籍。自謀生活。

中共国际部支部关于开除党内右派分子李愼之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八日

李愼之，男，三十五岁，江苏無錫人。家庭出身：高級职員。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四六年三月参加革命，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原任国际部付主任。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李愼之对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發生了动搖，認为斯大林和希特勒差不多，苏联已不是那样吸引人了，發表了大量的修正主义言論，並按照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搜罗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資料，編入“內部參考”，企圖影响中央負責同志，“开导中央”。整風开始后，在墻报上發表反党文章“只有大胆地放，才能解决問題”，反对党的整風政策，提出“拚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煽动大家發表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論。还同十多个幹部談話，进行点火活动。

李愼之的右派言論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反对党的領导。認为党在执政以后已成为“旣得利益集团”，是一个“大宗派”，要求实行兩党制，对党加以“制約”，要党“还政于民”，“以不領导代替領导”。

（二）反对無产阶級专政，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实行資

产阶級民主。認为無产阶級專政是"盆子"，政治运动特别是肃反运动的付作用太大。过去实行"仁慈的專政"还可以，以后不改可不行了。又認为"資产阶級民主是人类历史發展到很高阶段的管理自己的产物"說民主的中心問題是議会問題，主張实行"兩条綫通天"，讓專家管政治。

（三）反对党的新聞政策和思想改造。在"新聞業务"上發表一篇文章"試揭新聞工作中的矛盾"，認为党的新聞政策会使人民"蔽聪塞明"，是培养"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是愚民政策。又認为解放八年来思想压抑是历史上从来沒有过的，很多問題"不能独立思考"。

（四）反对党的幹部政策。認为党的幹部政策是"二十年媳妇熬成婆"，不能發揮幹部的积極性，太强調德，对才不够重視，要求給幹部以选擇职業的自由。

李愼之在入党时，就具有較严重的資产阶級思想，入党后又拒絕思想改造，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国际上出現了反苏反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逆流，李愼之的資产阶級思想更有所發展，以至在整風初期右派猖狂向党进攻时，墮落成为右派分子。

为了純潔党的队伍，根据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决定，出席支部大会的二十七名正式党員一致通过將李愼之开除出党。李愼之本人也举手贊成。

中共人民日报第六支部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蔣元椿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蔣元椿，男，三十七岁，浙江紹兴人，家庭出身資方代理人，个人成分自由职業者，一九四〇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人民日报东方部主任。

蔣元椿在整風开始大鳴大放期間，配合資产阶級右派向党进攻，連續在国际部墻报上發表反党文章，他攻击党中央，攻击党中央对人民日报的領导，有綱領地反对民主集中制，企圖改組人民日报編委会。鳴放中，蔣元椿企圖在报社煽起一股反对中央、反对报社編委会領导的歪風。反右派斗爭后，蔣元椿污蔑批判右派分子的人为"打手"，並拒絕参加新聞界反右派斗爭的座談会。

在国际部門多次小組会和編輯部全体人員大会上，对蔣元椿的反党言行做了揭露和批判以后，其右派面目已充分暴露。报社編輯部整風領导小組已把蔣元椿划定为右派分子。

在追查中，又进一步揭露了蔣元椿長期隐瞞历史、制造騙局、蒙混入党及恢复前一段党籍等事实。第六支部大会于三月二十六日在研究了蔣元椿的問題之后，到会正式党員二十四人一致决議开除党內右派分子蔣元椿出党。蔣元椿本人也举手同意。

附：关于右派分子蔣元椿的政治結論

一、簡历

蔣元椿，男，三十七岁，浙江紹兴人，家庭出身資方代理人，个人成份自由职業者。原任人民日报东方部主任。

一九四五年到解放区以前曾先后在国民党政府和报紙做职員，后又在福建省农学院讀書，在国民党統治区鉄路局任职員、中学教員等。一九四五年八月到解放区，后曾做过营文化教員、新华社記者、編輯。一九五五年二月調人民日报任国际部評論員。

二、主要反动言行

1、鳴放时期，他在国际部墻报上連續發表“論聖旨口”、“从官多兵少談起”等文章，攻击民主集中制，攻击党中央和編委会对人民日报的領导。

他誣蔑党的領导是“聖旨口”，“不由你分辯，也不容人提意見”，“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造成“聖旨口”的原因是党內存在“个人崇拜，盲目崇拜权威。”他把服从党中央的領导說成是“洗耳恭听”，“不动腦筋”，“死搬活套”。

他誣蔑“聖旨口”在报社內形成“一道三門峽水壩”，“挫伤了下面同志的积極性，鼓励了那种不动腦筋，不独立思考，沒有进取精神的懶惰思想”，“在报社內部造成了暮气沉沉”。报社是“沒有前途、沒有希望”的地方。

他要求“聖旨口”“适当地封口”，除了政策方針以外，党中央不要对人民日报进行具体領导。同时，他要求改組和扩大編委会，建立記者編輯会議制度和各部的代表会議，对領导意見可以“頂”。

他煽动同領导作“斗爭”“要有‘拼得一身剮’的精神，給他頂回去”，以爭取“新鮮事物出头”。

2、他販卖資产阶級新聞观点，攻击編輯部各級領导是当“新聞官”。他以“提倡写新聞”为名，反对“写所謂指导性文章”。他举編輯部糾正他在中东採訪时所犯的片面性錯誤为例，誣蔑編輯部的正确指示是要他“去戳人家的別脚”，坚持他的“这个片面無法避免”。領导上曾派他去参加新聞界反右派斗爭，他拒絕参加，並說他不願去当“打手”。当領导上給予不指名的批評后，他还写信惡罵領导故意“打击”他。

3、他利用資产阶級右派的誣蔑和攻击，在非党群众中散布誣蔑党組織的反动言論，說什么“从这次鳴放中暴露出来的事实看，党內問題确实很多”。他还举他的弟弟对肃反的不滿的例子說：“我的一个弟弟根本不想入党了”。

三、历史上的政治問題和其他錯誤以及平时表現

1、他長期隐瞞历史，騙取信任。他曾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到过新四軍根据地茂林，因政治动搖，只住了一周就做了逃兵。一九四〇年二月入党，第二年即因惧怕白色恐怖而自动脫党。一九四七年三月在解放区重新入党时他伪造了历史，騙取了党的信任，一九五一年又編造新的騙局恢复了一九四〇年二月到一九四七年三月間的党籍。在解放区一度担任战地採訪工作，因害怕危險，要求調回后方，抗美援朝时期，他在新华社軍事报道組工作，也担心会調到朝鮮前綫採訪不安全，借故要求調国际部工作。但一九五二年九月他亲笔写組織鑒定时，竟把自己說成“經过長期的革命鍛煉，在失掉关系时期和解放战爭中能坚持斗爭，經得起考驗，表現了对党的事業的忠誠。”

2、他对民主集中制一直採取对立态度。一九五六年北京市选举区人民代表时，他不遵守党的指示，在群众面前攻击选举办法“不民主”，阻撓选民小組通过候选人名單，影响很坏。他連

党內提出候选人的选举办法也認为"不民主"，曾对党的"八大"代表和一九五六年中直党代表的选举办法表示不滿。

3、他一貫目無組織、目無紀律，狂妄自大，追求个人名誉地位。他把党視为互相排斥的小集团，同組織和領导鬧对立，同同志鬧不团結。支部有一次向总支彙报了他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表現，他竟誣蔑支部"誹謗"和"打击"他。領导上不能碰他一点，認为同領导来往是"高攀"，輕視打击同級，拉攏下級，对报社食堂、汽車队、宿舍管理有意見採取嘲諷謾駡的态度。

4、他"恃才而驕"，把党的培养看作是"个人奋斗"的結果，認为自己"羽毛已丰"，要求少受党的"束縛"，要求党承認他是"一个特殊的党員"。把他捧到"与众不同"的地位。

四、斗爭中的态度

在反右派斗爭中，他的态度一直很不老实，到处察言观色，向領导摸底，抗拒运动。最初他只檢查資产阶級个人主义，不承認反党；在同志們的步步追查下，矛盾百出，理屈辞穷，他才挤牙膏式地交代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思想和修正主义观点。最后他自动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說与其組織戴不如自己戴，但又企圖反攻，減輕罪責。他过去捏造历史，騙取和恢复党籍的行为，一直到他自动承認是右派分子以后，仍想繼續隐瞞下去。

五、結論和处理意見

經过五个多月的揭露和批判，証明蔣元椿是一个混入党內十余年之久，一貫堅持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立場的党內右派分子。他对党心怀貳志，不但反对民主集中制，和对無产阶級專政有严重抵触情緒，並在鳴放时期同情和配合資产阶級右派，向党發动进攻，反右斗爭中态度又很不老实。凡此，說明蔣元椿已墮落成为党內右派分子。

处理意見：撤銷原有职务实行留用察看。

中共健康报社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立章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日

（一）簡历：

王立章，男，四十三岁，山西楡次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入伍，一九三九年入党，历任幹事股長、科長、秘書副主任、秘書处長，行政十一級，前任宣傳处处長，健康报社总編輯。

一九四六年因卖了自己帶的槍枝，犯“和平思想”的錯誤，在党內受当众警告处分，撤銷党內职务。一九四九年参加了三查运动，因在武安买地主的羊皮袍子等物，受党內劝告处分（已撤銷）。一九五七年整風运动开始，因誘奸少女，腐化墮落，暫停其党內外一切职务。

（二）其主要錯誤事实：

1、一九五六年党組決議要健康报停刊檢查，並要他檢査鬧独立性問題，他不堅決执行。說：“我不願意做唯唯諾諾的人，我也不喜欢唯唯諾諾的幹部”；又說“周总理發了脾气，衛生部才作出停刊的決定”，引起群众对党組不滿。鳴放期間，又縱容右派分子赵世琪把停刊問題当作学术問題来鳴放。把报紙当成“个人事業”，視为“独立王国”不服从党的領导。

2、資产阶級办报路綫。歌頌文匯报生动、新穎、敢說敢言、强調“要向文匯报学習，不要迷信人民日报”。鳴放期間，推荐右派分子潘光旦、費孝通、徐鑄成、王中等的反动文章，号

力提倡王中提出的报紙的"商品性"、"趣味性"。反对靠党办报，說："不要靠天吃飯"。又說："以后錯的东西，衛生部不同意的也可以登"。

3、篡改健康报政治方向，猖狂向党进攻。鳴放期間，强調"尽量揭露矛盾"、"各行各業都要見报，必要时可上头条"。指示記者採訪"要打破清規戒律，要把他們的內心話、語言、气氛都反映出来，不必送机关审查"。認为："突出的东西都要放主要地位，标题越尖銳越好"。积極組織右派分子写反动文章向党进攻，健康报上以大量篇幅發表了許多煽动点火的毒草。反右派斗爭开始，还認为："衛生部有沒有右派分子很值得怀疑，科学家与章、罗等政治人物不同，不能一視同仁"。

4、指示編輯部在七个大城市召开座談会点火。亲自主持北京开業医座談会，說："开業医沒有人組織鳴放，我們組織他們鳴放"会上对开業医說："你們大胆地放，我們一字不改的替你們登"。

5、污蔑社会主义陣营。說：匈牙利事件發生的原因，是因为匈牙利工人、农民文化水平高，有那种鬧事的習慣，中国工人太老实，鬧不起来"。"苏联对人民民主国家控制太严了，匈牙利事件是因为苏联有大国沙文主义"等等。

6、生活腐化墮落，極为严重。整風开始，由其男女关系問題，阻碍了衛生部大鳴大放的开展，政治影响極坏。

（三）錯誤分析批判及其根源：

大鳴大放期間，王立章已經完全墮落成为資产阶級在党內的代理人，与社会上的資产阶級右派共声同气，篡改了健康报的政治方向，借健康报的陣地，以大量篇幅發表了許多煽动点火的毒草，变为右派分子猖狂攻击党的工具。

王立章从来也沒有說过办报应該要站稳無产阶級立場，捍衛党的事業，相反的却在鳴放中，孤立地强調要"尽量揭露矛盾"、

"錯的东西，衛生部不同意也可以登"，甚至把站稳無产阶級立場也認为是"清規戒律"了。由于站在資产阶級立場上，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必然是背道而馳的，因此，在敌人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把敌人放出的毒草也認作香花，並以"聞者足戒"为借口，亲自为敌人开方便之門，把健康报引向資产阶級方向。实际上是举起双手向敌投降的一种具体表現。

特别是他积極宣揚資产阶級办报观点上，热衷于右派分子王中的报紙"商品性"、"趣味性"的謬論，並竭力推荐新聞界右派分子的"敢說敢言"、"同人性"及所謂"史家春秋笔法"的資产阶級新聞学說，这也不是偶然的。王立章在五六年即散佈靠党办报是"靠天吃飯"的反动論調。認为党領导的报紙是"公报"，健康报为群众說話太少了，把党报的党性原則与群众性相对立起来。並追求学習文匯报的"新穎"、"生动"、"敢說敢言"的資产阶級新聞路綫。力謀擺脫党的領导把报紙当成"个人事業"，王立章向党鬧独立性也正表現在这些地方。

王立章的資产阶級思想，也反映在生活腐化上，道德敗坏，完全丧失了革命意志。

党始終对他是爱护的，經常給他敲起警鐘，在他几次犯錯誤的时期，党組負責同志常对他进行耐心的教育和帮助，採取挽救的态度，等待他的覚悟。但王立章並沒有轉变过来，誠誠恳恳地接受党的教育，仍然对党不滿，工作不負責任，並認为听党的話是"唯唯諾諾"的幹部。大鳴大放中，終于原形畢露，墮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王立章所进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惡活动，对党的事業造成严重損失，削弱了党的战斗力，为了純潔党的組織，因此，必須清洗其出党。

王立章出身于沒落地主家庭，历史上曾犯过和平思想的錯誤；犯过侵犯貧农利益的錯誤。入党时，为了个人虛荣，帶着浓厚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目的而来的。入党后，又長期缺乏自我改

造的自觉性，一直保持着資产阶級思想，把成績視为个人資本，就驕傲自滿，自命不凡，看不起党的領导。他以反对"唯唯諾諾"的幌子下反对党，以反对發揮創造性积極性的掩盖下反对党，反抗党組，向党鬧独立性。由于达不到个人目的的时候，对党則更为不滿。大鳴大放期間，正当資产阶級牛鬼蛇神齐出动猖狂进攻党的时候，也就是王立章反党反社会主义登峰造極的时候。这是他所以墮落为資产阶級右派分子的主要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为了純潔組織，严肃党紀，决定开除其出党。

中共高等教育部党委
关于开除郭蘖生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郭蘖生，男，三十六岁，河南偃师人，中农家庭出身，学生成分。一九三七年入党。参加工作后曾先后担任过区委書記，县委組織部長县委書記，县府科長，地委幹事，土改工作队長，东北行政学院系主任，东北人民大学教务处長，副教务長，东北局組織部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並曾在中央組織部审幹办公室工作，于一九五六年六月調我部教学指导司任研究員，后到"高等教育"任副总編輯。

郭入党后曾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他的資产阶級立場並未改变，严重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並未克服，馬列主义世界观並未真正建立起来，因此一貫对組織抱着不老实的态度，凡涉及到个人問題时，便和党对立，發牢騷說怪話，甚至謾罵領导等。在爱人关系上，丧失立場，在男女关系上也曾多次犯过錯誤。在这

次大鳴大放时，复与社会上的右派相呼应，向党向社会主义發起了猖狂的进攻主要事实如下：

（一）去年五月間当資产阶級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郭瞞着高教部的領导，篡改了部的机关刊物"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主持並亲自参与編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八、九兩期（八期經領导發覚后收回，九期已付排未出版），企圖在全国高等教育界煽風点火，使高等教育重新走上資本主义的道路。

（二）郭也同社会上的右派一样，也打着反宗派主义的幌子，挑撥党群关系，攻击党的領导，否定高等教育工作中存在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兩条路綫的敌我矛盾。如說什么"目前三个坏主义、宗派主义应放在第一位""有些共产党員飞揚跋扈特殊成風""有些人一入党就变了样"等。

（三）郭还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招牌，反对学習苏联，反对馬列主义对高等教育工作的思想領导。他誣蔑"苏联的东西干干巴巴的，很多教条，沒有意思"，並宣揚右派分子許孟雄攻击"人民大学象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窩"的發言。

（四）郭还打着反官僚主义的幌子，把高等教育工作說成一团漆黑，抹杀高等教育的一切成績。同情右派分子王恆守誣蔑高等教育事業"乱、糟、偏"的濫調，並称贊說"这对于改进我国高等教育工作有極大的意义"。

此外，郭还指示編輯人員下学校时要"找宗派主义典型，""挖死角，找李景汉第二"，注意收集座談会上的"生动言論"准备作标題，注意座談会的"高峯"，这說明郭璞生不仅是自己反党，还組織人收集向党进攻的材料。此外郭还借口"鼓励鳴放"，挑撥編輯室人員对党不滿，鼓励大家向党进攻，同时不仅將报上所載右派分子的文章，自己划綫批語，大加贊揚外，並且还积極推荐給編輯室的人員看。

从以上事实說明，郭璞生在大鳴大放期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是十分严重的，已完全从極端的个人主义者墮落成为資产

阶級右派分子，与一个共产党員的光荣称号極不相符，經党委会討論，决定給予开除党籍的处分。

中共中国戏剧家协会支部
关于开除戴再民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

戴再民，男，四十一岁，浙江鎮海县人。家庭出身漁民。本人成分店員，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同年三月入党，历任抗敌演剧二队队員，“宜昌日报”編輯，中南文艺学院講师，中南人民艺术剧院导演，現任戏剧报評論組長。在反右中被确定为右派分子。

戴再民在整風运动中，犯有严重的政治性錯誤，鳴放初期利用記者身分，以“欽差大臣”姿态，到武汉煽風点火，攻击党的領导，在武汉时，参与筹化“海鷗剧社”，替他們出謀献策，制造輿論，向他們洩露党的机密，他还打算向中央、全国戏剧界宣傳，企圖迫使領导上接受他們的陰謀計划，这些都已說明了戴再民背叛了党的組織，站在敌人的立場向党进攻。

戴再民一九四六年以后，長期的脫离了党的組織生活，而不主动的向党的組織取得联系，一九五四年虽然恢复了党的关系，但思想上仍沒有入党，長期与党存在着兩条心。戴对这些錯誤，不但不接受教育，痛改前非，反而在这次整風运动中，变本加厉，乘整風之机，同武汉戏剧界的右派分子戈路（历史反革命分子）等大肆向党进攻。当群众对他的反党罪行进行揭發斗爭时，公然辱罵組織——，威胁群众——，企圖瞞混过关，后虽然交代了一些問題，但很不徹底，內心不服，有一时期还抓住某些枝节問題准备

以后上告翻案。現在已打消这个企圖，表示有悔改之意。但在思想認識上还不徹底。

为了严肃党紀，純潔党的队伍，党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开除戴再民的党籍。並建議行政上給以应有处分。

附：右派分子戴再民的政治結論

一、簡历：

戴再民，男，四十一岁，浙江鎮海县人，家庭出身漁民，本人成分店員。一九三七年底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三月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前任演剧二队队員。解放后，任宜昌日报記者、中南文艺学院教員、武汉人艺导演、戏剧报記者、評論組組長。

二、主要的反动言行：

（一）在武汉进行採訪工作期間的反党言行：

一九五七年五月，戴再民以戏剧报記者身分，到武汉进行採訪，活动了近兩个月的时間。他以二十年党齡的党員身分，到处自吹自擂，招謠撞騙，並利用鳴放时机，到处煽風点火，他勾結了武汉戏剧界的右派分子，向武汉党的領导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

在武汉他竟以欽差大臣的姿态責备武汉領导不支持他搞"鳴放"，他說："群众有顧虑，你們也不想办法，我馬上回去反映給夏部長、田汉同志，告你們一狀。"

1、勾結"三反""肃反"时在文艺界被斗爭的对象和政治上有严重問題的戈路等人，形成一股反党暗流，攻击当地話剧界領导。他对刘年、鄒志鵬說："今后我們一定要好好团結起来。"並談到三反时吃亏就吃在我們自己不团結，叫崔嵬、何延他們鑽了空子！"

与武汉話剧院右派分子鄒志鵬、刘年进行数次反党聚会，鼓动他們攻击該院領导人。在鳴放会前进行了布置，戴說："鳴放

时要先說点党的成績，把社会主义放在前面”。在会上，戴和鄒又一唱一和的对党領导进行了人身攻击。会后，戴献策要把發言記录要回来核对，他說：“要公布的，不要叫他們（指党）抓住小辮子！”反右派开始后，戴对右派分子說：“反右了，要小心喲！弄不好呂西凡非整你一下不可。”

湖北省話剧团右派分子陈路、王逃昫要戴以中央大員身分参加座談会，找个刀笔手作記录，戴說：“老王已介紹了情况，我看你們眞不行，怕什么？只要为了社会主义，有什么意見提嘛！如果不听，就往上告。过去崔嵬和唐亥那么大，我就把他整走了”后因戴回京，未去成。

2、挑撥民間职業剧团和国营剧团关系。他亲自到胜利、楚光楚剧团、黃石汉剧团、京剧团等單位去煽風点火，鼓动对党不滿分子向文化局領导进攻。

戴对他們說：“你們提意見吧！不要談好的，光談坏的。我是中央刊物的記者，可在报上揭發”。又在經費使用方面和剧場使用方面进行惡意的挑撥。董少英說：“要把鳴放意見轉給領导上”，戴說：“我見了巴局長和他談談，他若不听，我給他在报上来一段，搞他一家伙！”还勾結在黃石汉剧团的女朋友吳惠俠（伪重庆市長的姨太太）去該团开座談会，打乱团的計划，搞得領导上非常被动。

在北京时，戴曾支持电影局演員剧团右派分子巴鴻等反对領导，自己又写了几千字文章“莫讓电影演員空白头”，污蔑电影局領导，歪曲事实，顚倒黑白。文中說：“領导人是十足的官僚主义，有意断送演員的青春，領导不懂艺术，不培养演員，無知的可憐等。”

（二）戴再民和武汉反革命集团“海鷗剧社”的关系：

海鷗剧社是一个打着剧社招牌，企圖潛逃台灣叛国投敌的現行反革命集团（詳情見五八年八月一日長江日报）。戴和“海鷗剧社”的骨幹分子戈路、姜鳳德等人就是在对历次政治运动不

满，对領导怀着刻骨仇恨，企圖以“海鷗”作工具，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下勾結起来的。

戴再民並向武汉文化局打听消息，把領导上的某些內部情况密告給戈路等，並和他們共同策划威胁、蒙哄、欺騙領导的办法，以使他們的反党陰謀得逞。

籌备剧社的經費，姜鳳德原拟向华侨私人貸款。戴献策：“要向中央貸款三十万。如果將来还不起，写个檢討就行了”。陰謀騙取国家大批款項。他还殷勤的答应要在北京为剧社物色演員。

戴又写了一篇代剧社鼓吹的文章“应积極支持建立自力經营的文艺团体”寄回戏剧报，企圖發表出去，造成輿論压力，迫使武汉領导上批准他們的活动。

戴曾向反革命分子洩密，出卖組織。他以党員記者身份，去找文化局巴南岡局長談話，以促成“海鷗”成立。巴局長說：“这些人多是肃反对象，政治上有問題的人，有的还沒有做結論，平时这些人就好鬧，集合在一起就更难办了。我們不打算批准这个剧社。”戴把这些話立即轉告戈路，結果戈路就去質問巴局長。巴局長又找戴进行了批評，並要他向戈路解釋，戴却又將談話的情况全告訴了戈路。戈路对人說：“別看老戴是党員，我們是老朋友，無話不談。”

（三）反对党的历次政治运动：

戴再民和刘年、鄒志鵬談到武汉的反右派斗爭时，戴对新萊、魏子坦說：“武汉反右派有偏差”。程千帆本来不願提意見的，用小汽車把人家接来，人家提了意見，又整人家，太不象話等話告訴刘、鄒，並說我回北京后要彙报給張光年同志。又說：“反右派斗爭堵塞了鳴放”。

他又污蔑肃反运动，說中南的肃反搞的最坏。並支持反革命分子戈路翻案，戈路要向国务院上告，戴說可告到中央监察部，說：“巴局長过去搞錯了，也未給做結論。现在下不来台啦。你

去要巴局長补發津貼。”並說：“过去我在中南看过你的档案材料，沒什么了不起。有什么理由說成反革命呢！”戴就这样向肃反对象洩露党的机密，完全丧失了立場。

三、平日一貫的悪劣思想品質：

戴再民一貫的以老党員、功臣自居，糾集落后分子，对抗領导，打击积極分子。他不惜用各种手段追求名誉、地位、金錢、待遇；誰要是妨碍了他个人利益，他就反对誰。

他惡毒的攻击北京、武汉文艺界的一些領导人，造謠中伤，打击破坏。还写了几篇文章污蔑、丑化“三反”“肃反”的領导人巴南岡、崔嵬、呂西凡、何延等。对三反自己貪污受审查，总是待机进行翻案。經常散布流言蜚語，挑撥党群关系。

四、在反右派斗爭中的态度。

經武汉党的反映，領导上找他談話后，他並沒主动向領导上交代，却又写信告訴戈路說：“有人来控告我在武汉乱点火，我要求組織上追查眞象，不然我要控告，这件事，我們組織上会来調查的，希望你不要随便对人說，免得你也被糾纏在里面。”經派人調查，領导上全面掌握材料后，找他談話，态度仍極坏，拍棹子，企圖把領导的意圖頂回去。威胁說：“为什么要把我的問題弄到党外去，这是領导上想把我向火坑里推，有意把我当成党內的典型来斗爭。將来你們是要檢查的。”

經过几次会进行揭發后，他承認了基本問題，表示低头認罪，但內心不服，有一时期还抓住某些枝节問題，准备以后上告翻案。現在他已打消这个企圖，表示有悔改之意。但在思想認識上还不徹底。

五、結論：

根据以上事实，戴再民参与“海鷗剧社”筹划活动，勾結右派分子攻击党的領导，支持反革命分子翻案，洩露党的机密，当党不能满足他个人的野心时，就怨气冲天，利用鳴放的时机向党的戏剧事業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根据以上事实确定为右派分子。

六、处理意見

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中共浙江日报总支
关于开除高光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五日

高光（曾用名楊野、萊藜等），男，三十四岁，河北盥山人，家庭成份中农，本人出身学生，一九四三年二月入伍，一九四三年六月入党。历任：县工作員，偵察員，冀魯、渤海报社記者、編輯，渤海区党委宣傳部秘書，浙南大众报社長，温州市委宣傳部長，浙江日报通訊部副主任、政治秘書、第一副总編輯等职务。

高光入党多年，始終对党不忠誠，早在解放战爭时期，他就自詡为"典型的青年幹部"的人。一九四九年南下以后，日益發展了自己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在調任温州浙南大众报社長时期，狂妄地强調报紙編輯部的"独立性"，和地委領导分庭抗禮，重大問題不請示不彙报，对党委的指示不認眞研究貫徹，很多时候則是採取"不管它！"的态度。調本报任副总編輯工作之后，更加狂妄起来，儼然以"新生力量"自居。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后，他揚言党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作法都"需要改变一下"、"修正一下"了。在党开展整風期間，他大肆放火，妄圖以自己动搖、变节的資产阶級个人野心家的面目来"改造"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篡改国家經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方向。

在此次反右派斗爭中，本报全体职工和省市新聞出版界曾先

后举行六次辯論大会，揭發和批駁了高光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根据所揭發並查对屬实的材料，高光的主要反党事实如下：

（一）一九五六年六、七、八月間，本报由高光代理总編輯的工作。在这期間，高光起草了一个本报編委会給省委的檢查报告，並先后向編輯部工作人員作了三次报告，煽动編輯部人員进行所謂“报紙革命”。这个报告是篡改党报政治方向的計划，是在新聞战綫上向党进攻的反党綱領。

高光在他的反党綱領中，不顧事实地抹煞一切，把党和党报的工作汚蔑得“一团糟”，推翻了办党报的一切根本原則。把报紙能够正确体現党和国家的宣傳政策，汚蔑为“四平八稳”，“宣傳报道一边倒”，“起了盖子的作用”；把报紙积極宣傳各項建設事業的成就，汚蔑为“反映实际工作的眞实情况不够”；把报紙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汚蔑为“版面上充滿了一般性的季节生产报道，單純業务性的文章和老調重彈的工作方法”。对报紙的文風和形式，高光抓住个别缺点肆行喧染夸大，汚蔑得一無是处。他主張向解放前的“大公报”学習，煽动大家不要做“人民日报”的傳声筒。对于本报編委会历年来能够尊重並积極爭取省委的領导，汚蔑成“沒有主动性，沒有主見”，“只能跟在領导机关和業务部門的后面跑”。他还对編委会能够坚持党报工作的原則肆行汚蔑，說什么“編委会有严重的右傾保守思想，在工作中給自己定下了許多清規戒律，束縛了自己的手脚”。

高光在他的反党綱領中，妄圖取消党对报紙工作的領导，把报紙編輯部变成向党鬧对立的“独立王国”。他在檢查报告中所提出的十五条“改进”意見，沒有一条是談党对报紙、对編輯部的領导的。相反地，高光在所謂“独立思考”、“独立負責”、“發揮主动性”等幌子下，惡毒地攻击和反对党对报紙工作的領导，煽动編輯部“不要跟在領导机关和業务部門的后面跑”，叫囂破除“清規戒律”，揭开“盖子”。他批評本报編委会对所謂

“中央和省委沒有提出而报紙可以提出的問題”就不敢提，在这里高光玩弄“报紙可以提出的問題”的字句来掩盖他摆脫和反对党的領导的陰謀，实質上是煽动报紙向中央和省委分庭抗礼，把报紙編輯部变为向党鬧独立性的“独立王国”。他还否定党中央关于改进报紙工作的决議中所規定的原則，反对批評报道事实一定要准确。在日常工作中，高光也是一貫对抗党的領导的。高光对省委的指示和省委各部門的意見，經常在报社的同志面前狂妄地以“不管它！”“去它的！”等言詞加以抵制。高光的这种狂妄的反党言行在对待报紙开展批評的問題上表現得更为露骨。高光在編輯部內部积極提倡报紙要“無限制的开展批評”，强調“尖銳”；强調把批評的矛头指向党和党的高級幹部。

高光在他的反党綱領中，以提倡报紙的“群众性”、“共同兴趣”为幌子，否定报紙的党性和指导性的这个極端重要的根本問題。他不但把报紙的党性和群众性对立起来，說什么报紙“过去片面地强調了报紙是党委指导工作的工具，忽視了报紙是人民的喉舌”，而且还別有用心地强調說：“我們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呢？总的說来，是加强报紙的群众性”，妄圖就此取銷报紙的党性，否定“党报是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紙”这一根本原則。高光还在“全面認識指导性”，講究“共同兴趣”的幌子下，竭力反对报道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介紹党和国家的各項实际工作的經驗，他惡毒地污蔑这些报道“千篇一律，一个調子”，“很多讀者看不下去！”还說“报紙不是工作通报，报紙首先要使讀者引起兴趣，不然，指导性再高，人家不要看也是枉然的。”因此他主張以后要根据沒有党性、沒有阶級性內容的所謂“四要四不要”的原則——要新不要旧，要早不要迟，要淺不要深，要短不要長，来进行报道。他还反对記者經常向領导部門了解情况，認眞研究党的工作意圖，而提倡記者要学習所謂“老报人”的經驗，到馬路上、茶店里、书場中去找“新聞”。高光以“増进报紙的共同兴趣”为借口，拒絕刊登許多对实际工作有重

大指导意义的党、政部門的指示和工作有重大指示和工作經驗，排挤对党的中心工作的报道，而代之以"某地一只母鷄一天生二个蛋"、"汽車压死人"、"吃飯难"等等大量的所謂有"群众性""共同兴趣"的聳人听聞的报道。甚至在去年八月，全省人民为了克服台災帶来的困难，热烈开展增产节約运动的时候，高光也無視党的中心工作的报道，以大量的篇幅刊登要求調爱人、闊待遇、增加口粮、不顧广大群众生活水平要求無限地提高职工福利等等煽动性的讀者来信。

高光在他的反党綱領中提倡的所謂"干預生活"是以揭露"陰暗面"为目的的。他把本报污蔑为"反映实际工作的眞实情况不够，及时地深刻地揭露实际工作中的矛盾不够，不敢大胆干預生活"。因此，他在今后改进报紙內容方面的第一条意見，就是要求报紙"更多地揭露实际工作中的矛盾，大胆地从多方面干預生活，全面加强报紙的指导性。"他認为只有"深刻揭露"什么"阻碍政治、經济、文化事業發展的东西，違反客观規律的事情""不仅要关心人民的衣、食、住、行，而且要关心人民的家庭、婚姻、休息、娛乐、个人兴趣，反映他們生活的各方面存在的問題和困难，替他們的合理要求大声疾呼"，这才是"报紙推动实际工作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在高光的这种資产阶級新聞观点的指导下，本报在高光代理总編輯工作期間，連續地在第一版最显著的地位刊了大量的所謂揭露和批評的报道和漫画；曾經以大半个或几乎整版的篇幅来刊登所謂揭露新問題的讀者来信。总之，高光的所謂"干預生活"就是使党报引导人們，去挑剔新社会的"毛病"，去煽动人們向新社会"鳴不平"。

高光的这一反党綱領，在編輯部內部建設方面，是提倡"技术第一"，不要学馬列主义的理論，妄想从政治上、思想上瓦解整个編輯部。高光認为，新聞工作中所存在的不少問題"都集中在業务問題上。"他說："解放以来，好象是什么人都可以幹新聞工作，这虽然沒有什么結論，实际上却是这样。新聞幹部好象

只要領会党委意圖就行，不需要什么技巧与業务。”他在这里，既否定了解放以来党对新聞工作人員的培养訓練，新聞工作人員本身在業务水平上的提高，同时也錯誤地認为業务問題已經成为当前的唯一問題了。因此，檢查报告中关于“改进編輯部的工作”部分，就絕口不談学習馬克思列宁主义，絕口不談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絕口不談学習党的政策，一味强調学習技术，在編輯部造成“技术第一”的空气，讓資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思想自由地泛濫起来，按照他的資产阶級的办报观点来“改造”党报！

高光不主張学習馬列主义的理論並不是偶然的。他已經有兩年不学習馬列主义的著作了，特别是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馬列主义的理論，更發現了动搖和怀疑，他曾散布說：“現在沒有完整的馬列主义观点了”，“現在学了也沒有用，說不定以后还要批判的”，“不如以后再学”。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旬，高光的反党綱領提出不久，本报总編輯于冠西同志学習回来后，在省委的指导下，曾召开編委会对高光起草的檢查报告进行辯論，对其中的主要观点和錯誤主張进行了批駁。当时，高光对有些問題表面上表示接受正确的意見，但是实际上却口是心非，陽奉陰違，坚持反党立場。一九五六年十月，他在溫州市新聞界座談会上更进一步地販卖他的反党綱領，叫嚣报紙沒有主动性，总編輯“不自由”，还煽动地方报紙要“思想解放”，不要成为党委各个部門的“公共汽車”。

（二）高光利用他自己的笔惡毒地向党进攻。一九五六年以来，他用楊野、噴火、石笋、蒺藜、維路、华文等化名，写了二十多篇杂文、特写、小說和詩歌。他的作品具有露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傾向性。他主張“暴露新社会”、“反对歌頌”。他在近年来所写的二十多篇文艺作品中，除了个别短詩以外，几乎都是抹煞党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成績，对新社会大肆污蔑的毒箭。在他的这些作品中，惡毒地丑化党的幹部，例如他把党的幹部比

作“騎在人民头上的昏庸無知皇帝”；把忠实执行上級指示的幹部刻画成“只会机械地說一句話的傻女婿”等等。相反，他对自己，对阶級敌人却是無限地歌頌和贊揚。他在一篇長达二万余言的特写“在心臟的青一部分”里，热情地歌頌了一个名叫罗达的市委机关报总編輯，而罗达却和高光一个模样，是一个对党一貫不滿的，妄圖“改造”党、“改造”党报的“革命英雄”，野心勃勃的資产阶級个人野心家。

到大放大鳴期間，高光利用杂文这一形式瘋狂地向党进攻。污蔑党强調整風要和風細雨是無知，是“沾染了重病而又諱疾忌医”。他叫囂什么“苦、甜、酸、辣、咸、香的、臭的”，“烈性的，有毒的”都能“治病救人”，他要党拿“鴉片”和“砒霜”来“医治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要求我們党自縛其手脚，去充当右派分子的箭靶。

高光在他的詩里，大叫“外行不能領导內行”。他在以“难办！难办！”为題的这首諷刺詩里，把党的老幹部描繪成一群只会做“小葱拌豆腐”那样簡單的事，只会“掄棍子打狼”和“老是帶着根棍子”“对人民用压力”的粗野無知的人。他力竭声嘶地叫囂着要这些“三八式”、“二七式”的老幹部下台！

（三）一九五六年省二届一次党代会上，高光的大会發言，集中地向省委进行了一次猖狂的进攻。他污蔑省委有一种習慣势力：“習慣于眼睛向上，照搬上級指示，不从实际出發不善于独立思考。”“習慣于用行政命令办事。”“常常以訓斥代替批評，以扣大帽子来代替說理，用压力来代替商量。”“省委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把自己看作是諸葛亮，把幹部和群众看成阿斗。”污蔑省委的不少領导同志“驕傲自滿、自以为是、不懂裝懂、粗暴蛮橫”。他公开抵抗省委負責同志对浙江日报的批評，在省党代会上他狂妄地进攻說：“浙江日报不是为某一个人服务的，为什么个人可以駕于組織之上，随随便便地損害整个党报的威信，这是腐朽的特权思想在党內的反映”。

（四）高光到处放毒点火"鳴不平"，成为右派在报社的內应。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期間，他在領导本报肃反、审幹工作中，曾包庇和支持右派分子夏欽瀚、謝獄向党进攻。夏欽瀚从一九四六年起，就是胡風的忠实信徒，但在肃反中，高光竟不顧事实为夏欽瀚辯护，並在正式塡写定案登記表时，按照他个人的意見叫人来改写夏欽瀚的結論，掩盖了夏欽瀚的罪行，使結論变成了为胡風忠实信徒夏欽瀚辯护的意見書。更惡劣的是，在夏欽瀚的結論未上报之前，高光为了討好夏欽瀚，竟不惜違犯中央規定，把有关夏欽瀚結論的全部材料以及本报編委会、五人小組內部爭論的兩种不同意見，和高光本人为夏辯护的意見書，都毫無保留地給夏欽瀚看过。右派分子謝獄的老婆是特务，肃反时杭市教师集訓班搜查了他的家，謝的东西也被搜查，謝对此很不滿。曾写了"申訴書"，要求杭市教师集訓班恢复他的名誉，高光也积極加以支持。高光还竭力掩盖他岳父的罪行。高的岳父是个地主阶級当权派，曾当国民党軍法处長（少將銜）多年，当过汉奸参議員，还是反动道会門头子；解放后还繼續与人民为敌，抗拒反动道会門登記，窩藏、包庇反革命分子。对于这样一个汉奸、反革命分子，高光却不相信組織上的調查材料，硬說他岳父是个"进步人士"。

一九五七年春天，高光还积極參加右派小集团謝獄等人發起的签名活动，支持右派分子林希翎向党进攻。在这里高光和右派分子林希翎一起，污蔑共青团中央、北京人民大学党委、中国青年报，說什么"这太可怕了，我坚决支持（林希翎）！"在大放大鳴期間，高光叫嚣"省委不支持放鳴"、"勁头不大"。高光看到上海新民报發表的一篇惡毒地攻击浙江省委的通訊"从葛嶺望杭州城城墻"，以后，表示非常欣賞，一次再次地主張轉載。还說"这是借东風"。当时有同志提出文內所写情况与事实不符，高光竟狂妄地說："这个不管它，登了再說！"在这同时，高光利用职权，积極支持广播电台右派分子楊翼写反动文章向党

进攻。

（五）高光为了实现資产阶級个人野心，竟至不擇手段。平时，他把自己伪裝得儼然是一位"革新家"的模样，在編輯部內部散布流言蜚語，污蔑坚持党报工作原則的于冠西同志"右傾保守"、"四平八稳"、是"盖子"、是"省委不点头就不办事的"。在日常工作中，处处破坏集体領导的威信，标榜自己，吹嘘自己。他在对待省委的态度問題上，在报社工資改革問題上等等方面，不惜放棄党的原則、損害党和国家的利益，来迁就报社一部分同志的錯誤思想，借以騙取群众的称贊。高光为培植个人势力达到向上爬的目的，他一面与右派分子謝獄、夏欽瀚等人勾勾搭搭，一面又和本报副总編輯馬蘊生及人事組長王建国拉拉扯扯，互相吹捧，尽力支持他們的一些个人要求，以此来换取他們对他个人政治野心的支持。果然，在去年七月的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这个副总編輯提名高光为省委候补委員候选人，八、九月間，馬、王兩人又違犯党的組織原則、进行宗派活动，联名上書省委，推荐高光担任本报总編輯。高光知道此事之后，沒有向組織上彙报，竟暗地里得意洋洋，自以为"喜日"即將来临。

以上事实說明，高光反党罪行的严重危害性質是在于他依照他自己的資产阶級新聞观点，制定了反党綱領，进行所謂"报紙革命"的，妄圖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在于他利用自己的笔惡毒地向党进攻，以丑化党丑化幹部为能事；在于他到处放毒点火"鳴不平"，为社会上的右派作內应。高光墮落成为党的叛徒並不是偶然的。他参加革命以来，長期放縱資产阶級个人野心的發展，一貫抗拒党和群众的批評和监督。特別是自波匈事件發生以后，他从对党的不满，进而發展到政治上的动搖，最后墮落成为危害党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为了肃严党的紀律，純潔党的队伍，維护党的团結和統一，根据八屆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党內右派分子的原則，經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开除高光的党籍，並建議行政上撤消高光的一切职务，取消其原来的行政級別。

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陈修良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一月

陈修良，原名陈逸，曾用名莫湮、小琴，女，現年五十岁，浙江鄞县人，家庭出身地主兼商業資本家，本人成分是职員。1926年参加共青团，1927年轉为共产党員。1926年开始参加革命工作。全国解放后曾任南京市委組織部長、常委，赴苏党組織工作考察团团員，上海市委基層工作委員会副書記，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华东局妇委副書記，浙江省委宣傳部第一副部長等职。

历史上于1930年9月因領导絲厂罢工曾被捕十天，未招認口供而釋放。1932年10月因誤約地址和1935年夏秋間因上海党全部破坏曾兩次失去組織关系。

陈修良一貫来存在着严重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長期以来对党不满，把个人与党处于对立的地位，来浙江后又更發展到極其严重的程度，他猖狂的攻击污蔑省委和各級領导人員，甚至于公开地污蔑党，散布反苏、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民主專政、反馬列主义的反动言論。根据鳴放期間所揭發的材料，她的反党言行主要事实如下：

（一）对党刻骨仇恨，一有机会就恶意地向党攻击

她否認省委的工作成績，对前届省委的領导进行了猖狂的攻击：她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發言中"省委每个时期各項工作發生了严重的錯誤，省委过去領导作風不純，不民主，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某些主要負責人滋長个人主义、驕傲自满思

想，沒有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領导”。在党代会議的分团会議上，瘋狂地汚蔑省委負責同志是“皇帝”，是“昏君”，对当时提出的新的省委候选人名單也进行了惡毒的人身攻击。

在这期間，她到海宁县参加过县党代表大会，对县委及党的基層領导也进行了汚蔑和攻击。說县委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盲目性。还惡意的挑撥幹部团結說：“县委会山东人多，本地人少。”

汚蔑党的革命生活和組織原則，把党說成是一个宗派斗爭、互相傾軋、毫無原則的小集团。她在第二次党代会期間公开說：“省委有宗派主义，使用幹部有裙帶关系。”在討論省委委員候选人过程中，她曾不怀好意地几次贊揚岳坟前面的“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眞”这付对联。他經常拿忠奸对比，以古喻今的惡毒手法，隐射現在我們党是奸臣当道。他所写的詩內也明显地流露着这种反动情緒。

她經常說：“她一生热情忠誠为党工作，但三十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間背着包袱。”意思是說她沒有被重用，党对不起她。党代会后，她还到处散布党內生活可怕、党內宗派主义比敌人还厉害的流言。說：“在省委开会，我是不敢講的，会議上有那么多秘書記录，誰知道他們在写些什么东西？”她曾对省委宣傳部的同志說：“党內宗派主义比敌人还厉害，敌人是明显的，容易識别的，党內宗派主义是隐蔽的，弄不清楚，我是吃过宗派主义苦的。”

反对党对政府工作的領导和党的一些重大方針政策：

她不止一次地說：“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党政不分，圓印子吃香，方印子不吃香，党員幹部不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在海宁时对宣傳部一位同志造謠說：“县里是以党代政，省里也是这样。”

她反对党所提出的中小学畢業生参加农業劳动的政策。她在研究中、小学畢業生工作时說：“高中畢業生参加农業生产，我的女兒就不去（她女兒是应屆畢業生），考不上大学宁可請家庭

教师。”並且批評“要中、小学学生参加城市服务性行業工作是不对的。”她却强调“城市学生到农村在生活上不習慣”，“在农村沒有根，站不住脚”，不同意科学处的正确意見。

（二）她反对人民民主專政，惡毒地汚蔑肅反运动

她說机关肃反是对幹部的政治生命採取主观武断粗暴手段，是充分表現了对幹部沒有爱护的思想，是对党对幹部不負責任的惡劣作風的具体表現。

她到处攻击公安机关，說公安机关的保衛制度是“胡来”，是“过多的干涉”“不自由”。

（三）反对苏联，破坏無产阶級的国际团結，散布流言蜚語，歪曲苏联的社会生活現实

她說：“……苏联人民的生活在画报杂志上宣傳的是少数典型，实际上物价很貴，买件襯衫，买盆水果要好多盧布，低工資收入的工人生活很困难，莫斯科有些学生要排队轉卖东西，从中取利作为自己的生活补助費……。”

她常常在有些同志面前講：“苏联同志很爱錢，挑选工作自由，那里錢多到那里”。她还不止一次的說：“我大女兒从苏联回来，滿腦子資产阶級思想，我与她格格不入，以后再也不要把小孩送到苏联去学習了。”

並經常散布反苏情緒，破坏国际团結，曾对省委宣傳部同志說：“苏联写信警告英、法是很不愼重的，沒有考虑到可能引起的后果。”“苏联肃反使許多人人头落地”。

她在省委学習班講課时曾說：“解放后，我到苏联去，作为一个中国代表团，去参加观禮，从旅舘到观禮台路很近，但經过苏联保衛人員好多次檢查証件，当时我們是苏联的国宾，为什么要这样不相信我們。”

她几次說：“苏联同志对中国沒有反苏情緒很怀疑，解放

后，我到苏联，好多人包圍我，要我回答这个問題。”又說：“我不論到工厂、农村，苏联同志总要問中国有沒有鉄托？”

（四）反对学習和宣傳馬克思列宁主义，宣傳反动的修正主义

她想出各种办法来反对学習和宣傳馬克思列宁主义。她認为党校与業余政治学校有組織的学習理論“太不自由”，只能够培养“書呆子”。“要我到高級党校去学習我是不去的。”

她曾数次要杭县停办業余政治学校。又要理論教育处写报告給省委建議停办县級机关業余政治学校，（后經其他部長反对，沒有送省委）。她反对大專学校开办馬列主义夜大学。並积極反对建立理論教育队伍。

她說：“經典著作是一条繩子，束縛了人的思想。”

积極提倡学習理論要根据“自願原則和自由兴趣”；她不止一次的在研究幹部理論学習会議上說：“不願学理論的，他們要学什么，就讓他們学什么。物理、化学、文艺都可以，唱歌、跳舞也可以。”

她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旗子，千方百計地散布修正主义观点。她否定中国社会有阶級的存在，修“正”馬克思、列宁主义划分阶級的定义。她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报告中，說：“孙中山講的大貧小貧也有点道理，工商業者穷，小地主也是穷的，沒有什么了不起。”

“中国資产阶級是世界資产阶級中最进步的、自觉自願的把財产交出来”。她还多次講到：“中国資产阶級比美国的落后工人还进步”。她在省政协学習会上作“再論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学習体会發言时，她还說：“有些人不相信資产阶級腦子已經改了，中国資产阶級已經基本上消灭了。贖买政策就是去掉資产阶級的尾巴的办法。如果以为还未消灭，那为什么要供养它”？

她对地主、資产阶級是有强烈的阶級感情的。曾对資产阶級分子說："个人的出身不能怪我們自己，因为生的这个家庭中，只有上帝知道，所以不必自卑，人家要駡也只好讓他駡。我是地主家庭的叛变者，你們也在叛变中，所以不要自卑"。这在实际上就鼓励了資产阶級分子不要进行脱胎换骨的徹底改造。

她宣傳阶級调和論，散布阶級斗爭熄灭論。她說："現在資产阶級与無产阶級之間的矛盾已趋轉化，对抗性的矛盾已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有的認为对抗性的矛盾，这是教条主义。"她說："……斯大林講阶級斗爭越来越尖銳，难道阶級沒有了还要尖銳嗎？这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我們浙江亦犯过越斗越尖銳的錯誤，这就是教条主义……"。

她公开散布"和平長入社会主义"的謬論。她曾不止一次地說："和平長入社会主义"这个論点是在苏联批判的，不适宜于苏联，但中国情况就不一样"。

她認为阶級斗爭在目前已失去意义。

她否認党的性質和領导作用。把党說成象一个政治协会一样，她說："这次王明还当选了中央委員，因为他代表了小資产阶級，我們应該帮助教育他，如不去团結他，小資产阶級还是存在。"

她对納吉及其他修正主义者的看法。

她說："修正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派別，这沒有什么可怕"。

又認为南斯拉夫同志們对于斯大林的錯誤抱有特殊的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还流露了贊揚納吉的情緒，她說："拉科西說納吉是反革命，这是敌我不分，納吉原是个有信誉的农業專家，是个共产党員，因为他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搬苏联經驗，要求發展輕工業、农業，反对拉科西而被关到牢里去了。他的錯誤（指这次十月叛变）也是犯了敌我不分。"

她对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看法。

在她的报告里对知識分子都作了这样估价：“沒有知識分子社会主义革命寸步难行。”她还說：“知識分子主要是依靠才德吃飯，士为知己者死，不吃嗟来之食，有骨气”，“知識分子有个人品質，憑个人能力，中国士大夫历史上就有这个傳統，清高、不吹牛拍馬，这是好的。”

（五）在大鳴大放中的表現

放鳴期間，她在省政协会議高教組作了發言。說：“要拆敌我矛盾与人民內部矛盾混淆不清的牆”，說：“驕傲自滿的思想在我們党內相当严重，三个主义加上驕傲，問題就更严重，要党內多負責”。又說：“知識分子是‘士可杀不可辱’的。粗暴、不講道理……所有帽子都要拿出来，还給他……。”他对資本家报告时說：“我們有錯誤，要恭听教訓，大家都要鳴放，不平則鳴，有職無权要鳴，本来賺錢的工厂，公方搞亏本了，資本家应該批評。”

广播电台記者採写了浙大教授董太龢（右派分子）的講話（內容反动），請示她是否可以广播，她直截了当地說：“你們放鳴好了，还审什么稿。”

浙江师范学院部分学生以不要考馬列主义为名反对政治教育，並特地派代表到部里来請願，她对他們說：“按題考試馬列主义是教条主义，要是这样考試我也考不及格。”立即答应把政治考試改为考查。

反右派斗争开始，在报上已揭發了宋云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后，她还認为宋是民主人士，是左派。

在反右派斗爭初期，省委宣傳部有些同志写了批駁右派分子吳惟平反动謬論的文章，征求她的意見，她批評写稿的同志：“老說人家的錯处，不說人家对的地方，不能令人信服。”

当宣傳部已开展对右派分子黃源的斗爭后，有人提到“黃源一貫对党不滿，走上了反党的道路。”她立即接上去說：“不

是！不是！只是在会議上講話講得难听一点。”

根据以上大量反党事实說明，陈修良的反党情节是十分严重的，已經完全丧失掉一个共产党員的起碼条件，而墮落成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五毒具全的資产阶級極右分子。为了严肃党紀，純潔党的队伍，維护党的团結和統一，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决定开除陈修良的党籍，並建議撤銷她党內外的一切职务。

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支部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黃源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一月

黃源，又名黃河清，男，五十二岁，浙江海鹽人，家庭出身职員，本人成份自由职業者，一九三九年十月入党，同年三月入伍。全国解放以后，曾担任上海軍管会文艺处副处長，华东軍政委員会文化部第二副部長，华东局宣傳部文化处副处長，中共浙江省委文教部副部長、宣傳部副部長，並兼任省文化局局長等职。

黃源是浙江文艺界反党集团的为首分子。他敌視党的文艺方針和路綫，否定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方向，在文学艺术中大放毒草。他还歪曲事实，煽动文艺界对党不滿，反对党的領导。在大鳴大放期間，他和文艺界党內外的右派分子一起，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黃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極端严重的，主要事实如下：

一、黃敌視党的文艺方針和路綫，以資产阶級的修正主义思想篡改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和文艺工作的工农兵方向。

1956年秋，黃与右派分子郑伯永、王参如起草了一个如何貫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文艺方針（草案）的报告，在

这篇报告里，他們对浙江文艺工作上的問題作了肆意的歪曲夸大，認为浙江文艺工作处于“自生自灭的狀态”，在文艺理論方面則認为是“在日常工作中沒有划清开展反对資产阶級思想斗爭和学术自由討論的界綫”，“沒有把胡風反革命集团片面强調文艺特性来进行反党，和文艺幹部要求領导上根据文艺特征来領导文艺工作的正当要求加以区别”。在領导創作方面則是“行政命令做法，粗暴批評，把文艺創作与及时写作文艺宣傳資料来配合中心工作混淆不清，甚至錯提了反对單純技术观点和反对个人創作的口号”。

黃源經常散布艺术即政治的論調說：“管事業，管業务是最大的政治工作”。又經常說什么“社会主义包括經济建設与文化建設，搞好文化工作也就是政治，就是社会主义”。他到处提“反对教条主义”。在一九五七年省第三次行政工作会議上的报告中，他說：“教条主义很热心想創造社会主义新文化，想表現新人物，但对过去的傳統採取否定的态度，这在浙江表現得也是突出的，一直到农村俱乐部，只要新的，結果变成干巴巴的”。他又說：“我們浙江在文艺工作上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現在就是要求艺术机械的为政治服务，艺术当然应該为政治、为工农兵服务，但理解得非常狹隘，仅仅理解为配合当时当地的中心服务，与当时当地中心沒紧密关系的就受到打击、排斥，把百花齐放与为政治服务对立起来，这是錯誤、片面的”。他又說：“香花毒草应有我們的看法，当然不是看到毒草就一棍子打死，而是要經过討論，慢慢地搞清楚它的性質。要放，就有好的坏的，我們要学習要会辨别。我們拿馬列主义来套，簡單的下結論，是不行的”。就这样，他把党的指导思想——馬克思列宁主义在文艺方面輕輕抹掉了。

歪曲事实制造所謂“獅子龙灯”事件，以反对党的領导，反对党的文艺路綫。浙江民間歌舞巡迴演出团在黃源的錯誤思想指导下，只选拔了傳統的民間艺术节目，根本沒有反映人民現实生

活与斗爭的节目。省委指出巡迴演出团光有“獅子龙灯”等旧节目，沒有反映現实生活与斗爭的节目是不对的，要求充实新的內容，並尽可能配合四十条宣傳。省委这一批評与要求是完全正确的，可行的。但是，黃源进行消極对抗，在文艺界到处散布流言蜚語，並且私下里惡意地决定解散巡迴演出团，要在獅子龙灯身上貼标語，以嫁禍于省委，到处宣傳說“省委要解散歌舞团”等等，来攻击“省委是教条主义”，在文艺界制造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反对文艺工作者深入下層，反对普及工作，甚至認为“过去浙江文艺工作只搞組織工作是罪惡的”。他以所謂“城市領导农村”为理由，反对群众文化工作深入农村，組織与輔导农民开展業余文艺活动。經常嘲諷省文化局社会文化工作是用的“手工業方式”、“游击作風”、“以工作队方式来領导文艺”。中央文化部指示群众文化工作者应該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人員經常下乡下厂，进行具体輔导工作，黃源却要社会文化科三分之二人員搞創作。他說：“搞組織工作，搞不出什么明堂来”。黃源又經常散布什么“野战軍与地方軍”的論調，公开宣揚說：專業文艺团体是“野战軍”，業余文艺队伍則是“地方軍”、“民兵”，文化領导部門应該抓“野战軍”为主。在这种理論支配下，黃源不关心群众文化工作，特別厭惡文化宣傳工作，鼓励下級文化部門放棄对群众文化工作的領导，以此来对抗文化部所指示的“以群众自办，以業余文化活动为主”的方針。他也反对專業剧团为工农兵巡迴演出，在場团調配工作上提出了“門当戶对”的方針，說大剧团只要在大中城市，大剧場演出。他还强調“要以艺术来領导文艺”的謬論，反对对艺人加强政治教育。在剧団音乐訓練班的課程中，他都把政治教育的內容抽掉，說：“講这些沒有用”。

反对为政治、为工农兵服务，他决意停办了以登載演唱資料为主的“大众演唱”月刊，極力支持創办“东海”文艺月刊，把

大权交給他的亲信、右派分子郑伯永，大放大鳴期間“东海”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論壇。在黄源、郑伯永等人宣揚所謂“文艺宣傳資料不是創作”的謬調影响下，部分文化館放棄了文艺宣傳資料的組織、編印，相反的有些幹部关門創作，不願下去进行輔导工作，二十多个县、市办了迎合少数知識分子口味的大型刊物，而这些偏向却为黄源所贊賞，認为是个方向，也是一棵“花”。

黄源在表面上似乎是重視民族遺产，实际上把文艺事業引导到脫离当前政治斗爭、脫离社会主义的現实生活的資产阶級道路上去。他从来不說民族遺产应該有批判地接受和發揚，总是籠統說“民族遺产是建設新文化的基础”。“搞文化工作要从这个基础出發”。实質上是提倡复古。对于歌誦社会主义建設成就的曲艺——“黄河大鉄桥”，他就反感，說：“沒有东西，只是大喊大叫”。浙江省第二屆民間音乐舞蹈会演得一等奖的“貝壳舞”，思想性艺术性都較高，观众一致好評，但因内容影射肃反，被黄源、陈守川等人加上了一个“机械配合政治”的罪名，推翻这个舞蹈节目。

二、黄源反对党的領导和监督，造謠污蔑省委領导同志，一有机会，就猖狂向党进攻。

黄源誣蔑“省委是以庸俗社会的观点来領导浙江文艺工作”“省委不懂文艺特点”“片面强調为政治服务”是“教条主义”。他对右派分子郑伯永說：“科普之所以有成績，是因为省委不懂科学，無法插手之故”。他也經常議論与誹謗省委的負責同志。說：“××同志很粗暴，”“××是以过去老解放区宣傳科長的办法来領导文艺”，以此来破坏党的威信。黄源經常把党与政府的領导幹部罵为“腐三官”“狗官”，說当“官”是沒出息的，鼓励大家当“專家”。他自己公开地对幹部說：“我也不願做这个狗官”。

黄源受省委囑托，分工領导浙江的文艺工作，但是从来不向

省委請示报告工作，省委对文艺工作的指示如果合意的就接受，不通的就違抗，不向下边傳达。他兼任文化局長、党組書記，与文化局右派分子陈守川勾勾搭搭，在幹部面前散布說"陈守川已經七年来不敢講話了"。反过来又打击党組副書記王顧明同志，並誣蔑說"省委如果知道王顧明的水平不能負責文化局，那么省委的水平也就高了"。几年以来，黃源除了在文艺界散布了不少反党的流言蜚語外，还着重地組織了以他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成員，向党發起了三次进攻：

第一次，一九五六年春捏造事实制造"狮子龙灯"事件，向党發起了攻击。企圖以此来煽动文艺界对省委的不滿，借以削弱党的領导威信。攻击省委的"教条"与"粗暴"他們又散布"省委有宗派"、"省委××同志偏听偏信"把文艺工作上兩条路綫的斗爭歪曲成为私人之間的"义气用事"，"無原則糾紛"。黃源、郑伯永、陈守川等又到中央去誣告省委，歪曲事实。这些惡毒的言行在党內外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响，严重地破坏了省委的領导威信。

第二次，一九五六年七月，省二次党代会期間，黃源与右派分子陈伯永、陈学昭、陈守川等連同一气，利用党內民主，向省委發起了一次进攻。黃源首先帶头哭訴"省委粗暴"，攻击"省委不懂文艺"，駡省委××同志"他就是兇猫"，把自己比作老鼠。黃源、陈伯永、陈学昭、陈守川等在小組会上牢騷怨言并發，惡毒地謾駡省委是"阿Q……落后而不自覚""是赵太爷——不許人家革命"。因此，他們建議省委要"好好学習阿Q正傳"。誣蔑"省委不是民主不够的問題，而是根本破坏了民主"，别有用心地說："省委权力掌握在这些人手里是危险的"。

第三次，大放大鳴期間。黃源与王参如在四月間去北京参加中央宣傳会議后，就与反党集团分子統一認識，黃与郑伯永說："現在全国形势很好，要看省委的自覚"。四月底，在右派头子

宋云彬主持的文艺界座談会上，黄源宣称自己是坚决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派”，又惡意地引用毛主席的指示並加以歪曲、夸大（講高級幹部有百分之九十对放、鳴不通），实际上是引导大家把矛头指向省委。在五月份举行的全省第三次文化行政工作会議以及文化局机关放、鳴时，企圖煽动群众向省委領导开火。例如：（1）在文教分科問題上，明明是在一九五六年文教会議时他自己不同意，現在却推到省委身上，而且在当时一次局务会議上說：“省委如果再不解决，我帶头上街去請願”，問大家去不去。又說：“你們不要到半路上溜掉了，这样我局長当不成，你們去当局長”。（2）三門县平调問題，該县文化部門幹部反映当地不够重視，黄源在参加小組討論时，就煽动說：“你們回去組織維持会，来扶持这个剧种”。有的同志反对，說維持会是日伪的反动組織，黄又說：“那么組織同志会好了”。接着說“真的不行，你們到文化局請願，我黄源第一个出来接見你們”。（3）在文化局机关放鳴的第二天晚上，黄源趁机关俱乐部組織游湖，以此为名陰謀进行点火活动。在游湖时，黄源、王参如曾經和右派分子何师曼等談起把“浙江文化通訊”改办“文化报”，黄源說：“从浙江文化通訊扩大，办个文化报，与浙江日报分工，不怕浙江日报不登文艺消息，將来和文匯报一样，和浙江日报唱对台戏，銷路也是不会差的”。在船上，黄源、王参如还煽动大家攻击省委。要大家回局貼大字报，动員科、处長来提意見。第二天上午，何师曼碰見科处長就催着要他們“揭內幕”，史中平等人也十分积極，“科处長也要鳴起来”的巨大标語、漫画要貼出来了。

三、黄源为首在文艺界形成反党集团、打击、排斥党員幹部，任意按插和重用他的“亲信”。

黄源經常在幹部中散布說：“共产党員不懂，就不要插手，讓專家去搞”。黄源就不主張党員骨幹担負領导。如成立剧协时，黄源曾要把党員副主席去掉，音协筹委会六个正副主任，沒

有一个党員，而且为右派分子俞紱棠等掌握領导权。調配幹部首先問的不是政治質量，而是文化程度和“写作”。調任文教部办公室副主任时，黃源說“这个人过去有沒有写作，先拿来看看”。調文化局人事科長时，黃源說：“要他先写个剧本我看看”。

在剧团，黃源公开提出說：“把艺术还給艺人”。把党的領导权轉讓給姚水娟、任完章、陈静之类的右派女將、开除党籍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

郑伯永准备調林希翎来主編“东海”的“海上風云录”，黃源是知道的，並“表示欢迎”。当时林希翎的問題是已有所聞的。

他还不通过組織、不符合人事制度乱任用私人，任用的人当中有他的老同学、老朋友、老部下等等。在任用时还为他們吹嘘。

四、黃源否定党对文艺工作領导所取得的成績，而且把个人放在党的上面，到处宣揚自己的“功績”，把文艺事業看作攫取个人名位的手段，用腐朽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腐蝕文艺界，在浙江文艺界造成了严重的惡果。

黃源从华东来浙江时，就帶着“浙江的領导不懂文艺”，“拯救浙江文艺工作”的心情来的。兩年多来，他从来不肯定过去已經作出的巨大成績，相反的却是認为搞糟了。說“过去只做組織工作，好象土改不分田地一样，这是犯罪”，說“不搞民間艺术，只搞俱乐部是錯誤的”，另一方面，却把他来浙江后文艺工作上的成績归功于他自己，特別是在“十五貫”轟动全国以后，常以“十五貫”作为吹嘘自己的資本，甚至在傳达二中全会决議时也大肆吹嘘。黃源等在文艺界散布这样的論調：“黃源来了浙江的文艺工作才有气色。”

他經常說“我們工作做得怎么样，就看我們死了以后是否有人为我們流淚”。浙江的一些民間艺术与戏剧到北京或外地得到了

好評，他竟認为这是"押宝"押贏了，归在自己的帳上。十五貫开始时是把整理小組名义拿出去的，到北京一打响，連忙把黄源的名字放在第一个。去年文化局已經决定同意越剧团去京彙报演出，黄源說："你們的剧目有沒有十五貫的水平？"又說："去出丑，打不响，回来怎么办？""如打不响回来，团長要撤掉，剧团要換招牌，我黄源就要跳西湖了"。黄源是極端的个人主义者。他把党的事業当做謀取他自己的名利，还常到处宣傳"一出戏主义"，他常說要出名就要演出一出戏，吹响一支曲，写好一个剧本。"一个曲子主义"引导大家脫离政治、抗拒思想改造，鑽到單純的業务圈子里去，关門提高，目的是"成名成家"。

上述事实說明，黄源已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員的立場，对抗党的文艺方針路綫，宣傳和堅持資产阶級的文艺思想，反对党的領导与监督，对抗与拒絕遵守党的組織原則，破坏与分裂了文艺界的团結，墮落为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为了严肃党紀，純潔党的組織，經支部大会全体党員通过，一致同意开除右派分子黄源的党籍。並建議領导上撤掉其党內外一切职务。

中共浙江省文联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陈学昭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

陈学昭，女，五十三岁，浙江海宁人，家庭出身自由职業，个人成分学生，曾在法国留学八年，一九四五年七月入党，是專業作家。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政协特邀代表、浙江省人民代表、浙江省政协委員、浙江省文联副主席。她和郑伯永（右派分子，

原浙江文联秘書長）、曹湘渠（右派分子，原浙江省政协專职副秘書長）等勾結在一起，在大放大鳴和省党代会議期間，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

一、反对党的領导，否定党的成績

解放八年，在党的領导下，浙江文艺工作有了很大發展。陈学昭完全蔑視这些事实，在浙江文艺界鳴放座談会（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五月一日）上說："浙江的'土壤'（按：指文艺工作的傳統，文艺工作者的队伍）想象起来是很好的，但事实上不是如此。""事实上沒有作品。"她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最重要的还是当地党的領导对文艺工作、对文艺工作者一直不重視。""在浙江沒有把文艺工作摆到恰当的位置上去。""在領导者的眼里看来，作家的劳动是沒有什么价值的，是可有可無的。"因为作家写出来的文章，不能为国家增加小米和大米，更不能增加国家的税收。"她污蔑省委："似乎領导上把文艺工作者看成是一些卖唱的、搬弄方塊字的人，根本就沒有把这些人看成是文艺工作者。"

她又污蔑省委对于文艺工作的具体領导。她說："一九四九年八月到浙江，我开始認識了用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行政命令的权威思想来領导文学創作的可怕。"她說："浙江省弥漫着一种不正常的空气，在这种空气下，把文艺工作看成是和政治思想沒有关系的最簡單的东西，教条主义的看待文艺，看不起文艺，不尊重学术，更有的是不懂裝懂，那就更造成文艺工作的困难。"

她在"东海"月刊一九五七年五月号上"大放声中一小鳴"，刻毒地污蔑党对文艺工作者粗暴，粗暴到人权得不到保障。文章写道："我們的宪法上对人民的权利不是写得明明白白的嗎？艺人不也毫無例外地可以享受这些权利嗎？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文艺工作者好象成了一种"賤民"——据說人类历史上有国家曾有过一种所謂賤民，但在我們中国並不曾有过——随便什么

人可以給文艺工作者以無端侮辱、謾駡、打击、捆绑！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她自己回答說：是由于省委"不够重視文艺工作，教条主义的对待文艺，因而对于……文艺工作者……打駡、捆绑，不以为奇！"不仅一般文艺工作者如此，陈学昭把她自己的"遭遇"也說得那么可憐，她是老作家，而且是党員作家，可是在自己的家乡，却也备受排挤。她曾"好几次""打官司打到中央"（引自四月三十日座談会記录）"最近四、五年来，我曾兩次想离开浙江——迁地为良，浙江也有些人希望我离开浙江，但是我还是恋恋不舍的留了下来……"，"在浙江一切都那么难，簡直是千难万难！""这些年来，人們挨悶棍的事情太多了，这伤害了大家的心，往往沒头沒腦的一記悶棍下来，使人們不知道領导意圖究竟何在？"所以在四月三十日的鳴放座談会上，她就說："比方我今天講呢还是不講呢？因为講了，邵荃麟等几位同志回去了，我倒霉了！"归結起来她認为："反胡風之后，浙江文艺还是不繁荣，有个盖子盖着，放不出来。"

她在五月六日政协文艺組扩大会上就曾明目張胆的說："文艺要領导，但要有英明的領导。"六月五日，陈学昭与郑伯永、曹湘渠三人合謀，伪称江华同志"委托"，召开了一个座談会，会上由宋云彬出面提出一个"建議"，要省委"根据文学艺术特征，切实改进对于文艺工作的領导。"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領导，进行了惡毒的攻击。这就是他們正面提出的綱領。他們企圖用这个修正主义的綱領来代替党的文艺路綫。企圖通过这个会議来証明共产党的省委承認自己外行，沒有办法領导文艺，必須憑借右派分子宋云彬、陈学昭之流的"內行"想办法、出主意、領导文艺。

大放大鳴中間，陈学昭非常积極。四月三十日在浙江省文艺界座談会上，她第一个站起来說党內有牆，用党員身分把矛头引向省委。她說："反胡風后，浙江文艺还是不繁荣，是因为有个盖子盖着。"这个会虽然也提了不少有益的意見，但实質上已成

为陈、郑、王与宋云彬等党外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大会。这曾給文艺界党內外右派分子以極大鼓励。

在这个黑云乱翻的时候，她亲自修改了在文匯报上發表的訪問記“乍暖还寒晴复雨”，用她党員老作家的招牌，在全国范圍內配合右派分子向党大举进攻。

二、污蔑党內有宗派斗爭

陈学昭把党污蔑成是一些牟取私利的宗派集团。說“浙江宗派眞严重，山东人排挤浙江人”，“省委一切大权都抓在林乎加手里”，县、乡一般本地幹部也少（意即受山东人排挤）。“林乎加——楊源时（宣傳部副部長）——林辰夫（文联副秘書長）是一条綫”。她下乡去了一次，回来說：“眞可怕，林乎加在农村培植私人势力，也有一套，浙江將来要出大問題。”陈学昭又与党內右派分子一道繪声繪色的捏造了党內宗派斗爭的局面，說“江华同志对林乎加也沒办法”，“沙文汉有职無权”，“黃源有职無权”。又說：“江华同志象‘前綫’（苏联剧名）里的戈耳洛夫”林乎加是凶貓。她家的座上客也大部分都是在某些問題上对党有意見或对党心怀不滿的人。他們从各个角落里帶来了許多流言蜚語，又从这兒帶回去另一些貨色！常到她家去的有曹湘渠、郑伯永，还有黃源、陈修良等人（均是党內右派分子）。她对不熟悉的人有时也講这些东西，“文艺学習”一个編輯来看她，兩人素昧平生，但她也向他散布了許多反党情緒和誹言蜚語，使那个編輯很奇怪。

此外，她又用贊揚中央的办法打击省委的威信。她总說中央关心她，关心人，浙江不关心人，中央好。她認为严仁赓（原浙大教务長，现任北大副教务長）、王历耕（原在杭州某医院工作，现在北京工作）一到中央就受到重視，而在浙江則受不到重視。她說：“我的一切，每星期都向作协党組（或党总支）彙报”。

她把党看作毫無原则玩弄权术任人唯亲的宗派集团，浙江师范学院教授徐瑞云入党后，陈說："现在很多会議都有徐参加，是党在利用徐，徐在党内多几年，慢慢就会懂得一些事情起来，慢慢向党多提一些意见，就不会象现在这样被重視了！"她又認为："党对文艺工作者不是团結教育，而是分而治之。"她还說党象个偏心的爹娘，在作家当中也是誰有人喜欢就被捧出来，誰沒人喜欢就遭到冷落，压下去，因为毛主席喜欢丁玲，周总理喜欢白朗，所以他們就被捧出来了。

三、汚蔑党群关系

我們国家中的党群关系，領导与被領导的关系被她汚蔑为旧社会統治者与被統治者的关系。做領导工作的党員也被她丑化成脱离群众、無知狡詐的特权者。

她住在农村里体驗生活，認为农村有些事情"是可忍孰不可忍"，她說："最近茶价突然被中茶公司無理的压低了，茶农的茶山，經常被人用一紙命令圈去"，"二十亩、三十亩、四十亩"，"茶蓬限期拔掉，可又荒蕪着不用，这些事情都迫使着我为他們'打官司'"，"我在这里老管閒事……这样給我帶来了农民的友誼，我处在一个荒郊僻壤，可是这些热情的农民兄弟帮助我度过了去年的大台風帶給我的災害。"（文匯报訪問記，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文匯报想起……三則）。在她笔下，政府、中茶公司都是蛮横無理、强佔民地、勒索压价的惡霸和官府，党群关系，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公私經济的关系都紧張到对立的程度，而她，陈学昭因为敢于与政府、中茶公司，作对打官司，就"贏得了农民的友誼"。

她非常仇視党和行政部門的工作者，說："有这样一种人，光知道拿着笔签字，拿着圖章盖章，既不动腦筋，也不动手，天長日久，就可以忘掉了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員，而成了人民的老爷。"有一次文协召集人开会，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缺席，她責

問："官方来不来，官方不来能不能开会？"她污蔑我們的領导工作人員是一批高高在上的享有一切特权的人。她把沒有及时买到魯迅全集也归罪于她不是"首長"有一次她的"参考消息"漏訂了，她說："假使我是一个什么'長'，那么这位經手人恐怕是不敢把我漏掉的吧！""恐怕有了职位头衔，一切事情会方便容易得多。"好象我們的社会就是一个为特权者服务的社会。

她进一步污蔑我們的新社会是一个"欺詐、說謊、虛假"的世界。"这种欺詐……不仅侵入到工作中、人与人交往中，甚至侵入到日常生活中来了。"她說"經常受到欺詐和說謊，而且都是出之于領导者。"又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玩弄信任是非常危险的事，結果只不过是欺人自欺。"（新民报未發表稿："更正确些，更眞实些……"）

她說："旧社会並不那样坏，新社会並不那样好""我身在祖国，心在巴黎"。她在八月三十日交代还說："我曾想，假使留在法国，学問上的成就会不会大些。"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她說："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八年后的今天——"才知道生活是艰难的……"而她这个一九二七年出国，一九三六年回国的"極單純的人"也只是"現在才眞正开始懂得一点人，懂得一点生活，懂得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匯报訪問記）

四、反右派斗爭中的态度

反右派斗爭开始后，她並不檢查自己的錯誤，拒絕写揭發右派分子宋云彬的文章，却在"东海"七月号上發表了不到六百字的短文："工人阶級領导地位不許动搖"妄想蒙混一陣。党內一再召开会議进行教育，迫于形势，陈学昭逐出了一个"不甘心"的檢討。檢討中她再一次地抓住修改"土地"、"培养骙访"两个問題，向党进攻。並与郑伯永訂立攻守同盟，陈表示只談自己，不拉别人。在这期間曹湘渠曾兩次到陈学昭家里去过（陈、曹本人均交代）。陈学昭在党內外的会議上，正式檢討过五次，都沒有

認真交代自己的問題。开始时她还說："文艺界反右派斗爭大会上，揭露和批判了她的錯誤，使党被动了。說：是省委先按好了一个框子框住她。后来迫于形势，在文艺界第三次反右派斗爭大会上承認自己反党，承認与郑伯永、曹湘渠拉拉扯扯搞反党活动。可是到党內会議上又立刻推翻了。跪在群众大会上說为了党的利益，二百斤的担子她宁願多挑一百二十斤，但她事实上沒有反党。在以后几次交代中，都沒有好好交代自己什么問題，把許多事情都推給别人，說是别人告訴她的，别人要她这样做。

在揭發别人問題上也是如此。人不揭她，她不揭人，人若揭她五分，她必揭人五分。沈静方最早在党的会議上揭發她的問題，她就在几次会議上揭沈静方，对曹湘渠則說沒有什么可揭的，曹为人厚道。等曹揭了她一些問題后，她又立刻以牙还牙揭了曹一些問題。

經过四个半天的辯論大会，陈学昭才算初步低头認罪，承認自己有严重的反党言行，承認自己是污蔑省委、污蔑新社会的右派分子，表示願意徹底交代，並痛哭过几次，要求下乡改造自己，态度比較老实。

五、处理意見：开除党籍。並建議除保留浙江文联执行委員以外，撤銷其他一切职位。到农村劳动，生活自給。

中共浙江省文化局支部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陈守川党籍的意見

一九五八年二月

陈守川，男，三十六岁，福建福州人，家庭出身資本家，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七年入伍，一九四三年入党，历任記者、文

工团長、宣教科長、省文化处長、省文化局办公室副主任、副局長、党組委員。

（一）陈守川的反党言行

一、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积極的执行資产阶級的文艺路綫。

和黃源一起制造汚蔑省委的"獅子龙灯事件"。当省委对民間歌舞团在农村巡迴演出中脫离政治的傾向提出批評时，陈守川为了迎合黃源的反党情緒，积極向黃源献策，陰險地要黃源解散省民間歌舞团，以对抗省委的批評。后来，陈守川經常抓住"獅子龙灯事件"，歪曲事实，百般攻击省委，企圖挑起不明眞相的人对省委的不滿。例如，去年春季陈守川在省委哲学班学習时，經常拿"獅子龙灯事件"为例汚蔑省委是粗暴、不懂文艺也不懂得什么叫为政治服务，是十足的教条主义。后来，陈守川与黃源、郑伯永等人把这件事情誣告到中央去。陈守川还無中生有的說："中宣部周揚同志要在八大会上指名批評浙江省委。"去年五、六月間，文匯报發表了"神龙見首不見尾"的反动文章，借"獅子龙灯事件"对省委和省委負責同志进行了惡毒的汚蔑。陈守川看了这篇文章，幸災乐禍地說："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实事求是，不戴帽子，可惜有些事实还沒有写进去，还不够有力。"从这件事情上充分暴露了陈守川反对省委对文艺工作的領导、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針的丑惡面目。

陈守川对社会主义文化事業，一向採取粗暴蛮横的态度。他对新的东西非常厭惡。去年省文化局举行全省第一屆民間音乐舞蹈会演，挑选了一批优秀节目，准备参加全国会演；其中有一个影射反特斗爭的节目"貝壳舞"是会演中得到一等獎的优秀节目，但陈守川和黃源对这个节目却表示不滿，于是他們就不顧党組决定，給这个节目加上"机械配合政治任务"的罪名，擅自刪掉了。陈守川对待傳統的艺术也抱着虛無主义的态度，他經常用

"公式化""概念化""形式主义"等罪名輕易地否定一些不該否定的剧目。五五年五六年他在浙江越剧团否定了十七个剧目。

陈守川把艺术事業看作商品买卖，看作个人沽名圖利的工具，並到处散布他的这种反动观点。他曾公开对剧团的人員說："你們剧团有什么問題？如果你們現在有一出好戏，叫你們上北京、出国，观众拥护，鈔票多，那什么問題都解决了。"在布置剧团企業化的工作时，他又大肆宣揚"鈔票主义"，他說"鈔票是可以刺激艺术提高的，苏联就是以盧布来刺激艺术的提高的""艺术的好坏标准，就看鈔票賺得是多是少。"陈守川还向青年灌輸腐朽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他强調"个人奋斗"，要青年当"家"，不要当"官"。他說："青年演員要出名，只要演好一出戏就行了。"同时他污蔑搞行政工作的幹部是"咀騙子"，搞政治工作的是"卖狗皮膏药"。陈守川就是这样腐蝕艺术团体和青年艺术工作者，企圖把他們引到脫离党的領导，脫离社会主义方向，走上追求名利的資产阶級道路上去。

二、污蔑攻击省委对整風运动的領导

在大鳴大放期間，陈守川散布流言蜚語。在省文化局党組討論貫徹省委整風指示的时候，他公开地攻击省委，反对文化局整風，他說："我对整風是六个字：有顧虑，無信心。理由是：省委沒有执行中央自上而下、內外夾攻的指示，現在是攔腰砍，省委自己不檢查，要我們檢查，我就是沒有看到省委的态度。"

三、分裂党的陰謀活动

陈守川抓住一切机会向党进攻，搞垮省委对文艺事業的領导。在他的野心不能实現时，他就到处散布"在浙江办事很难，省委太粗暴，經常挨批評，受不了。"因此，到中央去活动，打算离开浙江。之后，陈守川又与郑伯永商量，打算以"退一步，进二步"的办法，陈守川准备退出文化局，到省委宣傳部当文艺处長，把王顧明搞掉时，再回来当局長。一九五五年初，黃源来到浙江后，由于臭味相投，陈守川在黃源身上找到了支持，他的

反党活动也就更加明目張胆了。陈守川与黃源經常勾勾搭搭，在文艺界党員中制造不和，从各方面破坏党的威信；並在文化局內部，企圖从組織上来分裂文化局党組織和整个文化工作。他起草文化局行政編制的时候，提出要搞兩个局——文化局、艺术局，自己准备当艺术局長，企圖独霸浙江的艺术事業，把浙江的艺术事業帶到資产阶級的泥坑里去。陈守川提出：“要縮小文化局党組”。就是企圖把一些坚持党的原則的同志排挤出去；未得成功，他又提出要扩大党組，想把陈西斌这一伙与他臭味相投的人拉到党組里来，以扩大他的反党势力，从而达到他們篡夺党在文化局的領导权的目的。

（二）錯誤根源

陈守川所以如此猖狂的向党进攻、仇恨党不是偶然的，是有他的社会和历史根源的。

陈守川出身于資产阶級家庭，長期受着資产阶級教育，入党后，未从根本立場上改造自己，到現在仍然是一个原封未动仍坚持資产阶級的反动立場观点的資产阶級知識分子，並企圖篡夺党的領导，以資产阶級面貌改造党的事業。

陈守川非常狂妄自大，态度蛮橫粗暴，热衷地位名誉，一向抱怨党对他不信任不重用。当三反时因陈守川一貫对抗領导，貪污腐化，因而受到了行政上撤职，党內“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这本来是罪該应得，可是他不但不很好接受教育，却認为对他是当头一棒，有意打击，則怀恨在心，与党結下了私仇，五六年曾企圖推翻組織上对他錯誤的結論。三反后，成立了省文化局他任办公室副主任，当李微冬調走时，省委派黃一宾、王顧明二同志担任正副局長，陈守川因未当上局長，就汚蔑省委派王顧明来是“监視”他，他对王顧明採取不合作态度，經常进行打击，与党已經完全处于对立地位。

（三）本人对錯誤态度

开始态度不好，对錯誤採取不在乎和包下来混过关去的态度，后經过群众多次揭發和批判和經过对黃源的斗爭，有轉变，承認自己罪行，对錯誤有一定認識，但对要求改造上表現仍不迫切，仍有些無所謂态度。

（四）結　論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由于陈守川对党有严重不满和对立情緒，所以在右派向党进攻，烏云乱翻的时候，就很自然的支持右派，和黃源一起制造獅子龙灯事件，借以大肆攻击党的領导，企圖夺取文艺界的領导权，篡改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充分暴露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成为右派分子在党內的代言人，墮落成为一个党內的右派分子。

（五）处理意見

根据以上錯誤事实和結論，支部决定开除右派分子陈守川党籍，並建議撤銷其一切职务。因身体关系，無条件到农村劳动，可另行分配較低的工作。

中共福建省委整風学習班第三支部关于地方主义反党分子林汝楠的政治結論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

林汝楠，男，四十四岁，福建莆田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九年入党，一九四三年入伍。入伍后曾任中共

閩南特委委員兼研究部副部長，中共閩中地委副書記。解放后，担任晋江地委委員兼專署副專員，永安地委委員兼專員，省統計局局長。現任教育厅厅長、党組書記。

林汝楠是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知識分子，但長期以来，由于未能很好地接受党的教育、改造，思想上仍然存在严重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平时善于伪裝，迎上拉下，处处討好，騙取党和同志的信任。

解放会师后，林对党就一直存有戒心。認为党不信任游击幹部，不信任自己。清算曾鏡冰錯誤后，林覚得"倒霉了"！"吃亏了"！一九五六年曾問題結論后，又怀疑中央和省委对曾的审查是否过严？当黄国璋被撤銷省委委員时，林認为黄是"有功受罰"。五六年选省委时，林思想有活动，想当省委委員，但覚得历史尚未結論，因此，对党更加心怀不滿。甚至产生"出仕"思想，"看破紅塵"、"研究历史，与死人打交道"。这些幻想破灭后，又以响应下放来作为"將来进身之阶。"五七年利用党整風的机会，以老区問題为幌子，与黄国璋結成反党联盟，与党內外右派一道向党發起惡毒的进攻。这时，林的个人政治野心象火山一样爆發了！伪裝的面目也暴露了！至此，林汝楠墮落成为地方主义反党分子。

林汝楠的主要反党事实：

一、在老区問題的反党事实。林汝楠否認党能代表老区人民的利益，破坏党在老区群众中的威信。誣蔑省委老区工作有路綫錯誤，否定党对老区的正确領导。企圖保持閩中"独立王国"。代表这种反党立場的是黄国璋向中央控告省委的信。黄写这封信，交林看，林提过意見表示同意，並主动地到处替黄吹嘘。黄的这封信的內容，实际上是黄、林过去經常凑合在一起交談攻击省委，攻击南下幹部的言論的結果。这封信是他們結成反党联盟的政治、思想基础，是公开向党进攻的信号，亦是反党活动的綱領。林为了証实反党綱領的"正确"，积極地按照黄的意圖去蒐

集具体材料，作为对反党綱領的补充。后来，林不仅將所蒐集到的大量材料提供給黄国璋，而且在黄的慫恿下，于五七年四月二日在省委召开的地、市委書記会議上發言，惡毒地攻击仙游县委。

在老区座談会上，利用合法的地位，进行非組織活动；利用党整風的机会，向党發动猖狂的进攻。把对党不滿和意見最多的人都拉来参加会議，在会上大肆攻击、誣蔑各級党委。林在会議期間的兩次發言，也充滿着夸張、誣蔑和惡意攻击。甚至根据个別的事实，誣蔑省委在老区工作上有路綫錯誤，企圖使其反党綱領合法化。会議期間，林等进行了頻繁的非組織活动，以实現"統一布置，个別交代。"据林自己的回忆，"召开会外会議五次，与林汝梁到黄国璋家二次，交际处一次，研究下放名單时碰头三次。"

座談会結束后，不但不認真貫徹叶書記的指示，相反，有意曲解叶書記的指示，販卖私貨。贊揚黄国璋的反党活动为："斗爭性强"、"战略上是对的，策略上不对！"还說："黄国璋办了兩件好事：一是向中央控告曾鏡冰；二是向中央控告了省委。"林到了仙游后，不但未去解决老区問題，相反，坚持地方主义立場，支持了反革命分子刘佐周所搞起的"小匈牙利"事件。林利用个別錯案，尽量扩大渲染，惡毒地攻击县委，丑化南下幹部；又把因怀疑存槍不交被我区幹队打伤的蕭鐘鏜伤体拍照下来，准备与莆田县委打官司。实际上就是要煽动本地幹部对县委不滿，挑撥党和老区群众的关系，树立个人的威信。

座談会前后，林散布了許多反党謬論："忘本論"、"还債論"、"紅旗不倒論"、"解鈴还須系鈴人"、"官情似紙薄"、"董景起迫死林步云，县委有意包庇董景起"。甚至把反革命刘佐周在仙游搞起的"小匈牙利"事件，也說成是"江書記在八大的發言和福安处理老区問題在报上發表所引起的。"这些謬論就是向党进攻的炮彈。通过散布反党毒素，美化自己，丑化党

委和南下幹部，挑撥党和老区人民的关系，不承認党能代表老区人民利益。把党的老区变成个人的私产。

在老区問題上的反党罪責，黄国璋、林汝楠应負主要的責任。

二、在組織上的反党事实。林汝楠是集中力量在幹部問題上向党进攻的。他誣蔑省委和各級党委有"宗派主义"。認为："伍書記不关心、不承認閩中有老区。""朝中無人不好办事"、"省委組織部沒有一个本地幹部当处長"、"省委对幹部的看法与我們不一样"、"用人如积薪，后来居上"、"处境困难"、"南下幹部有宗派主义，把本地幹部一脚踢开。""党是合股公司"。林利用这些謬論来煽动本地幹部对党不滿，成为他們向党进攻的工具，以实現个人政治野心。

利用、歪曲幹部地方化的方針，以合法的形式进行非法的"大換班"。地方主义者在幹部問題上的"大換班"是来由已久了！經过老区会議的非組織活动，暗地研究，"大換班"就考虑得更加細致、全面。他們共同确定："抓重点县，照顧一般"的下放方案。林共拟出下放幹部四十五人，分别掌管十一个县。林确定到莆田，除自己任县書外，从县里的县長，县委几个部長，到重点区書、区長、乡支書等都安插了心腹。这种大換班的实質，就是从組織上排斥南下幹部，打击異己。达到爭地位、爭权利的卑鄙目的。在这种地方主义思想指导下，林認为"凡是老关系、老部下都应当作宝貝，多多益善。"因此，不顧党的幹部政策，为不純分子傅元祥、陈显植叫屈，提議給傅提职提級，給陈安插工作和恢复党籍。並建議讓反革命刘佐周回仙游担任副县長，要仙游县委收回不純幹部等。这种作法，就使不純分子在"本地幹部"的招牌下，混进了革命陣营。

在組織上的反党罪責，林汝楠和黄国璋应負主要責任。

三、在大放大鳴和反右派期間的反党事实。林在这个期間，已站在与党相对立的立場，与右派分子一道向党發起进攻。当林

还不了解党的意圖时，是同情、贊揚、支持右派黃震、严叔夏、郑書祥向党进攻。右派黃震的“十二个太和三个偏”，是对党的極端仇視和惡毒誣蔑，而林則贊揚“黃震講得好”。右派郑書祥誣蔑学校党員幹部“既不象曹操，也不象刘备”。林則在郑的稿旁写了“楚霸王”三个字。后来，在莆田一次会議上，林公开提出了我校的党員幹部“既不能作曹操，又不能当刘备，只能做楚霸王。”这一說法，与右派郑書祥不但一致，而且有了發展。在郑書祥苦于沒有材料向党进攻之际，林又責令机要秘書供給郑書祥所需要的党內外材料。这样做，实际上是为虎作倀，支持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了解了党的意圖时，則阻碍放鳴，如不讓林汝梁、沈祖澄在省人代会放毒；在莆田文教界沒有积極地站出来点火；右派張永年企圖点火和莆田县人委兩个幹部放出了反南下幹部的謬論，林也加以阻止和批評。林認为，这样可以掩护一批本地幹部和老同事老关系中的牛鬼蛇神。实际上是起了灭火作用。斗爭右派时，林抗拒上級指示，有意阻碍斗爭的开展。在大敌当前，不挺身而出，張桂如同志，特別是省委伍書記都亲自动員和指示林出面講話或写文章駁斥右派，但林故意不写。七月上旬，林从莆田到福州，叶書記向他說明了党的策略，並指示他留在福州参加反右派斗爭，他却私自逃回莆田。临走前正値教育厅斗爭右派郑書祥，林却躲到省妇联去聊天。到了晋江后，仍然堅持地方主义立場，主張“反南下不等于反党，以及反党沒有反社会主义的不是右派，可以当作內部問題处理”。認为这样可以保护大批有反南下的本地幹部过关。划右派时，包庇了右派林士輯、蝢汝楫、郑書祥。对林逐錦等六人被划为右派，林开始思想也是不通的。

对右派分子和地方主义者在晋江地区所搞起的反南下幹部風潮，林採取了幸災乐禍的态度。甚至向晋江地方主义反党头子許集美說：“这里放的材料还沒有老区会議那样兇！”实际上，是要許把反南下幹部的火再燒大一些，以便自己得到更多的本地幹

部的拥护，然后出面收拾残局，提高个人的威信，打击和排斥南
下幹部，否定党的領导。在仙游則支持了反革命刘佐周所搞起的
“小匈牙利”事件。之后，又多方地包庇刘佐周。林認为：“刘
佐周对党不满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刘不是反革命問題，刘
行动是反党，但他还是要社会主义。”甚至向省委負責同志說，
“刘是思想品質問題，不是反革命問題。”

林汝楠在这一場激烈的尖銳的阶級斗爭中，完全丧失了一个
共产党員的立場，与右派站在一条战綫上向党进攻。

在放鳴和反右派期間的反党罪責，林本人应負全部的責任；
晉江反南下幹部風潮时，林应負直接支持地方主义反党头子許集
美的責任；仙游“小匈牙利”事件中，林也应負支持反革命刘佐
周的責任。

林汝楠所犯的錯誤是十分严重的，是有組織、有計划、有目
的的地方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錯誤。它在思想上是極端的資产
阶級个人主义；政治上是右傾机会主义；組織上是宗派主义和山
头主义；理論上是修正主义。而在反右派期間的錯誤，則是完全
丧失了共产党員的立場，与右派一道向党进攻的錯誤。

这些錯誤，已經影响了党和老区群众的关系；破坏了党的团
結和統一；打击了幹部积極性，毒害了本地幹部；削弱了党的战
斗力，阻碍了晉江地区反右派斗爭的順利开展，党的政治影响曾
一度遭受損害。亦給各項工作帶来了不可弥补的損失。

党代会初期，同志們揭發和批判了他的地方主义反党事实，
但他則坚決抵賴。經过四个多月的整風学習，总的說来，已低头
認罪，学習态度一般尚好。由于林的錯誤性質是十分严重的，給
党造成危害極大，实为党紀所不容。应划为地方主义反党分子。
一致意見开除林汝楠的党籍。並建議行政上予以撤职处分。

中共重庆日报支部关于开除党内右派分子賈唯英的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日

賈唯英，女，现年三十八岁，地主阶級家庭出身，学生成分。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入党，现任重庆日报副总編輯。

賈唯英入党后，原来的剝削阶級立場未根本轉变，存在着严重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对党怀着个人野心。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間，賈唯英曾包庇三个惡霸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亲兄弟，一九五四年九月西南局直屬党委对她严重丧失立場的錯誤給予当面警告处分；賈来重庆日报后党內又对她的上述錯誤进行过教育和批判。但，賈唯英对自己的錯誤並未徹底認識，对党的教育和帮助亦未認眞接受，反而对党心怀不滿。去年大鳴大放期間，賈唯英竟公开站出来反党，由一个資产阶級个人野心家走上反党的道路。

鳴放中，她的主要反党罪行如下：

一、借口"左叶事件"，採取欺騙手段召开記者座談会，攻击党的領导。报上發表"左叶事件"消息后，她立即在报社內部煽动說："这些事重庆也有呀，我們恐怕也要开个会来支援一下！"並指揮記者湊材料，写文章；接着她就盗用群众名义要求市委同意她开这个会。市委宣傳部並未同意。但她却欺騙其他編委說宣傳部同意了，擅自召开了座談会。她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議，並公开号召："有气出气，有話說話！"会議在她的引导下，新聞界一小撮右派分子無視党和政府一貫对新聞工作的关怀和帮助，夸大、歪曲和捏造大量事实，誣蔑我国新聞採訪"不

自由"，"一团糟"，特别是对党的新聞政策和国家保密制度进行了惡毒的攻击，要求取消党对新聞事業的領导。会后，她又把座談会中的右派言論加以夸大渲染地报道出来，並且指令編輯組將右派分子熊景平、李忠祿向党进行惡毒攻击的讕言全文發表，还要新华社記者向总社發消息、支持四川工人日报右派分子汪闊到市政协会去呼吁，还把座談会記录印發給全国新协、人民日报等單位，企圖扩大事态。賈唯英利用左叶事件召开重庆新聞記者座談会配合資产阶級右派向党进行全面的攻击，充当了向党进攻的急先鋒。

二、賈唯英利用其代行总編輯的合法职务，以报紙作为陣地，积極配合資产阶級右派向党进攻。在鳴放报道方針上，賈唯英違背中央和市委的指示，提出一个反动主張：即"揭盖子"、"四面开花"、以"造成声势"，企圖达到"向市委施加压力"的別有用心的目的。在去年五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連續签發了"只听雷声不見雨来，机关幹部要求創造鳴放条件"及"群众要求大鳴大放，厂矿領导按兵不动"兩則消息向机关、厂矿点火，有意打乱市委的鳴放步驟，將市委的軍，給右派分子全面向党进攻創設有利条件。与此同时，賈唯英还签發了許多支持与贊同右派言論的报道，如所謂声援"左叶事件"座談会的"箇中难处有誰知"，市委召开的"文化、艺术、新聞、出版界座談会报道等，都極尽誣蔑、夸大的能事，不只一处出現煽动性的描写，如"淚流满面，泣不成声"，"叙述悲慘遭遇"等等，助長了資产阶級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凶焰。賈唯英篡改了党报的政治方向，成为了資产阶級右派在党內的代理人。

三、長期以来，由于賈唯英怀着个人野心，对市委領导採取陽奉陰違和抗拒态度。她常把市委对报紙的具体領导和正确批評說成是"不放手，干涉过多"；甚至公开在群众中散播流言蜚語，破坏市委領导威信企圖煽惑群众离开市委領导，把重庆日报变成一个她为所欲为的"独立王国"。

贾唯英是党內右派分子，反党情节严重。为了純潔党的队伍，巩固党的組織，决定开除贾唯英的党籍。

中共吉林省监察委員会关于黃潁問題的結論和开除其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一）簡历：

黃潁，男，三十八岁，貴州省遵义县人，家庭出身工商業兼地主，本人成份学生，現有大学文化程度，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入党前后曾三次被捕，在延安时受过兩次审查，历任陝甘宁边区师范学校教員、东北日报記者、編輯、長春日报主編、社長，貴州省文教接管部学校教育处長、文委秘書長、教育厅副厅長、党組書記等职，一九五五年五月調到吉林省，任教育厅副厅長。

（二）主要錯誤事实：

一、利用职权，包庇安插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有严重政治历史問題的人。向反革命分子泄露党的机密，企圖把有政治問題的人，拉入党內。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五年黃潁在貴州省任文教接管部学校教育处長和教育厅副厅長期間，利用职权包庇和安置反革命分子、党的叛徒、坏分子和有严重政治历史問題的人共十余名，黃潁对这些人是忠人耿耿，竭尽心力，百般庇护，其中有：

1、党的叛徒、反革命分子夏思民，是国民党县党部科長、

監察委員、县参議員、自新小組長、中統党網調查通信員、三青团貴州支团宣傳委員会秘書、軍統貴陽站長陈世賢的秘書、伪中央日报主笔等职，夏思民出卖过地下党員，写过“为中共王朝算命”等反动文章，一九五五年肃反初期杀人后自杀。

一九五二年反革命分子、党的叛徒夏思民不願在新黔日报社工作，黃頴即把他介紹到貴陽女子中學任教員，並积極令学校为夏提薪，一九五三年省召开文代会时，本無夏的席位，黃頴亲自發給夏的列席証，令其参加会議，並允諾送到北京师大进修。当有人揭發夏思民是特务时，黄主动写信証明夏未参加过特务。一九五四年六月貴州省集訓反革命分子，黃頴把党对反革命分子处理措施的机密告知夏思民，夏又轉告反革命分子陈福桐。一九五四年公安部門对有政治問題的教員进行排队时，夏思民已列为專案，黃頴此时多次追問公安部門对夏的处理意見，並再三要求看夏的档案，当他看了夏的档案后，主动向公安机关写信証明：“夏过去虽叛过党，但不是特务”。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初，黃頴將公安部門注意夏思民的情况先后告訴了夏本人和夏的妻子罗正芳，因此，博得了反革命分子夏思民的欢心，夏曾說：“黃頴这兒孝敬的还周到”。

2、党的叛徒，反革命分子夏思民的妻子罗正芳。叛党后为敌人作特务工作，监視过进步学生，黃明知他們的反动历史，極力与夏思民和他的妻子罗正芳結为密友，爱上了罗正芳，並和她發生了性的关系，安置到运輸子弟小学和实验小学当校長，反革命分子夏思民抓住黃与其妻罗正芳發生性的关系的事实，向黃进行威胁：你不承認我即揭發你。黃則卑躬屈膝向夏作了当面和書面檢討，对夏採取了一系列的庇护行为，黃在調离貴州省时給罗写信，仍念念不忘，說什么“紙短意長”。

3、安插了中統特务陈世哲；反革命分子吳兴汗（伪遵义保安副司令、伪县長。一貫道首）；伪县長王克仁；反革命分子伍中台；党的叛徒罗朗、江承綱、賀平波、傅邦瑞；国民党員張仲

才；三青团骨幹馮殿文；吸毒分子王瑛；伪县長膺俊生妻子、伪貴州省妇女会發起人、竞选过伪国大代表、与中統特务关系非常密切的毛瑞霞及其女兒膺修宏等十余人（以上均为有据可查的）。

黄顥在認識毛瑞霞之后，毛在利用她的女兒，把"自已安置在一个可靠的地方"的意圖下，促使黄与自己的女兒膺修宏發生了性的关系，从此膺成了黄的"外室"，直到現在仍然保持关系，坚决要和膺結婚。黄顥利用职权將膺保送西南师范学校讀書。一九五六年黄把一厅級幹部犯錯誤的全部材料送給膺看。一九五二年貴陽市公安局逮捕了毛瑞霞，釋放后黄顥亲自为毛打保条將毛介紹到貴陽市銀行工作，一九五二年三反时，毛向貪污分子家屬告密，通風报信被清洗后，黄又把她安置到省扫盲办公室工作，並評了較高的工薪，一九五三年黄又利用职权开証明介紹毛到北京找工作。

此外，黄顥在貴州省土改时公然包庇地主（他的岳父）积極主張將有严重政治历史問題的人拉入党內。一九五二年貴州省直屬机关建党时，黄極力主張並叫支部討論接收宋心誠、張仲才、叶孟麟等人入党，宋心誠后为反革命骨幹分子，已判刑十年，張仲才为極右分子，已劳动改造。叶孟麟为肃反对象。当时支部和总支不同意接收这些人入党，黄顥找总支張广华同志說："我就不明白你們为什么不吸收那些人入党"，並在新党員入党宣誓大会上汚蔑党有"关門主义""保守思想"，声称要"好好的批評一下"，之后，又向張仲才說"你的入党問題，我也曾提起过，但支部通不过"，又說"我本想提拔你的，但支部和人事科不同意"。

二、散布反党言論，攻击和汚蔑党的領导，在整風运动中煽風点火向党进攻：

1、黄顥对貴州省委調离他的工作和对他与反革命分子的关系进行审查不滿，並借此向党进行了惡毒的攻击和汚蔑。他曾質

問貴州省委的同志說“为什么調动他的工作”，認为对他工作的調动和对他的审査是“整他”。一九五七年初，匿名写信汚蔑和辱罵貴州省委的一些同志，汚蔑貴州省党的幹部政策說：“貴州省委有严重官僚主义，对地下党員長期压制，打击地下党人”等。一九五七年五月，黃潁又給中央监委写了一信，对貴州教育厅进行了攻击，把党組織对他的問題的审査，汚蔑为对他的“陷害”。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給貴州教育厅張仲才（国民党員、在肃反中被斗、現为極右分子）写信，进行拉攏、挑撥离間，煽風点火，謾罵党的領导。說“你在肃反初期被寃枉了，而且被逼供，这种荒謬愚蠢領导下的斗爭和逼供，加上那些威势逼人的勾当与不光明的誣陷，你自然是难以抵擋和辨别的。因你年輕，而又缺乏政治斗爭經驗，所以我能够諒解你，不要有什么顧虑，告訴他們，我在了解这个情况”。駡領导肃反的同志为“那些家伙”。由于黃潁对張仲才的点火，張在反右派斗爭中更猖狂的向党进攻。又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到五月先后給貴州教育厅叶孟麟（肃反中被审査）写去兩封信，挑撥关系，攻击教育厅負責幹部，說“教育厅有些同志看問題狹隘，政治思想水平不高”。一九五三年提出叶孟麟公民权，有些人不同意，黃罵这些人为政治上的“銹屑”，並为叶出主意說“对肃反結論要亲自看看，不要顧虑，不吃一塹，不長一智”。一九五七年七月黃潁給吉林省委文教部写信，把貴州党組織对他与唐修宏的关系的审査說成是“歇斯的里”态度極不老实。

2、黃潁的反党言行是一貫的，早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时，就說一九四〇年中央組織部对他历史問題的审査是对他的“虐待”，把分配他到边区师范当教員說成是“处罰”。在边师工作时曾写过数篇反党文章。將党的領导比作“默汗墨得”說“默汗墨得，左手执笔，右手执劍，强迫人信仰他……”駡組織观念强，服从組織好的同志为“革命的奴才”，說“革命的奴才往往是領导者的精心傑作”。当党向他这种反动思想进行斗爭时，不但不

承認錯誤，反而蛮横抵賴，曾兩次提出退党。他認为"边师党是整个党的縮影"。他在貴州工作时，認为貴州教育工作都是他做的，貴州党內他是第一个懂教育的人。黄主張学校不要党的領导，在貴州全省教育行政会議上說：要給各地的教育科長"一把上方宝劍"不讓党干涉学校工作。一九五五年黃穎到吉林后，在全省文教会上表示贊成朝鮮族学生有兩个祖国。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在"吉林教育"刊物上写的"努力建設中学师資供应基地"一文中把教师描繪的如何崇高可貴，如說"是誰把我們引向正确的生活的道路上去的？是我們的教师……"但只字未提党的領导。一九五七年黃穎以吉林师專校長的名义写了一篇"加强高等学校党委工作"的論文，强調了校長負責制，他說"党委的决議只能作为个人意見或建議，向学校提出，必須由校务会議通过校長批准后才能执行"。

三、欺騙組織，拒絕教育，态度蛮横，以自杀来威胁党。

黃穎对党是一貫不忠誠的，他的心不是和党長在一起的。在延安审查以前，他隐瞒了一九三五年参加稅警团炮兵訓練班的历史和其父亲黃汝言当联保主任的反动职务。在一九五六年写的自傳中，隐瞒了他在延安审查結論中所保留的問題，反而自吹結論無問題。長期的对党隐瞞了他的腐化墮落行为。当他看到貴州省党的組織对他与反革命分子夏思民、叛徒罗正芳关系的調查报告后，对貴州省委採取仇視态度，認为这个报告是"捏造"，暗中大肆攻击貴州省党的組織。当其攻击貴州省委的信被揭發后，对其爱人伍良素極端仇視，进行毒打，並声称"我这个右派專打你这个左派，打你这个向党报功的党員，貴州省吳实想掛勳章沒有掛上，你要帶勳章啦"。一九五八年三月一日教育厅召开党員大会对他进行批判时，态度十分蛮横，拒不交代，称同志們对他的質問是"訛詐"，会后要流氓吃安眠葯自杀（未死）来对抗党的組織，並提出兩条要求：一不开大会批判他，二不在吉林工作。並提出退职，組織不批准就不辞而别。

（三）結 論

根据上述主要事实，說明黃頴是一个混入党內的阶級異己分子，是敌人在我們党內的代理人，他的这种一貫的站在反动立場来反对党，包庇反革命分子是毫不奇怪的，因此，黃頴問題的性質是混入党內的阶級異己分子，在反右派斗爭中煽風点火向党进攻，态度蛮横，拒絕教育，是一个毫無改悔的極右分子。决定清除出党。建議撤銷行政上一切职务，以右派分子論处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張宗麟的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五日

右派分子張宗麟原系本校普通班第8支部学員。在本校反右派斗爭中，第8支部的同志們揭發了張宗麟的很多極为严重的錯誤，經过支部大会的批判和全校学員的批判、討論，業已徹底揭露張宗麟的右派面目。第8支部根据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和張宗麟的錯誤性質，已于支部大会上通过决定將他划为右派分子並开除出党。党委会經过严肃慎重的研究后，同意第8支部的决定。这一决定已报請中央审批，中央征求了高教部党委的意見，得到了高教部党委的贊同，最后中央也已批准这一决定。

附：中共中央高級党校普通班第八支部
关于右派分子張宗麟的政治結論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張宗麟，男，五十九岁，浙江紹兴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大学畢業后，曾任中学校長、大学教授等工作。一九四二年到解放区，先后任延安大学教育系系主任，北方大学文学院院長，教育部高教司、高教部計划財务司副司長等职务。来校前任高教部計划司司長。張宗麟一九二七年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不久，因“四·一二”事变脫党。一九四六年五月在延安重新入党。

（一）張宗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事实

1、汚蔑党中央、毛主席，攻击斯大林，贊揚資产阶級民主，詆毀社会主义民主。

他汚蔑党中央說：“整風老是整下边，老是整紀律性，既提倡独立思考，又动不动整紀律性，这不是自相矛盾嗎？”他怀疑“我們党是否也会变成斯大林晚年的联共党？”

他汚蔑毛主席写的沁园春（詠雪）和贈柳亞子的詩“有帝王气”。

他汚蔑我們党对毛主席有个人崇拜。他說：“一九五五年毛主席批判农業合作化保守了，象小脚女人走路，大家便都引用起来，說一切都保守了。高等学校招生計划，比一九五五年倍数的增加，还說保守了，結果去年学生确实招多了。毛主席只憑各省的报告了解农村情况，並不比××更熟悉中国农村，去年合作化又出了許多問題，如散社退社等，那么为什么一九五五年党中央批評××到那样地步呢？”他認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个人崇拜的

結果。

他認为"毛主席如果長期地担任主席，就要犯斯大林一样的錯誤"。他認为毛主席应該学習华盛頓"功成退隐"。

他公开反对党中央对斯大林的評价，辱駡斯大林是"独裁""暴君""品質恶劣"，他把斯大林比作中国的明太祖。"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他認为"斯大林一系列的恐怖，是为了巩固个人的專断独裁"。

他宣揚資产阶級的民主、自由，污蔑苏联是一党專政，不民主、不自由。他說："华盛頓在美国宪法中規定总統連选只得連任一次，很民主。苏联和中国的宪法規定国家元首連选可以連任，不民主。中国人代会的代表名單是协商确定后交各地去投票选举，不民主。"他認为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錯誤就是因为終身担任国家元首，就是因为国家元首連选可以連任的制度不好。他主張中国宪法上也应該規定：主席連选只能連任一次，否則，毛主席就会犯錯誤，就会象斯大林一样变成"專制""独裁"的"暴君"。

2、污蔑党中央、国务院对幹部的使用，污蔑人民解放軍，敌视謾駡党的高級幹部

他污蔑国务院設十二个总理是为了安插党的高級幹部做高官。他說"要十二个总理幹嗎？当部長还不是一样嗎？还不是为了做高官。"他認为：一九五四年大区撤消后，有許多头头需要安插一个較高的位置，因此就增設了十二个总理和其他許多副职，以便借此緩和內部矛盾。

他污蔑我們党的高級幹部"进城以后开始腐化了"，他攻击党的高級幹部生活特殊化，他說："高工資""供給制残余"都是"剝削"劳动人民創造的价値，有些高級幹部在浪費劳动人民的血汗。他听說××部長住七十間房子，有三辆汽車（不是事实），曾經在星期六帶着男男女女到郊外打鳥，就破口大駡"男盗女娼"。

他污蔑人民解放軍說："不少高楼好房子都成了軍队的住宅和办公室，軍队和人民疏远了，生活开始腐化了"。他看到有一解放軍軍官买人参，就說："解放軍优良傳統消失了"，並很气愤地說："这样下去，人民就要革命，人民不革命，我也要革命"。

3、卑視工农幹部和女幹部，攻击人事部門

他認为轉業軍人、工农幹部特别是一些首長的爱人工作效率低，作不了什么工作，要从政府机关和高等学校里統統把他們精简下去。他污蔑我們有些机关簡直成了"娘娘庙"和"罗汉堂"。又說这些人是"不劳而获"是"剝削"劳动人民。他还恶毒地对人事部門进行攻击，說"做人事工作的缺少人情味"。

4、反对党对高等学校的領导，污蔑高等学校里的党員幹部

他不同意高等学校实行党委制。他認为：高等学校有兩个党員負責同志就闹不团結，实行党委制后就更要闹不团結了。他还認为高教部是直接領导校長的，中間夾上一层党委制是沒有必要的。他主張："在高等学校里实行校長制"，也就是"校長領导下的党組制"。他說："在这种制度下，党委只能起保証监督作用，党組的决定，校長同意就执行，不同意就不执行。"

他在延安时，就曾駡我們党对学校的領导为"党化教育"。他一直重業务，輕政治，鼓励子女"先專后紅"，不要多問政治。並說："范長江不懂科学，不能領导科学"，"錢俊瑞不懂高教，不能領导高教"。

5、煽風点火，企圖推翻党对陶行知提倡武訓精神的批判

他不同意一九五一年人民日报和周揚同志对于陶行知提倡武訓行乞兴学的批判。他在今年七月份"人民教育"上發表文章說："陶行知确实提倡过武訓行乞兴学，但应查清楚，他在怎样的时代，什么条件下，提倡行乞兴学。他兴学的內容如何？是为誰服务的？他教育青年和孩子走向何处去？他的工作对那时的革命是有利还是有害？"並威吓挑撥地說："这一棍子不但打死不

了陶行知的功績，也必然会引起很多人的不平”。

除以上五个方面的問題外，張宗麟还認为一九五一年教育部党委对他的处分，完全是錢俊瑞和郝人初对他的报复打击；我国目前的价格政策剪刀差太大，影响工农联盟；六八社論和周揚同志四月間对文匯报記者的談話有碍鳴放政策的执行。此外，还对他的兒子張闖洩露了党的秘密，散布了一些流言蜚語。

（二）張宗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張宗麟出身在地主家庭，受过資产阶級的高等教育，很長时期走着“教育救国”的第三条道路，进行資产阶級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在他的早年著作中，为地主阶級的土地所有权作辯护，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作辯护，認为农民向地主交租是合理的，認为我們“自己不振作”，帝国主义才来侵略。認为国民党的“党义教育是最切合兒童生活的”，認为中国当前（一九三四年）最大危机是“共产軍的东竄西出”和“有組織的农民暴动”，他积極献策組織“自衛团”为統治阶級剿灭共产軍、鎮压农民暴动效劳。

他到解放区来，企圖实行他的資产阶級改良主义的教育路綫，要把生活教育边区化，他对边区不实行生活教育的一套教育主張，对边区沒有救国会很不滿意；甚至他認为：“說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不可分，是不能理解和不可相信的”，企圖和共产党“分庭抗禮”。这是他今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級根源和历史根源。

張宗麟有極严重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和强烈的权位思想，入党以来，党虽然一直重用他，他却总是埋怨党对他“估計不足，尊重不够”；說什么“有职無权”“不被重用”，埋怨党“旣用人又防人”。在教育部任副司長时期，錢俊瑞同志兼司長、他便認为“是牽制他”。他“唯恐自己不抬高，唯恐别人不压低”。

他一直拒絕党的改造。当着党和同志們批評他的錯誤时，他不是虛心考慮別人的意見，积極改正自己的錯誤，而是对党和同志們吵鬧，甚至顚倒是非，倒打一耙，对党不滿，以至仇恨，謾駡。这是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

（三）張宗麟在反右派斗爭中的表現

在反右派斗爭中，張宗麟对自己的錯誤，开始时根本不承認，以后又避重就輕，企圖蒙混过关，只講空洞的原則，不講具体的思想活动。甚至美化自己，为自己开脫。經过大家严格的揭發批判后，才逐漸有所进步，在最后一次支部大会上，基本上承認了錯誤，並声明低头認罪，願意徹底改造，重新做人。

（四）結論

根据以上情况說明張宗麟虽然入党已十多年，但他依然是一个未經改造的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由于在党內不可能实現他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目的，就一直对党不滿，在这次整風中，他竟利用資产阶級右派向党进攻的机会，惡毒地向党、向毛主席进行攻击，完全暴露了他的資产阶級右派面目，成为党內右派分子。

为了純潔党的队伍，巩固党的組織，支部全体同志一致決議：开除張宗麟的党籍。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支部大会通过）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馬列主义教研室支部大会关于开除極右分子王名衡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

王名衡，男，四十六岁，江西省南昌县人，家庭出身商業資产阶級兼地主，本人成分學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入党，現任本校語文教研室主任。

王名衡自入党以来，一貫拒絕思想改造，堅持反动立場，並有严重的胡風思想，与胡風有过密切的来往。因而在反胡風运动中，受到党的审查，党为了挽救他，曾給予他十分寬大的处理。王名衡不唯不感激党对他的挽救和教育，相反地，却更加仇恨党，並且頑固地坚持胡風反动思想。在一九五七年資产阶級右派向党进攻期間，他与右派相配合，向党中央遂出了反党的万言"控訴書"，进行翻案倒算，为胡風反动綱領作辯护，瘋狂地攻击党的文艺路綫，汚蔑党的肃反、审幹政策，使用了各种卑鄙恶毒的反党手法，誹謗党的領导和負責同志。並在語文教研室煽風点火，煽动被党审查过的、对党不滿的人，向党进攻。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玩弄兩面手法，挑撥离間，造謠中伤，他几乎仇恨党內的一切同志。

根据以上事实，根据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支部大会認为：王名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节極为恶劣，已成为一个党內的資产阶級極右分子，因此决定开除其党籍。

附：关于極右分子王名衡的政治結論

王名衡，男，现年四十六岁，江西省南昌县人。家庭出身商業資产阶級兼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入党。现任本校語文教研室主任。

王名衡的主要反动言行如下：

一、配合右派，發出反党"控訴書"，向党猖狂进攻

王名衡有严重而系統的胡風思想，和胡風关系極为密切。党在肃清胡風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对他进行了严肃的审查和批判，后来又根据中央最后一次規定的划分胡風分子的标准，以寬大处理的精神，給他作了不是胡風分子的結論。但他不仅毫無悔悟，反而对党更加仇恨，时刻圖謀向党反击、倒算。为了达到这一罪惡目的，早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社会右派蠢蠢欲动的时候，王名衡就利用本校进行工作总結的机会，煽动語文教研室在肃反中被审查过的人起来反对肃反。他假借党委名义，在全室会上宣布："对肃反、审幹、評級有意見的尽管提"，被审查过的人在他的煽动下，有的当場哭鬧，大罵負責审查的同志；有的惡意攻击肃反运动，頓使会場混乱，形成了一股有利于王名衡进行倒算的歪風邪气。

資产阶級右派进攻期間，王名衡認为时机已到，当即配合右派向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他和右派分子方其端陰謀策划，密室長談达十次以上，連夜起草了長达万余言的"控訴書"。在"控訴書"中，王名衡頑强地堅持了反动的胡風綱領，攻击党的文艺路綫，惡毒地污蔑党的組織和党的肃反审幹工作，並对党委負責同志和积極分子大肆攻击，極尽挑撥、誹謗、污蔑之能事。"控訴書"写成后，虽經党委多次耐心劝阻，他都置之不理，十分堅决地向中央發出了这枝毒箭，向党进行了他圖謀已久的倒算和反

击。在反党"控訴書"發出后，王名衡意犹未足，对我校右派未敢貼出大字报，明目張胆地掀起反党的"鳴放"高潮，造成更有利于他进攻倒算的声势，深以为憾。他不胜感慨地說："外面热热鬧鬧，我們这兒冷冷清清！"对極右分子黃一良想出反党大字报的鬧謀，他兴高采烈地对人宣揚，頗表兴奋。

二、坚持並宣揚胡風的反动綱領

王名衡一貫崇奉胡風的反动綱領，他宣揚胡風的"主观战斗精神"，主張"感性論"；反对作家要掌握馬列主义世界观，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認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是方法，不是观点"；他反对作家思想改造；反对作家和工农兵結合，为工农兵服务；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反对在文艺中运用民族形式。他对胡風崇拜得五体投地，称頌胡風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著作是为"人民文艺立下了功劳"，贊揚胡風的反党的"論现实主义的路"一书，"充滿着战斗的味道"。他曾与胡風長期書信往还，並曾数次密談，向胡風洩露党內机密；还出謀献策，要和胡風合办"一得力刊物"来宣揚他們共同的反动綱領，和党領导的文艺运动分庭抗礼。他和胡風共同污蔑毛主席的詩"沒有一首是掌握政策的"，共同諷刺挖苦党領导的文艺工作，誹謗革命作品是"虛伪的"。由此可見，党对他的审查和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但是，王名衡不仅毫無悔悟，却反而在反党控訴書中，按照他和方共端向党"交还五把刀子"的預謀無恥地通过狡辯和抵賴，逐条駁斥了党对他的反动胡風綱領的批判，要党向他承認錯誤，为他声明更正，否定他的"五把刀子的思想"。他在控訴書中，繼續坚持"按照指定的政治口号或具体政策的公式去进行創作，乃是促成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之一"的謬論，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还把他攻击党对文艺的領导的反动行为，說成仅仅是个"缺点"，实質上是以胡風綱領为武器，对党进行了惡毒的攻击，企圖借此达到复活胡風綱領並为之爭取公开合法的市場的目

的。

从組織上給他作了結論，一直到鳴放期間，他依然堅持並宣揚胡風的反动思想，攻击党的文艺路綫。他宣称“文艺工作者配合当时政治任务”赶任务“就是产生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根本原因”。他贊賞右派分子鍾惦棐否定新中国电影事業成就的反动文章——“电影的鑼鼓”；他为毒草“草木篇”及其作者的被批評打抱不平，进行辯解，他还污蔑我国出色地反映抗美援朝的偉大斗爭和志願軍英雄气魄的优秀影片“上甘嶺”是“公式化、概念化”。由此可見，他的反动的胡風思想不仅是十分系統完整的，而且他堅持这个反动思想也是極其强烈，極其頑固的。

三、攻击审幹、肃反运动，仇恨党的領导和党內同志，甚至敌視一切人

王名衡在控訴書中，傾瀉了他对审幹、肃反运动的極为强烈的仇恨，瘋狂地攻击了党对审幹、肃反的領导。他誣告党对他的审查“沒有根据”，是“帶有誣陷性質的犯法行为”，是出于楊校長对他的“成見和报复”，出于何家槐同志的“先發制人，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还对人污蔑說：对他的斗爭是何其芳同志早就有計划地整他而引起的。他誹謗校党委审查他是違反中央政策，蛮横地質問道：“同是一个标准，为什么有的情况就那样，而楊校長对我的处理就这样？”

早在結論作出后不久，他就惡毒地污蔑党的审幹和肃反运动是一部分人为了滿足个人的野心而对别人施行的打击和誣陷。他說：“党內有一部分人，平时党性很强，但还深藏着个人主义的东西，在紧要关头，拿出这些东西来整你一下你就受不了。”他說：这些人所有的“就是無限地增加个人地位、政治資本和要求党更多地对自己信任的慾望。”

王名衡怀着瘋狂的报复心理，仇恨一切，特别是仇恨党、仇恨党委負責同志及参与对他审查、批判的党內同志，对这些同志

猖狂地进行了攻击。他恨楊校長，他抱着“复仇的心理”要求中央对“楊校長……进行檢査处理”。他恨何其芳同志，何請他去吃飯，他不但不去，还惡狠狠地說：“讓他永远为自己所做的事痛苦吧。”他攻击党委委員伍輝文同志說：“毛主席在延安給自己（按：指王自己）摘了帽子，但伍輝文同志却說毛主席的結論不算。”他仇恨党委委員刘子正同志，有一次刘到他家去談他調动工作的問題，他把一杯水送到刘的面前惡毒地問：“敢喝嗎？你不会怀疑杯中放毒葯嗎？”他恨党委委員范若愚同志，罵范是“兩面派”，罵范“公开地向楊校長阿諛逢迎”。他痛恨何家槐同志，控告何家槐同志，要向何“报仇”。他敌視語文教研室秘書路林同志，罵路林是“校党委派来的情报員”。他恨食堂工作的同志，曾上書千言，罵食堂同志是“流氓”，“二流子”。他曾說他“现在連一个可以談話的人都沒有了。”

四、玩弄兩面手法，揑造事实，挑撥离間，进行反党活动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党为他做了結論之后，他一方面表示“心服口服”，另方面得寸进尺，向党提出無理要求，要党把他的不是胡風分子的結論，改为全部历史沒問題的結論，又一再要求看他的全部有关档案、全部檢举他的材料，以便向党摸底，当即遭到党的拒絕。党几次征求他对审査工作的意見，他裝着一付老实相說党委对他的审査是对的，但結論剛一到手，馬上原形畢露，誣告校党委和楊校長，向党进行反击、倒算。

王名衡明明知道楊校長与校党委、侯副校長对他的問題的意見是一致的（他上交反党“控訴書”之前，校党委已向他說清楚），但他却在“控訴書”中故意把楊、侯兩位校長的講話对立起来，把校党委第一書記楊献珍同志同党委对立起来进行挑撥离間，誣告“楊校長的个人意見和校党委的意見是抵觸的”，“楊校長的个人行动違反了党的組織紀律原則。”向楊校長和校

党委及参与审查他的同志进行报复。

他为了进行挑撥离間，不惜利用一切时机，制造任何口实，歪曲事实，顚倒黑白。关于他在"控訴書"中提到的所謂"金尙周事件"，本来当时支部書記范若愚同志、組織处長刘子正同志的意見同楊校長的意見是一致的，都認为王名衡的問題是原則問題，而王名衡却在"控訴書"中捏造种种情况，信口雌黄誹謗楊校長，借以达到他反党倒算的目的。王名衡平时还散布过許多不利于中苏团結的流言蜚語。

王名衡的反党罪行是有他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王名衡出身于商業資产阶級兼地主的剝削家庭，入党二十年来，他的反动阶級立場沒有改变，一貫認敌为友、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長时期来，王名衡与胡風的关系極为密切，早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时，党即提出要王名衡交代与胡風的关系，並严正地告訴过王名衡，胡風是个什么人，王却不听党的劝告，依然与胡風書信往还，还想把胡風拉进党来，全国解放后，他配合胡風的反党活动，在东北反对党的文艺路綫和党对文艺工作的領导。之后，当他与胡風在本溪密談时，就向胡彙报他的反党活动，並向胡洩露党的秘密；王、胡一起誹謗、汚蔑党的文艺路綫，諷刺、挖苦党領导的文艺工作。王名衡極力为胡風吹噓，向胡風献策，走胡風的路，成为胡風的忠実、热烈的追随者。

一九五五年，我校展开反胡風斗爭时，王名衡百般抵賴、詭辯，拒不交代他与胡風的关系和他的胡風思想，后来在鉄証面前，才勉强承認下来。一九五六年底，王名衡复职后，他的反动思想並未改造，依旧在語文教研室內販卖胡風思想，宣揚胡風綱領，攻击党的文艺政策，造謠誹謗苏联，伺机向党进攻。王名衡終于选擇了右派进攻期間这一"适当"时机，实現了他向党反击倒算的惡毒陰謀，从而也就亲手揭穿了他自己一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惡面目。

王名衡对自己罪行的态度也是十分惡劣的。反右派斗爭初

期，他在全校大会上"批判"極右分子黃一良为他"打抱不平"、帮他倒算的反动言論，妄想施展兩面慣伎搖身一变，充当反右派斗爭中的"积極分子"，来掩盖自己向党反击倒算的罪行；他在新聞班下班工作期間，表面上佯裝积極，口口声声頌揚校党委"英明偉大"，背地里却作賊心虛，惴惴不安，曾对方其端說"我反映了新聞班的意見，学校認为問題不大，現在又不叫我領导那个小組了，大概怕我發生什么問題吧。"后来又对方說："学校对我有点不放心。"反右派斗爭日趋尖銳，王名衡的情緒却日見消沉，一度借口"养病"企圖逃避斗爭。党責令他交代問題时，他已感到"問題的性質严重"，"是政治問題，右派問題"。本来，組織上根据他的意見，已决定他去河南大学工作，在他写"控訴書"以后，組織上一再催促，他却坚决不走，並对右派分子方其端說："問題不弄清楚我是不走的。刘子正要我走，哪有那么容易！"一心要趁此时机报仇雪恨。及至反右派斗爭深入开展，他的問題也被揭露以后，他却不急于"弄清問題"，反而迫不及待地打电話問刘子正同志："我是否馬上可以走？"再度企圖逃过"关"去。在交代过程中，他自知已"被抓住了"，被迫承認了一些罪行；但在核对材料时，态度又很惡劣。經过几次反复批判斗爭，他才基本上低头認罪。

以上事实充分說明：王名衡長期以来，在共产党員和馬列主义外衣的掩护下，一貫坚持並积極鼓吹反动的胡風綱領，与党离心离德；右派进攻期間，他更积極向党进行反击倒算，極端惡毒地攻击党的文艺路綫，污蔑党的領导和审幹、肃反运动，力圖为自己的反动胡風思想謀取合法地位。並施行兩面手法，挑撥离間，造謠誹謗，反党活动極为坚决，情节極为惡劣，因此，他已完全墮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極右分子。校党委根据他的罪行，决定給予降职降級的处分，級別待遇降四級，由十級降为十四級。

中共地質部机关委員会
关于开除馬氷山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

一、簡　历：

馬氷山，男，三十九岁，广东省汕头人（其父母侨居柬埔寨王国）家庭出身华侨商業資本家，个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中学，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后，在冀鲁豫地区当記者，新聞組長，通訊科長，編輯主任。一九四九年南下至大别山任区委書記，县委宣傳部長，湖北省委研究室組長，广州市人民政府秘書处長、行政处長、办公厅副主任，教育局長等职。一九五四年調地質部教育局任第二副局長迄今。

在历史上由于对敌斗爭中右傾动搖和不满組織，煽动群众攻击領导曾受过兩次当众警告处分。

三反运动中，因变相貪污公款一百三十多万元（旧幣）；私自介紹馬氏家族十多人到我企業机关工作。問題較严重作过三次檢討，受到批評。

二、整風运动中的反动言行事实：

1、惡毒的攻击党的領导，与儲安平一唱一合向党展开猖狂的进攻。以"鑽探"的别名，發表了極端反动的"有無党天下"反动大字报，惡毒的汚蔑"党天下"是存在的，对上至党員部長下至党員科長进行了謾駡和攻击說："地質部部長名义上是党外人士、科学家李四光，而实际上是以共产党員何長工等副部長当

家作主，而何等既不懂技术又不鑽研業务怎能領导地質科学呢！”又进一步汚蔑攻击党員的局長、处長、科長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万金油幹部”。是"佔着厠所不拉屎”，"霸佔領导地位”等等。並公然汚蔑部党組的領导是"以党代政”，說"他們不懂業务而党又要他們来領导，把好事弄成坏事，在实际工作中以党代政的現象很严重，动不动就是党組如何如何，这不是党天下嗎？”。为了正定幹校事件，在司局鳴放会上說："要撤校長的职，就应首先撤你們部長的职”。並提議要非党副部長（民盟盟員）来領导幹部工作。在飯厅还散播說："可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部長。”等等極其惡毒的攻击。

2、煽風点火，企圖發动大民主搞垮党的領导。整風开始时，何副部長在中山公园作整風动員报告后，在回部的路上，馬即煽动右派分子于純仁說："这个場面很好！你們可以写詩、写小品文、画漫画。”回局后，于純仁写成書面的东西，中技处部分人欲將該文投报社，馬即慷慨激昂的說："好！我支持你們。”教育局右派分子于純仁、唐嗣陶提出"民意測驗”向党进攻时，馬氷山曾动員党員也来参加填表測驗。並說："不参加会脫离群众”。並在其"有無党天下”大字报的标題上提出"再来一次民意測驗”，企圖煽起大民主搞垮党的領导。

3、提出了"民主办学”、"文人治校”、"同仁治学”等反动主張。企圖以資本主义的文教政策来代替社会主义的文教政策。馬氷山在整風开始前，既不經局务会議研究，更不經部党組批准，擅自將"民主办学”作为方針列入了教育局一九五七年的任务中。並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份，当光明日报积極准备向党进攻之际，馬氷山又擅自將"民主办学”的反动主張对光明日报記者發表談話，企圖在光明日报登載，以便使其反党主張实現。

4、陰謀实現个人的政治野心，企圖在教育局建立独立王国。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既不經局务会議研究、更未經部党組批准，馬氷山在教育局所領导的中技校，实行了所謂"視导員分片

負責制的單綫領导”。並通知各校，凡有关問題直接請示分工的視导員进行解决，各視导員在局長的領导下可以直接指导各中技校的工作等陰謀活动。早在“八大”学習时，馬就曾提出“以革命的精神取銷处一級机構”。企圖以他为首从上到下抓住一些所謂积極分子，在教育局建立独立王国。馬，对身居副職甚为不滿，曾多次提意見，讓孙云鑄不再兼教育局長。当党組派袁牧华同志来局后馬又多方排挤，以圖独霸教育局。

5、惡毒的攻击选举制度是“形式主义”，是“共产党出主意，共产党作决定”，“所謂走群众路綫，不过是形式而已，是真主意、假商量”。

6、污蔑肃反运动，反对人民民主專政。鳴放一开始，馬和右派分子陈电如一唱一合的攻击肃反运动。陈电如發表了反动透頂的“沁园春”一詞。攻击肃反运动是“忍把嫌隙当血海仇”，是“党絲牽头，行监坐守”。惡毒的攻击党說：“定解裙帶、立平山丘”，是“驕矜从来不到头”。在这样惡毒进攻的面前，馬也和陈“沁园春”的詞一首，竭力安慰陈說：“愁無奈，問当年破揣，君思来由”。並进而攻击肃反运动为“漫天弥霧”。

7、严重的洩露党反右派斗爭的机密。反右派斗爭初期，在右派分子仍猖狂向党进攻之际，馬冰山不經領导小組批准，擅自將“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央文件）的基本內容和划分左中右的一些标准，在团支部大会上（有右派分子二人参加）作了傳达。給党造成無法弥补的損失。

8、在揭發批判过程中，馬冰山的态度是極端惡劣的。他發表了“有無党天下”的反动大字报后，当引起群众注意、开始批判时，馬即有意識引导群众批判其他反动言論，而避开批判“党天下”。並瞞上欺下嫁禍于人，找一党員副科長田余非同志作of罪羔羊，該陰謀被部領导發覺后，曾再三令其檢討，馬拒不交代。在批判的过程中頑强的狡辯是“工作方法上的錯誤”。始終堅持是为了“引毒草”。並要了許多花招，如裝病不参加会、不

上班、对記录本子进行加工等等。在与其对証事实时要皮气、摔本子，狡猾抵賴，毫無悔改之意，反而污蔑領导和群众"給他捏造事实，有意把他打成右派。"态度蛮横無理，拒不交代反党罪行。

馬冰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是偶然的，是有其阶級根源与历史根源的。馬出身于資产阶級家庭，參加革命以来資产阶級思想長期未受到改造，对党离心离德。（直到現在还与其資产阶級家庭保持經济上的联系）。所以在工作順利时即表現得驕傲自大，盛气凌人，自作主張，独断独行，以感情代替政策，爭名誉、鬧地位甚至發展到独立王国思想。在党的利益与其个人慾望發生矛盾时即对党不滿，对抗組織。在抗日战爭中曾因右傾动搖，对抗領导，受过兩次党內当众警告处分而沒有接受改造。馬冰山的資产阶級个人野心在整風运动之前就發展到登峰造極。故在整風运动开始时就完全暴露了他反动的阶級本質。

根据惡毒的攻击党的領导，反对無产阶級專政、攻击肃反运动，而成为党的敌人，墮落成为右派分子，而且态度翻复無常極为惡劣。为了严肃党紀、純潔党的队伍，經教育局支部大会討論通过，决定开除馬冰山的党籍。

中共高等教育部委員会
关于开除孙运仁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孙运仁（曾用名孙蘊），男，四十四岁，江苏省南匯县人，家庭出身小土地出租者，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八年二月入党。一九四一年因自由散漫，党的观念不强，被停止关系（地下未曾向本

入宣佈)。一九四七年因將孙的統战关系誤轉为党的关系而入党，一九五六年审幹时承認其为重新入党。在党內外曾先后担任过支部書記，市委（地下）統战部部長。华中局統战部秘書科長。解放后曾任中南区教育部高教处副处長、处長。中南高教局秘書主任等职。一九五四年調高等教育部任教学指导司副司長。

孙在一九三三年曾参加过国民党，稍后又参加了我地下党所組織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不久。該社被国民党破坏，孙亦被捕，后孙在向国民党写了悔过書后釋放。一九三八年孙曾筹办"青年报"，为迎合国民党，詆譭說"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与此同时孙还背着党积極支持别人企圖把救国会变成为第三种政治力量的政党。並曾参加过救国会上層人物召开的座談会。

从以上情况看来，孙运仁在思想上一貫是右傾的。到这次整風大鳴大放时，更从思想上的右傾發展到政治上的投降。和社会上的右派相呼应，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的攻击。他为"高等教育"撰写的題为"提高自覚、爭取主动——敬向高等教育領导同志們进一言"的評論，不仅集中和宣揚了右派分子攻击高等教育工作，否定解放后几年来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切成績，而且誣蔑高等事業的領导者走的不是"群众路綫而是党員路綫"。說"牆和溝形成主要是由党員同志們不自覚、甚至是自覚的宗派主义作風造成的"。孙运仁对右派分子的进攻称頌备至，說他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是"誠恳"而"正确"說他們的向党进攻是"恳切的要求莾攏党"。並以諷刺的口吻說"在这鳴放和批評声中，我們領导同志的心情，当然不会無动于衷的"，無耻地以"提高自覚爭取主动"的口号劝領导者向右派投降。这篇評論实际是孙运仁在高等教育方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綱領性的文件。

孙运仁並不是偶然写了这个評論，而他在日常也散布一些类似言論，如說"三錢（錢三强、錢学森、錢偉長）定天下"，"二十年党委制都不能在高等学校实行"等。

根据上述情况，孙运仁已完全墮落为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在

反右斗爭中，对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給了严正的揭發和批判，並做出了“右派分子孙运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結論”。为純潔党的队伍，巩固党的組織，增强党的战斗力，經党委討論决定，給予孙运仁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中共民族事务委員会机关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尹育然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五日

尹育然，男，四十岁，中共正式党員，四川省成都市人，家庭出身地主，个人成分学生，初中肄業，一九三八年一月参加革命，同年四月入党，中央民委文教司副司長，兼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副所長。

一、整風以前的主要表現：

历史上一貫右傾，非政治傾向很严重，有严重的个人主义，表現在对历次革命运动抱消極态度，如在中央民院党組会上檢討說：“历次运动覚得很沉重，本来是好事情，但常感到不愉快”。三反运动前拿了公家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利用职权变象貪污，开始不願檢討，后来檢討也不深刻，撤銷了他的节約檢查委員会委員的职务，並給予劝告处分，后因貪污时間是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前未以貪污論，取消了处分。在肅反运动中表現右傾，受到組織批評，並写了檢討。尹育然違犯組織決定，私自叫被停止預备党員資格的王玉华（女、其父被鎮压）抄写党中央对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政經济会議上的結論批示和周恩来同志結論全文，王玉华抄写之后便向別人講薄一波同志

所犯的錯誤，違犯了保密紀律，洩露了党的秘密。尹育然是民院党組負責人之一，行政上是副教务長，他是有妇之夫，又和王玉华的男女关系極不正常，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給予劝告处分。在中央民族学院平时工作中也曾說“我是管業务的，不管政治思想教育”“政治思想工作頂什么事，要作思想工作找别人去”“不懂得業务，共产党員也不中用啊！”平时不尊重領导，与党委鬧对立。每次运动受到批評和处分，运动結束后，总想翻案。

二、整風中的主要言行：

1.攻击党的肃反政策：尹育然在肃反运动的时候，因犯右傾錯誤，受到組織上的批評並作了檢討。他一直对組織上心怀不滿，借鳴放机会，在肃反問題上向党翻案叫冤。在几个同志中散布在肃反运动中組織上对他的批評和責令檢討是錯誤的，他“冤枉”了，並在有原来被确定为肃反对象的唐振宗参加的鳴放会議上公开提出：“肃反时我原来不同意把唐振宗的問題一下提到反革命（当时組織上只認为唐振宗有反革命嫌疑，应列为肃反对象，並未确定为反革命分子）問題上来，党組織批評我右傾，我認为是“冤枉”，要求組織上給摘掉“右傾帽子”。並重申他認为“复兴社不是特务組織的依据，責問党是否把他的檢查右傾的材料放在档案袋中做为一个历史問題？”尹育然火綫投降，不仅公开为自己叫喊冤枉，也为肃反对象唐振宗再次撑腰。

2.对統战部决定中南民族学院不迁广东，散布不滿情緒。說：“中南民院搬广东，民委党組和教育部都同意並作了决定，但統战部部务会議上有人不同意，就否定了这个决定”（中南民院搬广东問題統战部的否决，民委党組完全同意，並决定改正党組过去的决定。尹是知道这个过程的）。並說：“民委与統战部在工作上分不清”。

3.主張取消党的人事制度，平时散布說：“人事科、人事室应該取消，把幹部工作交給每个單位去掌握以便利使用幹部”。

在鳴放会議上大家对他提意見时，他把斗爭鋒芒轉向領导，想自己滑过去，並在会外向人說："民委整風方向不对头，別的單位給部長級提意見，民委先从司局長开刀"。

三、斗爭中的态度：

表示低头認罪。

四、处理意見：

开除党籍。建議撤銷民委文教司副司長兼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副所長的职务，由十級降至十三級，另分配在文教司作語文工作。

中共中国科学院綜合考察委員会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顧准党籍的报告

一九五八年二月四日

顧准、男、現年四十三岁，上海人，家庭出身資产阶級，本人成分职員，文化程度大学。

一九三四年参加工作，一九三五年入党，曾在上海立信会計师事务所工作，后任武裝自衛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职救党团書記，江苏省委职委書記，文委書記，江苏省江南东路特委宣傳部長，苏北淮海区財經处副处長，华东分局財委副部長，上海財政局長，稅务局長，中央建工部办公室主任，建工部洛陽建筑局副局長。現任中国科学院綜合考察委員会副主任兼經济研究所研究員。

历史上的主要問題：一九四零年任江南路特委宣傳部長兼澄

錫虞工委書記时，因不执行和歪曲党的政策，不尊重党的决議受撤职处分，一九五二年在上海市任財經委員会副主任兼税务局長时，由于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無組織，違反政府的方針政策，屡教不改受撤职处分，一九五四年在洛陽工程局任副局長时因积压建筑材料受警告处分。

主要錯誤言行:

（1）他誣蔑党和領导同志。說"历来都是几个聪明人加上一群王八蛋，抹杀了良心做人，領导說左就左，說右就右，毫無独立主見可言"。又說："党內常常弄不清是非，不公平不民主，老爷（指党的負責幹部）說話沒有錯"。並誣蔑党的政策說："共产党好比猴子种蘿卜，今天种明天拔"。

（2）誣蔑党領导历次政治运动有偏差。說："运动有偏差不是一般幹部掌握不好，而是高級領导的偏差"。对他在三反时的处分不滿，自称："下台幹部"，把党組織对他处分教育說成"自己是被蛇咬过的，見了繩子都害怕"，說調科学院工作是"进和尙庙来的，不打算做官了"。

（3）認为社会上右派分子的言論代表他的一部分意見，認为储海宗的言論是一針見血，說高級党校是老一套的斯大林主义，教条主义。在右派向党进攻时，他認为党無法办了，並說："现在即是大和尙（指毛主席）想出来認一下錯以平民憤也办不到了"。

（4）散布修正主义毒素。他說："修正馬克思主义与創造性运用馬克思主义並無差别"。並說："为什么中央可能有創造性，一般人就不能有呢？"

（5）大量散布反苏言論。說："苏中关系是父与子的关系，苏中貿易是不等价交换"。並利用职权对苏联同志採取敌对态度和行动。違背領导指示，支持中国工程师擅自以中方名义發表錯誤主張，反对苏方主張。当代表团內陈劍飞（黑龙江省副

省長）同志批判了这种錯誤行为时，顧說："陈沒有中国人的气味"。

对顧准的上述錯誤言行批判初期时，他的思想抵触很大，坚决不承認自己的資产阶級的反动立場，写檢討时採取了步步为防的态度。直至最后才逐步認識到自己是墮落到資产阶級右派分子的泥坑里，並表示願意悔改。

顧准墮落为右派分子並不是偶然的，他是旧职員出身。参加革命前懂得一点会計知識，但他自为是代着知識資本到党內来的，显然这种入党动机是不純的。自入党后他的極端狂妄的个人主义得不到發展时就对党不滿，与党离心离德，与党更加对立，歪曲和誣蔑党的政策，惡毒的攻击党进行反党活动。完全站在資产阶級右派分子的立場上。根据上述錯誤事实，支部决定党委同意开除顧准的党籍。

中共中央美术学院
美术史系、版画系、国画系联合支部关于开除江丰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

江丰，男，四十七岁，上海人，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职員。一九三二年入党，历任美术界重要領导职务，为党作了些工作，但青年时代所受流氓無产阶級思想影响及个人主义思想未經克服，随着工作的需要，职位的提高，滋長了居功自傲的思想，把自己置于党組織之上，不能接受党的批評与监督。

早在延安和华北联大时，江丰就曾为受党内历史审査及工作上的批評对党不滿，誰代表党工作，审查了他，批評了他，他就和誰对立，怀恨在心。解放以来，江丰在国画問題上与党的意見

不一致，作为一个共产党員，提出和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見是可以的，但必須同时認真执行党的决議和政策。可是江丰拒不执行国画政策，受到党的批評后，不知悔改，反而反目成仇，利用职权將美术学院变为自己的独立王国，与党对抗，他进一步歪曲和破坏党的国画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輕視和削弱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把美术学院变成为散布污蔑党的領导人和領导机关的言論，鼓吹大巳主，和無原則的“独立思考”的場所。江丰不向市委和文化部反映学校的眞实情况，把学校党总支放在个人之下，公开反对党委制，叫嚣文化部出錢，他个人包办学校，完全不要党来領导，使美术学院离开了無产阶級的文艺路綫，实际上走向資产阶級艺术道路。

江丰的胡作非为，严重地敗害了党的利益，不能不受到文化部、美协、周总理直到中央毛主席的进一步指責和批評，使他感到很大的压力，江丰仍然不作檢查，反而加紧煽动和勾結党內外对党不滿的分子，如肃反受审查、对党隐瞒历史的彦涵、杭州分院右派分子莫朴、金冶、金浪、朱金楼，东北美專的楊角、張曉非等，形成反党集团，共同策划对抗党的領导、监督和檢查，甚至党中央指令檢查他們的工作也公然拒絕。他認为党內不是說話的地方，党內不能解决他的問題。

斯大林問題和匈牙利事件后，国内外修正主义浪潮也助長了江丰的反党气焰，使他从文艺路綫上反党进一步發展到政治路綫上反党，进一步恣意攻击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污蔑我們的选举不民主、党內黑暗、肃反成績不是主要的、农民生活太苦、要起来吃大鍋飯等等。並四处招兵买馬，拉攏創作幹部，扩充反党实力，到反右斗爭之前，他的反党集团势力所及，除我院和附屬單位彫塑工厂、民族美术研究所、杭州分院外，还有北京幸寺胡同創作室，北京部队美术工作者，黑龙江文联，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等，江丰还勾結我院民盟右派分子王遜、李宗津一起反党。

去年五月党开始整風，江丰和一切右派分子一样，認为时机

已到，就向党大举进攻，他利用美院和辛寺胡同为主要据点，發动反党集团全力以赴，組織煽动校內外群众特別是利信知名美术家、民主人士和老党員、老幹部作自己的傳声筒，借大鳴大放机会向美协、文化部、中宣部領导猖狂进攻，污蔑这些部門工作沒有作好，把責任推給江丰，污蔑周揚、錢俊瑞、蔡若虹同志是宗派主义、專門整人的、打击陷害江丰，把党描写成漆黑一团。一手制造了"五月会議""向文化部示威"的小匈牙利事件。会后，江丰並把六万字的会議記录印發全国点火。另方面，还煽动华东分院鬧迁校，改組領导，鼓动請願鬧大民主，到处点火，其目的在于搞臭搞垮忠实执行党的政策的同志，把全国美术界变为江丰个人的天下。

与此同时，江丰还积極筹办自己的刊物，自己的画会，"学派"，畢業生校友联誼会等等，自成系統与党抗衡，以备独霸美术界不成，則率領自己的人馬分裂美术界。

除了自己搞反党集团，向党猖狂进攻外，江丰还积極支持龐薰琹反党集团、和丁、陈反党集团。

根据以上情况来看，在社会革命的关头，江丰已完全背叛了党的事業，成为資产阶級在党內得力的代理人，成为一个極端右派分子了。为了严肃党紀，純潔党的队伍，支部大会决議开除江丰出党。

中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版画系、国画系联合支部关于开除王曼碩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

王曼碩，男，五十二岁，家庭出身自由职業，本人成份职

員。

一九三八年到延安参加革命，一九三九年三月入党，曾任延安魯艺美术系系主任，东北文化局長等职，为党作了一些工作，但資产阶級个人主义並未得到很好的改造。一九五四年由东北調来我院任副院長，和民族美术研究所副所長，並担任美院党总支書記的重要职务，在和党內極右分子共同工作中，王曼碩起初还能看出江丰的某些錯誤，如江丰排斥国画家、輕視遺产、縱容王遜阻撓民族美术研究所工作的开展等等，但由于斗爭性差，害怕江丰的反击而採取調和妥协的态度。身为党总支書記，而对江丰的錯誤与缺点，不敢进行批評和监督，听其損害党的利益。

一九五六年四月文化部、美协党組扩大会議上，批評了江丰和美术学院虛無主义，不执行党的国画政策，其中也批評了王曼碩，王曼碩作为一个共产党員不是虛心地接受党的批評、檢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努力改正，反而以腐朽的資产阶級陰暗心理来理解党內的批評，他認为蔡若虹过去在延安时要他檢查工作就是整他，现在又批評他虛無主义，又是整他，把党內的原则斗爭歪曲为党內少数人整人、和私人打击。自此，王曼碩不但拒不接受党的正确批評，执行党的文艺政策，反而更进一步在工作上按照江丰反党主張行事，利用党組織对美院国画教授进行圍攻，給党带来極大的損失。

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期間，是江丰反党情緒十分露骨，反党活动日趋猖狂的一年，他把美术学院变成了个人的独立王国，与党对抗。王曼碩由于把个人得失，个人恩怨置于党的利益之上，包庇和縱容江丰，使党組織变成江丰反党的工具，当有些同志要求批評江丰，揭露江丰时，王曼碩替江丰掩蓋說："江丰这一年来有很大进步，优点多于缺点，江丰脾气不好。"等等为之开脫，並且从不向文化部、市委等上級組織彙报江丰的眞实情况，另外一方面，更和江丰一道編造並到处散布"文化部、美协、中宣部領导宗派主义，周揚、錢俊瑞、蔡若虹是一条綫，从

延安起就是党整人起家的，他們打击江丰等”反党言論，醞釀反党空气，成为江丰反党的舖路人和大帮手。更为惡劣的是作为一个老党員，党的总支書記，却不論在党內、党外到处散布对党的領导同志的人身攻击，並揚言“如果我是党代表，我就不选周揚、錢俊瑞当中央委員”。这种破坏党中央威信的反党言論是决不允許的。

整風期間，三反中被斗的人乘机污蔑过去运动沒有人性时，王曼碩也向幹部說：“是嘛，是不人道”，严重丧失了立場。江丰利用整風的机会陰謀策划組織了向文化部进攻的“五月会議”，在五月会議上王曼碩在二百余人的面前公开、直接地向党开火，他追溯到十五年前从历史上来“引經据典”歪曲事实、顛倒黑白，說江丰是真正的工人阶級思想作風，蔡若虹和他有本質上的不同，“党对江丰的批評是文化部、美协制造出来的，是宗派主义活动，这种宗派主义活动的总司令是錢俊瑞，参謀是蔡若虹。”並說“蔡若虹用十五年前整我的办法来整江丰。”等等，並丑化党組織和某些党的領导同志，严重地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造成党內外同志的思想混乱，博得了許多右派分子的同声喝采。

反右运动开始后，群众起来揭發批判右派分子黄警頑，他說：黄警頑是老糊塗，批判批判就行了。群众貼出大字报他說：“用照象机拍下来給文化部看看，免得說我們沒搞运动。”阻撓美术学院反右运动的开展，龐薰琴反党集团即將揭發，他还受江丰指使为龐奔走辯护，亲自到文化部找刘部長，說龐在美院时还算进步，建議“慎重”企圖推迟見报。

根据上述情况，王曼碩已沒有一点共产党員的气息，变成和資产阶級一道向党进攻的党內右派分子了，为了严肅党紀，純潔党組織，联合支部決議开除王曼碩党籍。

中共中央美术学院
美术史系
版画系
国画系 联合支部关于开除洪波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

一、简历：

洪波 男 三十二岁 天津市人

家庭成份 职員

个人成份 学生

一九四五年九月入党

一九四六年到解放区华大联大美术系学習，后即在該系担任助理員工作，解放后派来我院工作，先后任輔导科、教务处秘書和我院党总支副書記的职务。

二、主要反党言行：

1、洪波身为美院总支副書記，对上級党委隐瞞党內極右分子江丰的反党活动，並对其进行包庇，对江丰在美院的反党活动和思想錯誤，作为总支副書記的洪波，不但不堅持斗爭而且当党員向洪波反映江丰的意見时，洪波不但不把江丰的問題向上級党彙报，而且为江丰解釋辯护，当江丰反党最猖狂的时候，洪波在党內外散布"錢部長搞江丰是宗派打击，江丰受了委曲"等言論包庇江丰，洪波袒护江丰，不向上級党彙报，其反党活动的事实是很多的，如江丰在总支大会上歪曲傳达中央百花齐放的方針，以及江丰認为党不能領导学术討論等等。

2、洪波是五月会議的积極参加者和組織者，把学校党总支

变为江丰的反党工具。

①五月会議期間，洪波受江丰指使，召集党內外教授，陰謀策划五月会議。

②五月会議时洪波利用总支副書記职权。

（甲）組織煽动群众（其中有校內幹部，彫塑工厂、彫塑訓練班等）向党进攻。

（乙）布置人帶画去文化部示威。

（丙）会前和会上还促使群众集中攻击文化部領导。

③五月会議上以美院党总支副書記的身份歪曲事实，为江丰輕視民族遺产違反国画政策辯护。

④洪波指派右派分子張世春招待文滙报、光明日报記者，扩大江丰反党集团的影响，在全国范圍內把党搞臭。

⑤会后洪波領导整理会議記录，並和江丰共同拟定散發記录的名單，企圖把反党火焰燃燒到全国各地。

⑥洪波向江丰献策，准他亲自去杭州华东分院点火（未去成）。

3、阻撓反右斗爭的开展：

①他極力包庇右派分子龎薰琴

（甲）龎薰琴問題見报前，洪波向市委打电話，肯定龎搞錯了，說龎是思想問題等，企圖阻止龎的問題見报，並到处散布龎不是右派，洪波說："豁出党籍不要也不能这样搞下去。"

（乙）洪波还指使龎濤（龎薰琴女兒）写信給彭眞市長申訴龎搞錯了，信的內容和詞句都是洪波授意和修改的。

②阻撓美院反右斗爭：

反右开始以后，洪波对上級党委，和党員一再宣布美院沒有右派分子。

（甲）当黃警頑被揭發时，洪波还認为他不是右派。

（乙）洪波以为彫工厂"都是好同志"，当右派分子張德蒂已經公开叫囂向党进攻时，洪波仍認为她不是右派。

（丙）文化部要調实習同学回美院参加反右斗爭时，洪波也不同意。

4、勾結民盟右派分子共同反党：

整風运动以前，洪波与民盟之間就沒有任何阶級界限，把党內問題洩漏給民盟，並加以歪曲（如說江丰在×月会議受了委曲）曾向教員講过入党需先入盟等錯誤言論。整風开始时，洪波將党內有关整風形势的絕密文件拿給民盟右派李宗津看，与民盟右派串通一气，进行反党。

三、思想根源：

洪波从一个比較有革命热情的共产党員，墮落成为党內的右派分子，决不是偶然的。洪波在初参加革命时，有民主革命的要求，同时对自己的非無产阶級家庭出身及資产阶級教育所帶来的影响，倘有所警惕，願意按照党的要求来改造自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業奋斗。但入城以来，洪波滋長了政治上的自滿情緒，放松了自我改造的要求，个人主义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洪波的个人主义，主要表現在業务与政治的矛盾上，洪波原来是搞画的，于搞画更合乎自己的兴趣，更便于名利双收，而出了名政治待遇也高，洪波就不安心作行政工作和政治工作，按說他的主要業务工作是党書記，但他对党交給他的工作採取了極不負責的态度，最近兩年来，洪波虽然担任着我院党总支副書記的工作，但始終把这一重要工作看作是不得已的負担，因此消極应付，敷衍塞責，严重的脫离政治，連报紙也懶得看，逐漸喪失了革命意志，离开了党的立場，完全蛻化变質成为一个只顧个人利益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者了。

近一兩年来洪波不是絲毫沒有發現江丰的政治錯誤，也不是不知道党內外群众对江丰及江丰集团反党分子如彥涵等的許多不滿，但洪波不敢，也不願和江丰展开坚决的斗爭，因为那样作不但要得罪江丰，而且还必須化費很大的时間、精力。洪波为了个

人得失，苟且偷安，不惜压制党員群众的批評，欺蒙上級党，使我院党总支癱痪、瓦解，对江丰採取了可恥的妥协态度，並包庇江丰。五月会議期間，洪波完全背叛了党，投靠江丰，变成江丰反党集团的骨幹和組織者，这不过是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国內外的修正主义浪潮高漲和江丰反党集团似乎佔了优势——他的个人主义进一步發展和暴露而已。

洪波的严重个人主义，政治上蛻化变質不仅表現在和江丰的关系上，而且也表現在一系列日常政治工作中和对待运动的态度上。洪波以腐朽的資产阶級私人关系代替了严肃的政治原則，他把曾經是三青团骨幹分子的潘紹棠（党員，右派分子）安排到党总支执委会中去，在肃反問題上包庇其反革命弟弟的严重政治錯誤，縱容袒护党內外品質悪劣，墮落腐化分子（如顧群，党員、張世椿，党員、史軍，团員——現均为右派分子）在群众中造成極其悪劣的影响，而对政治上原則性比較强的同志則採取挑撥、中伤、排斥、打击的态度，即使沒有"五月会議"反党的情节，洪波也已与共产党員的称号远不相称了。

四、运动中的态度：

五七年底，江丰集团被揭發以后，經过群众的揭發与斗爭，洪波較早，較徹底的交待了他的反党言行，第一个脫离了江丰反党集团，並揭發了他所知道的有关这个集团的部分反党事实。

五、結論：

根据上述情况看来，洪波虽然在反右斗爭中坦白交代較徹底，較早的揭發了江丰集团的某些反党活动，斗爭后表現也較好，但情节並不輕微。为了严肃党紀，純潔党的队伍，联合支部决議开除洪波的党籍，並呈报上級党組織批准。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彭慧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党委扩大会議全体通过）

一、基本情况：

彭慧，女，五十岁，家庭出身城市小有产者，本人成份职員，共产党員，民盟盟員。曾任职务：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三級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員，"文艺学習"編委、民盟北京市妇女委員。

一九二六年入党，一九三四年其夫穆木天被捕，叛党自首，彭也在自首書上签字叛党，一九五〇年十一月重新入党。現为極右分子。

二、主要右派言行：

1.与其丈夫右派分子穆木天里应外合猖狂的向党进攻：与穆合謀抓住早已处理和解决了的党委某負責同志的私生活問題，煽动群众，供給右派社团子彈；揚言"在事实上我負法律責任"参与修改穆木天所写的反党文章"我的呼吁"，支持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在师大掀起向党进攻的狂潮。並与穆木天合謀召开"家庭审判会"打击曾向穆木天提过意見的共产党員。

2.几年以来，彭慧一貫和党鬧对立，把自己放在党之上，經常地攻击和誣蔑党的領导同志，說党員幹部为"党官"。整風期間她造謠說党內有宗派，"师大是湖北派当权"，並制造所謂"何譚宗派"，說發展党"是吸收一些听話的、看領导臉色行事

的人”，並到处散布謠言，說党委領导“癱瘓了”，誣蔑市委“必然‘先入为主’，只听师大党委片面的彙报”。

3. 支持“民主办校”說“作为一个党員，我也不同意党委制，党委都是毛孩子，党委不懂業务，連和老教授談話都不敢”，在与右派分子陶大鏞、鍾敬文、陈秋帆的“四人夜話”中，惡毒的攻击党委說“党委業务不强”，“更遺憾的是政治思想也不强”，“这些同志們正在扮演悲剧的角色”。

4. 洩露党內机密：彭在整風中將“拆墙留綫”的党內机密洩露給穆木天並在座談会上公然借此攻击党委。党內对其批評她又加以歪曲穆在群众中散布，煽动群众对党不滿，同时又造謠說“肅反时，楊敏如（群众）是因为我才沒有被斗”，挑撥党群关系。

被批判斗爭后，最初表示抗拒，抵賴說“杀了头也不承認”对支部、总支开除其出党的决定不服。要上訴中央。最近才承認是右派，表示低头，但檢討不好对有些事实仍想抵賴。

查彭慧，曾在內战时期对白色恐怖下自首脫党，又在革命胜利后隐瞞其叛党罪行，第二次混入党內。当右派分子利用整風时机向党进攻时，彭慧的右派面貌就徹底暴露。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党委扩大会議，出席該次会議的十五位党委委員一致通过將兩次混入党內的叛徒和阶級異己分子，右派彭慧清除出党。

中共北京市文联支部
开除右派分子張明权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

張明权：男、三十七岁、汉族、山东金乡县人，家庭出身：

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入伍、一九三八年十月入党、現任北京市文联創委会委員、党組組員、整風中表現極右。

一、簡历及主要問題：

曾任我軍文化教員、宣傳幹事、武工队的政治委員、宣傳科副科長、团政治主任、菏澤市民政科副科長、区長、文工团团長、平原省文联創作部長等职。

历史問題：

1、其弟：張聖时，托派，現在徒刑期滿。

2、一九五一年九月因丢失党內重要文件受当众警告，現已撤銷。

3、一九四二年整風时交代参加过托派，並一直到整風前还保持其組織关系，但后又否認了这一事实（自称因逼供信，才承認的）。关于此問題太行四分区党委会一九四五年八月所作結論称：該同志在山东联中讀書时（該校有托派組織，其弟系被托派拉去的，並給过張托派書籍），不自覚中在思想上受到托派的某些影响，但根据現有材料，並沒有参加托派組織。

4、土改中包庇地主家庭，並为地主出主意逃避农民斗爭，三查整党时，因不能割断与地主家庭联系，曾一度企圖叛党自杀。

5、在华北文联工作时期，与胡風分子盧甸、魯藜等人关系密切，盧甸很多反革命行动張都知道。張与阿隴也見过面。一九五二年文艺整風时，因替盧甸辯护，而被列为重点檢查。到北京后，又与徐放、牛汉認識，思想完全被胡風分子俘虜。肃反中虽进行了交代，但未从思想上解决問題。整風前在党組会上曾說：“我相信胡風的理是我錯了，但党的理論也沒有說服我。”（大意如此）

二、整風中主要右派言行：

1、張明权身为整風領导成員之一，在整風中却反对党的决議，和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猖狂进攻。

（1）在市委書記召开的会議上，提出取消党在基層組織的紀律，並举董存瑞为例。主張群众参加領导小組，进行民主选举。六月六日在文联支部会上反对市委关于領导小組暫不發言向群众解釋意見的指示。

（2）六月六日在支部会上几次号召"党員、团員要团結群众，党員在公开場合揭露党內三害就有团結群众的含义"，並提出："不能反对教条主义（指党的領导）就不能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企圖煽动全体党員叛党。

（3）他以領导身份进行非法活动，事先未向領导小組提出，事后並未彙报。到处点火，安插据点，如找过很多同志进行談話，讓蔡允笙彙报团內情况（据他八月十九日会上交代），叫邓友梅彙报編輯部情况等（据邓友梅会上揭發）。

（4）据大家揭發，六月五日他在編輯部（同时还有考誠、孙毓椿、林庆瀾等人）支持考誠、孙毓椿（均極右分子）共同提出成立有群众参加的整風研究小組，中午就拿着紙笔到处代为征求群众意見，企圖篡夺党在整風中的領导权。

（5）会上会下故意制造紧張空气，如在第一天会議結束时說"会开的好，我很激动，也很痛心……"在会下說："艺术館和我們能从一句話上暴炸"、"伙房要罢工"、"××地方农民吊打幹部了"，"学生要上街"等。（据其弟張健及林庆瀾、葛翠琳揭發）

（6）据其弟張健来信揭發及本人交代，对北大反党大字报非常贊揚，並鼓励文联同志去看，对一度被資产阶級篡夺方向的文匯报、光明日报等贊揚为"比我們党报、（人民日报）的党性还强"。

2、六月六日下午支部会上他攻击“文联肃反把他搞錯了”，誣蔑“肃反問題是党內宗派主义集中表現”，並猖狂地要求把肃反五人小組紀录在全党公开，为其他被斗爭对象叫屈，要党道歉。会上会下並說他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全国各地都有老上級、老首長，肃反时他在任何一个地方也不会有在北京的遭遇。又說肃反时是教条主义打了他，他不恨同志們，他恨教条主义。”据七月十一日孙毓椿揭發及本人七月十八日会上交代，他在会下向考誠、孙毓椿、林庆瀾、邓友梅、江元鑄等人談历次运动的錯誤（鄂、豫、皖肃反、延安四二年整風、整党如何打人，有的自杀等，……）散布不良影响。

3、長期对党不滿，造謠誣蔑，以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为名，反对党的領导：

（1）六月十一日他在会上發言誣蔑中宣部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要在整風后开展一次大論战，对文艺指导思想作出結論。並誣蔑中宣部是以苏联大学生畢業論文領导文艺，誣蔑中央領导思想是“农民落后的、不要文化的思想反映”。对中央取消創作組的決定不滿。

（2）誣蔑市委有宗派主义，並对某向真同志散播“宗派主义者总不会承認自己是宗派”、“沒經过整風，党內还沒有統一語言，市委还不承認”等謬論。

（3）在六月十一日会上还誣蔑市委对文艺沒有領导，偏听偏信，对宣傳部只抓思想問題不滿。

（4）对市文联党具体領导人田家同志百般攻击，並採取兩面派手法。据其本人交代，历史上一貫对具体領导同志不滿。

（5）从整風开始到反右斗爭中，一再宣揚他的所謂“团結中間群众”，誣蔑党在历次运动中团結中間群众不够，企圖保护右派过关。据本人交代並想提出在全国右派中展开劝說运动，以反对党对右派的斗爭。

4、反动的文艺观点：

（1）否定無产阶級文学成績，同意刘紹棠在市委宣傳会議提出的苏联后二十年不如前二十年，中国后十五年不如前十五年的論点，均誣蔑为“今不如昔”。（据宣傳会議發言及本人七月十八日会上交代）

（2）据江元鑄、邓友梅、高延昌等人揭發，他平时到处販卖胡風理論，毒害同志，如对江元鑄宣揚：“每人写自己都可写成一本書”，强調写英雄人物的缺陷（所謂打机槍和搞破鞋的英雄），写生活中陰暗的东西（如战爭中我軍投敌等），認为不写这些就不眞实，是公式化、教条主义。

（3）喜欢一切作品中反党反領导的因素，鼓动同志們把它夸大描写（据高延昌等人揭發）。

（4）宣傳会議后积極組織刘紹棠、从維熙等右派分子的反党文章在北京文艺上發表，並排斥刊物上發表相声、曲艺作品，企圖拉攏刘紹棠等人。

（5）發表“相信人罢”哲理詩，向党攻击。

三、态度：

整風初期，身为領导成員之一，糾合右派猖狂向党进攻，被撤銷整風領导小組的职务后，交代問題不够徹底，对有些右派（葛翠琳）揭發不够，后态度稍好，基本上低头服罪，表示願意悔改。

根据以上事实支部決議：撤銷党內右派分子張明权党內职务，开除党籍。

中共北京市文联支部
开除右派分子李微含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

李微含，男，三十四岁，陕西盩厔县人，本人成份：学生，家庭出身中农，一九三九年参加工作，一九四一年加入共产党，现任北京市文联編輯部長，党組成員，党支部副書記，整風运动中表現为一般右。

一、主要簡历：

曾在延安抗战剧团任演員，延安边区教育厅文書，土改工作員，北京市文艺处編审科長，北京市文联編輯部長。平时工作尙負責任，但有严重脱离政治傾向，肃反时为五人小組成員，有严重右傾思想及不負責任表現。

二、整風中主要右派言行：

1、六月六日他在会上說："我認为肃反运动是有点扩大化，延安整風时就有扩大化，不过是沒有錯杀人，我們是有斯大林主义的，就是不承認罢了。"

2、在同日会上發言还为肃反中被斗对象叫屈，說文联肃反搞冤枉了一些好人。考誠（国民党員，曾任美軍飞虎队中尉翻譯及国民党师政治部宣傳科少校副科長極右分子）李岳南（与胡風分子徐放关系密切，並参与王亞平反党宗派活动）是思想問題，在肃反中不应当搞，誣蔑領导对施白蕪（反革命分子，極右）职权不够尊重等。还叫喊肃反时依法搜查肃反对象是"侵犯人

权"，"搜查的面太宽，过去我們反对国民党搜查，現在我們也这样鬧"，要中央有"民法"保障人身自由（当时李被分配搜查考誠）。

3、同日会上發言还否定历次运动成績（延安整風，四七年整党、三反、五反、肃反等），攻击党的三級領导（支部、市委、中央）。

4、同日会上發言还誣蔑文联工作是"以党代政"否定党的領导。会下向右派分子張明权說："市委眞瞎眼，派田家来整我們。"（据張明权揭發）

5、整風中以中立派自居，实际倒向右派，如为右派主編向党进攻的大字报"仙人掌"題字。

三、平时表現：

进城以后，政治上逐步蛻化，否定阶級斗爭，反对思想改造，对政治斗爭感到厭倦、消極。把党及党領导的各項政治运动都看成是一批人整一批人，使他不能安安生生过日子，並經常散布这种言論。

四、态度：

初期为整風領导成員之一，大鳴大放中以中立派自居（根据本人在七月三十日支部会的檢討），反右斗爭开始后，斗爭不够积極，对自己所犯錯誤的严重性認識不足，檢討时虽敢于暴露一些問題，認識仍不深刻。根据以上事实，支部决定撤銷党內右派分子李微含党內副書記、开除党籍。

中共北京矿業学院监察委員会关于开除李景春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李景春，男，現年四十岁，山西省繁峙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入伍，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入党，原为北京矿業学院馬列主义教研組主任，党支部書記。

一、主要錯誤事实

（一）整風鳴放期間，严重右傾，同情和支持右派言論，丧失立場。鳴放初期同該組有政治历史問題的助教說："你的問題並不是审幹問題，而是保衛部門的事。"（該人在审幹中已做結論，但有一問題尙需保衛部門繼續审查）結果使党委很被动。

在教研組鳴放会上爾三个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李不但不予反击还附合右派言論說："党委制在行政工作中就不大好，党委制包罗了一切，以党代政，結果使得党外人士有职無权。"

由于一九五六年調整工資时沒有提級对党委不滿，在鳴放会上也符合右派污蔑說："党委某委員連升三級，某党員教授定为三級是院長一人决定"等，在極右分子邱尙周猖狂向党进攻后，李在会下和他握手並說："你眞是个好同志，你眞大胆！"

整風开始，院刊約李写稿並要求写具体些，李說："誰敢提意見，提了意見就受打击，向高校党委彙报的是他們。"（指党委）

他面对三个党委書記說："你們就是培养毒草"同意極右分子邱尙周言論，說吳院長喜欢捧場拍馬，說党委副書記是伪君

子，表里不一，看風駛舵，說党委宣傳部長是只会叫口号。

当数研組几个同志联合向反党集团"卡秋莎"反击失利时，李景春不但不予支持，反認为他們給数研組"丢臉"，要出声明說这几个人不能代表数研組（后来未出）。

李景春身为馬列主义数研組主任，当党受到攻击时，不但不挺身而出，捍衛党的利益；反而幸災乐禍地認为党委没有重視他，在全院反击"卡秋莎"反党集团，党委委員李維統發言时，他說："我們就是傀儡。"

（二）一九五四年来我院后主要錯誤：

惡意地罵領导，罵工友，罵助教，罵同学，罵审判員，罵保姆，凡是与他接触的不合他心意的均受到他当面或背后的謾罵。对領导和群众一貫是态度蛮横粗暴。来院次日即因分配住房大罵管理員，在食堂排队买油餅罵人家是"土匪"，經常罵数研組青年教师是地主資产阶級脑瓜。他和爱人也經常吵架，影响四鄰，他爱人被評为工作模范时，他罵她是"假积極，裝洋蒜"和他爱人离婚时在法院罵审判員，法院給院党委来信反映他与馬列主义教师身份不相称，造成不良影响。为了对他爱人进行报复，向其資产阶級岳父告密，丧失党員应有立場，他写信說："你女兒为了取得党的信任而檢举过你，組織上为此曾进行了很長时期調查"，同时还写道："我被撤掉党委委員，工資也未提級，並受到全体党委向我开展斗爭，都是你女兒誣告所造成的。"

党委指出馬列主义数研組要注意克服驕傲自滿情緒和个人主义，教条主义，以保証教学質量的提高，他在数研組說："他們批評，叫他們講講看！"沒有認真研究貫徹这一精神，並且还說："馬列主义翻来复去就是那几条，就是为人民服务，所以很多老干部不願意搞这行。"

經常在数研組散佈党委偏听偏信小助教，並說："我是傀儡，我說了不算，群众說了算。"实际数研組內任何事不通过他是不行的。

李景春在群众面前任意污蔑咒駡党委和党委的領导同志，出于个人不滿，他說："魏明是打击报复，陈院長是菩薩，吳院長是听魏明的，常委是听三个書記的。"常委無数次对他进行帮助与教育，他都拒絕接受，党委副書記魏明同志不但在思想上給他以帮助，既生活上也給予了很大关怀，而李竟以德报怨，說魏明同志是"党棍子"是"流氓"是以"組織面孔压人"，甚至誣蔑說："魏明同志破坏他的家庭"，並声言要搗毁魏的家。

李景春的这种行为，在群众中造成極为惡劣的影响，並由于他經常肆無忌憚地咒駡党委，也严重損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二、錯誤的根源

李景春自参加革命以来，一貫無組織無紀律，到处和領导对立，工作稍有成績即驕傲自滿，不达个人目的即对党不滿。

参加工作不到一年，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即趁負責人不在办公室私开介紹信去民族革命中学师訓班学習，結業后不服从分配而坚决去延安。在抗大結業后去晋察冀一分区任某部連指导員时由于自高自大犯錯誤受警告撤职处分，李不但不認真檢查自己，反而認为是上級和自己有意为难，而当領导上調他做組織幹事或宣宣幹事时，他都不接受，要去联大学習当新聞記者，認为这个工作可以"不受人气"並認为："共产党內对党員也不过如此，部队是黑暗的"因此借口耳聾体弱而离开了部队。

到地方工作仍然是屡次不服从調动，如省委一九四六年八月調他作貿易工作不去，調張北县当民政科長又不去，一九四九年調作粮庫工作也不去。工作完全从自己所好出發，計較名誉地位，个人服从党这个原則在他身上沒有体现，反而要組織服从他，並且对領导是当面指責或採取自由主义态度，甚至对抗謾駡，对同志之間关系也是唯我独尊，如任連指导員时和营長鬧对抗，任区長时認为区委書記，县長，县委書記領导無能。工作中独断專行，一九四八年随軍支前工作犯錯誤被批評就謾駡政委，

一九五〇年在馬列学院学習还賠人。

李景春入党將近二十年，沒有树立坚强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經不住严重革命考驗。一九四二年对敌斗爭尖銳时，想自杀。想去当老百姓或做小买卖。認为天天工作麻煩的不行，"身体累坏了，人家不要了"，一九四七年整党后政治上消沉不求上进，認为不如当老百姓自由自在。一九五〇年送馬列学院学習，他認为是"組織上卸包袱"和党总是离心离德，三心二意，不是全心全意的为党的事業服务。

三、李景春虽然經过党的長期教育，但沒有通过各項錯誤虛心檢討，認真改造自己，相反背着功臣包袱，严重地發展了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虽然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發生矛盾时也做了些工作，但並未树立坚强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与世界观，在民主革命时期曾兩次政治动搖，产生退坡思想，在整風反右派斗爭中，不但不积極捍衛党的事業，反而同情並鼓励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自己同时也發表一些錯誤言論，严重右傾，丧失立場。由于以上事实說明李景春一貫和党鬧对立，严重無組織無紀律，屢教不改，已丧失一个共产党員应有的品質，为了严肃党紀，純潔党的队伍，于一九五八年元月二十一日院监委会全体通过經党委批准决定开除李景春党籍。

中共北京石油学院委員会
开除右派分子武亞柏党籍决定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

武亞柏、男、三十六岁、河北威县人，破落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区長、县委秘書長、科

長、財經学院总支副書記。現我院党委常委，总务处長。

武亞柏利用党的整風鳴放机会，借以党委常委和总务处長的身份，进行了一系列反党陰謀活动，他和宋明祥、武長坡等結成反党宗派集团，並在幕后出謀定計，来反对党的領导，曾經于鳴放最紧張时候的一个夜晚，武亞柏与宋明祥等在武亞柏家里召开了長达七小时的反党秘密会議，策划向党領导进攻的策略和計划。武亞柏对宋明祥等出大字报反党的行动，叫他們向院長和党委"討令箭"以取得合法，对于宋明祥写文章"整頓作風，改进工作"一文攻击十几个中層幹部是"伤人太多"，太不策略，应把打击目标集中到賈韓、張定一身上。又說宋明祥的理論教研室掌握領导同志的材料不多，叫宋明祥等去总务处校医室等各單位去收集材料，並屬付最好要請有"聖旨"不要武長坡这个大砲去。

武亞柏並批評武長坡写文章攻击杜再生（建校办公室主任）是打錯了目标，因为杜再生对領导也有意見，这一切極为陰險的反党活动，武亞柏虽不否認都是自己做过的事实但他說："这不过是出了几个坏主义"並不能算是反党和幕后指揮。

武亞柏于整風鳴放一开始就想乘机大捞一把，因而他对于党委指示："党員应站稳立場一点表示反对，他認为这是限制党員鳴放，是党委沒有整風決心。在右派分子大肆向党进攻的跡象已經明显的时候，武亞柏持以幸災乐禍的态度，他在党委常委会上再三堅持主張"停課鳴放"。甚至在市委已經指示不得停課之后，武亞柏仍然認为市委指示不一定正确"也不过就是个宋碩"所以他組織服从，認識上保留意見。他在总务处以党的領导的地位提出"喊出去""叫出去"的口号，煽动群众跟随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發动那些对党不滿的人"吐苦水"，以他的亲信分子伙食科副科長赵春蘭，这样一个当过日本皇协軍軍需官的人作为积極分子組織会議来斗争一个工人出身的党員張献林同志，並揚言"非整的开除党籍不可"。在反右派斗爭开始以后，武亞柏一方面在党委会上为其反党集团辯护，掩护宋明祥、武長坡等退

却，一方面又繼續向領导进攻，說党委領导右傾，党的中層幹部右傾，張副院長就是个大右派，他主張："反右派应先从党內中層幹部动手"。但是在他領导的总务建校單位里却一个右派分子也沒有。这就是武亞柏自己所說的："反正整風誰都是按自己的想法和希望来領导的"。这一切表现武亞柏都解釋为："主观动机並不是反党，只是对問題的看法有錯誤"。

武亞柏利用党委常委身份，在党委会坐探情报，把党的反右派斗爭的絕密指示向宋明祥洩露，把校刊登宋明祥反党文章表示歉意的情況透露給宋明祥等，經常窺測領导同志的动态，和宋明祥等分析研究企圖从中制造領导不合达到个人目的，如說：閻院長沒有主見，被他們（指張定一、賈韓及所有中層幹部）包圍了。又說："看样子孙院長和張院長合起来整閻院長了"。又向張成竹挑撥說："党委調你到組織部工作实际是想把你从人事处挤出去"（張任人事科長，曾計划調作組織部副部長）。这一切事实武亞柏都把它解釋为："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

武亞柏的一切反党陰謀与活动都是企圖利用整風整垮党委領导同志，达到个人野心目的，但是武亞柏对这一点仍企圖狡辯，只承認："不过就是反对張定一一个人"。

武亞柏一貫在党內施用陰謀手段搞宗派活动，堅持剝削阶級的立場和思想作風，因而一九四八年整党曾給以留党察看处分。一九五二年武亞柏在原中央財經学院时就和宋明祥、李涉等結成宗派集团来反对党委書記秦穆伯同志，一九五三年来石油学院就抱有个人野心，来院后即大鬧宗派主义，反对領导打击青年幹部，挑选工作，培植个人势力，七屆四中全会文件学習中曾作了表面檢討，但並未改变其反动的地主阶級立場及一套思想作風，因而在鳴放期間就露出了原形。因此，武亞柏是一个在党內長期堅持地主阶級立場，一貫玩弄兩面手法，进行宗派反党活动不接受党的教育的右派野心分子，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員的起碼条件，因而决定清洗出党並建議行政上給予应得的处分。

中共辽宁省衞生厅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匡远鹏的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一日

匡远鹏，男，五十二岁，家庭出身破落地主，本人成分学生，文化程度高中，汉族，籍貫湖北省汉川县第三区，一九三九年六月参加工作，一九二六年曾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便脫离組織，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又重新入党。現任衛生厅副厅長。

本人簡历：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九年：任貿药業，司錢、司票；修防主任，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于延安抗大学習，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八年任制药車間主任，药庄經理，药厂政委，粮食科長，衛生技术厂長兼政委；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三年任东北衛生部財务处長，基建处長、东北工程管理局財务处長；一九五七年五月任現职。

匡在第二次参加革命后，工作表現較好，尙能完成任务，抗战时期、自衛战爭是为党做了些工作，后期表現資产阶級思想逐漸增長，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現均有右傾思想。自調衛生厅后工作表現拖拉，不負責任，很少深入实际硏究問題，並追求資产阶級生活方式。

匡远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反动言行：

1、挑唆王心一（省中医院院長，民革支部書記）为其反革命兒子翻案：于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匡到王心一家中与王談話时說"……你兒子問題（系反革命分子並强姦幼女被判刑，而匡事先是知道的）你老看有什么問題！你兒子管制得不对就告他們！"並以例进一步煽动說："我妻侄在三反时受了寃枉，我就

讓告他們，我亲自給他写呈子。”又說：“我想是劳改队認为他在那里表現不好，不进步，沒有达到劳改目的，人家是不会放的”、“听說你老为了世兄（即王的兒子）这个問題对組織有意見，組織上对世兄这个問題是非常关心，据說統战部長为这个問題亲自写信給法院叫提前釋放”。当此事被揭發后，匡不听組織告誡，复又去找王心一說：“今天的事情鬧的不是小事情，关系到我的政治生命大事，为了此事，我会都不能参加，在高潮之中，反右派之际，不是向你老求情，只要你老說句公道話，請你老秉公处理”。並对何裕丰、宋維乙同志（党員，省中医院副院長）反映匡的材料及党組責成匡写的檢查材料一併交給王心一看了。

2、为妻侄張国賢奔波告狀：張国賢在三反时，因貪污被判七年徒刑，匡当时認为有寃枉，並为此事亲自帶材料找檢察院刘处長进行非法活动，还出庭提意見。后經法院改判为一年，仍以貪污分子論处，匡則以此事到处宣揚。

3、右派分子富大义在大鳴大放时攻击党的肃反政策，初期被划为突出右派言論进行观察，匡是領导小組成員，明知此事，但竟擅自找富大义談話說：“你是我主管科的主要科員，你的發言是不对的。怎么能那样講呢，青年人不可避免，你思想模糊……你要大胆承認錯誤，不要有顧慮，組織上了解你，右派分子是有組織，有計划，有綱領的，你的問題主要是立場不穩，观点模糊，認識不清”。經此次談話后富則大肆宣揚說“我未有什么大不了的問題，組織上了解我”。致使富大义迟迟不作交代，阻碍了反右派斗爭的順利进展。

匡的問題被揭發后，曾召开五次党組扩大会，令其檢查交代，同时进行了批判，但匡的态度不老实，有时威胁，有时拉攏，有时抵賴，並强調动机是好的，一再拖拉时間不作交代，在会后还进行活动，污蔑說：“李厅長对他有意見”。在群众斗爭会上，匡始承認了事实，但仍不承認其动机是有意識的，經群众

摆事实，講道理的严厉批判后，在理正詞严，事实确鑿，無可抵賴的情况下才低头認罪了。

匡远鹏在第二次参加革命后，曾經在工作上一度表現較好，后期因追求資产阶級生活方式墮落到政治变节，挑唆反革命家属翻案告狀，为貪汚分子張国賢奔波告狀，在反右派斗爭中又阻碍反右派斗爭的順利进展。

根据以上事实，匡是一个披着共产党員的外衣，而进行反党反人民的活动。因此当資产阶級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匡成为資产阶級右派向党进攻的內应。据此認定匡是党內的一般右派分子。經支部大会討論一致通过决定开除其党籍（支部全体正式党員四十二名，参加会議三十二名，全体通过）。

中共沈陽市人民委員会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魯坎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魯坎在反右斗爭中已定为極右派分子，並經支部大会和机关党委討論决定开除其党籍。

附：对魯坎的处理意見

魯坎，原名梁振亞，男三十八岁，共产党員，河南省确山县四区陈庄村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沈陽市文化局長、省文联副主任、“处女地”、“芒种”編委。極右分子。

一、主要右派言行：

1、攻击省市委反对党的領导。在省委文艺座談会上以反教条主义为名，攻击省市委領导，說："百花齐放、百家争鳴在我省市貫徹不够，領导上对这个方針的領会和掌握都有問題"接着他还攻击我們党不民主說：去年省党代会上我有个發言，原来写了七千字，去掉二千字，原因有些事不敢說，而在"党的生活上登了我的發言，而把对省市委的批評去掉了"。又說："省市委沒有把它提到日程上来，因此在文艺界有無限的憂慮和阻力，而还沒有很好鳴放起来"。"憂慮和阻力是来自領导上对文艺界不关心不重視和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領导"。"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是三股繩子，而摔在一起又是最可怕"。並向反党分子王化南献策，說王在省委文艺座談会上發言不該抱一种情緒。意思是說这样向党进攻的方法不机智。同时，攻击並誣蔑省市文艺界对"芒种"反党政治傾向的批判。說："文艺界的批評原則性斗争很少是宗派主义情緒"。"我們在批評中間是不平等的，只許一方面講話，不許另一方面講話"。有的刊物只許一方面評論，不許另一方面評論。

2、挑撥党和群众、部門和部門之間的关系，說："民間职業剧团飯都吃不飽，演出沒有剧場怎样提高艺术，党委要認眞加以解决，是可以解决的"。

3、积極支持"芒种"向党进攻。当紙張供应不足，省委决定"芒种"暫时停刊时，他积極爭取"芒种"出刊，"沒紙也好办，可以到市場上購些土紙代替，沒有錢可由文化局挤点，实在不行我們可办个同人刊物"。

在"芒种"第二期上制造毒草——"下乡記"誣蔑和攻击党的高級幹部。

4、挑撥党和积極分子的关系。一九五六年八月在沈陽日报上發表"在大医院就是大医生"一文，攻击医学院附屬医院，煽动和

挑撥医务人員与患者之間的关系。不仅引起了社会上的多方面指責，而且招致医务人員普遍不满，严重地破坏了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

5、正当市文艺界对"芒种"的反党傾向进行批判和斗爭时，魯坎企圖轉移斗爭目标，給辽宁日报写了一封攻击"处女地"和辽宁日报的匿名信。並在信的后面加上小註，惡毒的称辽宁日报为"貴报"。

二、平素的表現和斗爭后的态度

个人主义思想極端濃厚，因級别待遇問題，長期和党抱有不满情緒工作中表現不够深入，脫离群众，只就处理問題比較謹愼。

反党言行被揭發后，起初态度不老实，后来經群众的批判和斗爭，态度較老实，对自己反党言行有一定認識，並做了較詳細的書面交代。但对"芒种"的关系，交代的不够徹底，並尽量摆脫和"芒种"反党集团关系，以便減輕罪过。現已低头認罪，並有悔改表現。

三、处理的意見

根据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原則規定，該人适合第三类情节严重，有悔改表現。处理意見：撤銷原有职务，分配到文化幹校当教員。降五級，由十一級降为十六級。

沈陽市人民委員会整風領导小組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

中共沈陽市人民委員会
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王化南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王化南在反右斗爭中已定为極右派分子，並經支部大会和机关党委討論决定开除其党籍。

附：对極右分子王化南的处理意見

王化南，原名王林瑞，男，三十八岁，高中文化，自由职業出身，共产党員，市文化局副局長，兼市文联主任，極右分子。

一、历史上的主要問題：

在軍队时系正营級，在治病修养时，伪报团級幹部。

二、主要右派言行：

1、借反对教条主义为名，反对党对文艺事業的領导。說：“辽宁地区党的領导对政策領导無力，重視工業輕視文艺……文艺是可有可無的，沒有文艺死不了人，出不了乱子”。“領导上不了解上層建筑对基础的积極作用。”“更多的是教条主义領导，不但挫伤了文艺創作的积極性，也毒害了广大文艺爱好者和讀者的心灵”。和郭虛共同提出八条反党的文艺綱領。誣蔑党只許說好不許說坏，只許写政治題材，不許写兒女情家务事，欢乐歌頌，不要諷刺，抽象的只許写工农兵，不喜欢写工农兵以外的題材……。誣蔑党对文艺領导是一种行政压力。說：“我們市的

工作不好作，是因为省設在市內，工作受到限制”“文艺界不平等，省比市高，大比小高，国营比民营高，老比新高”，演戏派人坐在首長跟前，观看臉色是笑了还是皺眉了这是一种行政压力。

2、抗拒省委决定，指使“芒种”变成反党陣地。因紙張缺乏，省委决定停刊“芒种”，王化南对此不滿，和右派分子郭虛共同上書省委黃書記，提出：辛辣大胆，干預生活等十六字作招牌，發表攻击党的毒草文章。同右派分子郭虛、吳山等人組織反党小集团，进行反党活动。

3、在剧团体制改革的幌子下，取消党对京剧团的領导。

4、反对党所領导的正确的文艺批評。他認为青年人在創作上有問題，也应迁就。主張文学艺术上的問題不应同党員政治生活联系起来。

5、挑撥党与艺人的关系，說党不重視民間艺人，过去曾說民間艺人是“下流人”而在鳴放时，却裝出关心艺人的样子說：民間艺人过着吉普賽人的生活，房子像貧民窟似的，都吃不上飯。”

6、反对私营文化企業社会主义改造。認为私营文化企業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冒进了，公私合营沒有优越性。

三、平时表現与認罪的程度：

1、平时表現

王由軍队轉到地方后，伪造历史功蹟，以“保尔”自居，目無領导，因經常不参加組織生活和少交納党费，被市委通报兩次，他对此不滿，說：“市委看我王化南威信太高了，想往下压一压”。

执行幹部政策任人唯亲，重才輕德；並以私人名义介紹坏分子到剧团工作，經常吹虛並讓别人写文章以个人名义發表。

2、認罪的程度

揭發反党事实之初，是对抗的，認为报上發表批判他的文章是"整人""扣帽子"还狂妄的說："'芒种'既然出了錯誤，那我王化南可以包下来"，之后又推卸責任說："芒种我未管"。在經过大力揭發与批判承認了自己是右派分子，只抽象的作了檢討，对具体罪惡事实不肯徹底交代。無深刻悔罪表現，对自己成为右派不以为然，經常打朴克下象棋，一九五八年元旦，还請右派分子和有严重錯誤的人吃飯。並徹夜的狂欢，对人揚言："不要党票了"。

四、处理意見：

根据中央关于对右派分子处理原則規定，該人适合第三类情节严重，沒有深刻的悔罪表現，本人殘廢，不能参加劳动，处理意見：撤銷原有职务，分配到市圖書館編目录，降六級，由十一級降为十七級。

中共黑龙江省文联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張凡夫党籍問題的決定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張凡夫（原名張夏賢）男，四十岁，家庭成份：破落商人。本人成份：学生。現任黑龙江省文联副主任。一九三九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四〇年参加工作。曾任延安砲兵团文艺幹事，抗大七分校文化教員，延安魯艺美术系学員，張家口內蒙文工团副团長，哈尔濱东北文协文工团团長，东北画报創作部創作員，新聞攝影局美术創作室秘書，人民美术出版社創作室主任，創作員等职。

（一）所犯錯誤的主要事实：

右派分子張凡夫的反党活动分为兩部分，一部分是在一九五六年三月从北京調黑龙江省后，在我省內所散佈的反党言論和反党活动；另部分是在北京积極参与江丰反党集团的反党言行。几个月来經群众揭發之后，經过調查对証，以及对照北京中央美協整風領导小組轉来的大批材料，証明張凡夫这兩部分反党活动确屬事实，現整理如下：

第一部分：在黑龙江的反党言行

1、濫用职权，独断独行，破坏集体領导原則。

張凡夫任省文联副主任期間，处处表現个人高于一切，漠視組織紀律和集体領导原則，他到文联不久，即以“革新者”面貌对文联的一些必要的工作制度加以詆毁，他帶头不按时上下班，並說“文艺幹部是搞創作的，不必死板地遵守什么紀律”由于他的煽动，文联的落后分子和右派分子都逐漸和他靠近，崇拜他个人，相反却和党組織与其他領导人对立；張凡夫並利用学習党的“八大”文件之时，借机分置群众大会以給党团支部提意見为名攻击党支部，結果由于坏分子煽动，形成了訴苦会。張凡夫还不止一次的擅自做主命令“北方”發表江丰反党集团骨幹分子彦涵的木刻和江丰亲信汪志傑的画。当我省举办青年画展时，他以評委身分操縱了会場，並公然排斥政治标准而以“只要好看就是好作品”的观点来評选作品。

2、支持和庇护反党分子，进行反党活动，並拉攏落后分子散佈对党不滿的言論。

張凡夫反对党委批評“新連陞店”並誣蔑說：“文艺处那些人不学無术”对党委对刊物的領导則不滿的說：“什么事省委都干涉，該管的不管，不管的乱管”还对落后分子說：“黑龙江省的領导不重視文艺工作，省委文教部胆子太小。”

張凡夫对文联的反党集团妄圖恢复創作組的不合理要求，除

給以同情和支持，以及出主意外，並向他們以及青年美术工作者散佈謬論說："职業化了如何自由不受限制"並說："我就是鬧出来的"由此更助長了文联反党小集团的反党气焰，当时在美术界鬧职業化的風气很盛，甚至有人提出："宁肯不入党，也要求职業化。"

張凡夫还經常向人們污蔑党在四二年的整風运动，特别对党对他的审查更为不滿，惡意的說："在健康上精神上受到很大損失"。

他还說：他母亲的死和他的胃病是宗派主义造成的。

第二部分：在北京参与江丰反党集团的活动

1、長期以来对党不滿，积極参与江丰反党集团活动，在大鳴大放期間公开向党进攻：

張凡夫和江丰反党集团成員刘迅、彦涵等在历史上关系就較密切，他們長期进行宗派活动，一九五五年張凡夫在油画进修班时就与江丰有思想上的联盟，張凡夫不願調工作离开北京，背后曾發牢騷說："过去幹革命也是积極分子，現在吃不开了，要不是党員的話什么事也不管，專門画，反正幹革命，是不是党員，还不是看有本領沒本領，有許多非党員有本領比咱們还吃得开"又說："如果原来不是党員倒沒有关系，如果原来是党員，那一定要垮得抬不起头，要受到政治上的打击，还是留着这張党票好，不要鬧掉了"但他到哈尔濱之后，与集团成員刘迅、彦涵等並未断过联系，整風开始他馬上回到北京参加了江丰反党集团向党进攻的陽陰活动。

張凡夫参加江丰反党集团召开的四次座談会，在会上極力替江丰辯护說錢俊瑞部長和蔡若虹同志宗派排挤江丰，並說錢部長整江丰是个人私怨，打击报复，由于他这样攻击党的領导同志，使会議倒向江丰那一边。

張凡夫在会外活动也極为猖狂，拉人出席会議为江丰辯护，又鼓吹彦涵等人把矛头指向美协的領导，他提出："打 蛇 先 打

头"的策略，又帮助彦涵从理論上反对党的百花齐放政策，他自己也化名千秋写文章攻击党的繼承和發揚民族遺产的方針。（刊于"美术"六月号题为"想到的几个問題"）另一篇題为"中国画的写生——师法造化"的文章（未發表）同样是歪曲党的国画政策，宣傳虛無主义思想，攻击文化部党組織的。

反右开始后，張凡夫还积極筹划江丰退却，並与集团成員刘迅、彦涵等訂攻守同盟。

2、乘机搞画会（生活画会）抗拒党的百花齐放政策，分裂美术界，与美协分庭抗礼。

生活画会是同人性質，提出取消党的領导，画人自治綱領，草案由張凡夫起草的，后經江丰审閱。張凡夫也是發起人之一，其成員都是对党不满，和党对立的人。

3、張凡夫参与江丰反党集团筹划十月美协改选，篡夺美协領导的陰謀。

江丰反党集团爭取一切力量来結成"反党統一战綫"去年六月間張凡夫找民主人士談过十月文代会进攻的問題。

綜上所述，可見張凡夫确是江丰反党集团的忠实爪牙，去年六月間張凡夫回哈尔濱之后，与集团不断秘密通信，互通反右消息以及筹划如何退却，为了消灭証据，張凡夫已把信件燒毀了。

（二）組織結論及处理意見：

張凡夫極端狂妄自大，他認为"有本領比当党員强""有了技术走遍天下"他的灵魂中浸透資产阶級个人主义腐朽思想，他一向敌視党的領导，唆使落后群众反对領导，挑撥群众与領导关系，說某些領导是"在朝派"而自己是"在野派"，他所反对的"在朝派"就是反对党的領导，他还經常譏諷党的积極分子为表現分子，这都是些極惡毒的言論。

又从他积極参与江丰反党集团猖狂向党进攻的活动中看作为一个共产党員的張凡夫，早已丧失了工人阶級立場，背叛了共产

主义信仰。

在反右斗争中，根据他反党言行的实質确定他为一般右派分子，但他在运动中态度不誠恳，不承認自己是右派分子，只承認是右傾情緒，並含寃的說："將来会有弄清楚問題的时候"这些都充分表示出無悔过之意，群众对他的頑固态度極为憤慨，根据以上事实，經支部大会討論决定开除其党籍；並建議行政上撤銷其一切职务。

中共黑龙江省文化局支部关于开除高云梯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

高云梯（原名高鴻达，曾用名高增进）。男，四十一岁。家庭出身：富农（被斗）。本人成分：教員。河北省任邱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九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高云梯出身于剝削阶級家庭，入党以后，虽經党的長期培养和教育，但沒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剝削阶級的立場。長期以来坚持資产阶級立場，破坏党的集体領导原則，拒絕党的領导和监督，把党的領导和监督看做是对他的束縛。在工作中制造个人崇拜，培植个人势力，把个人放在党之上，把党委託給他領导工作部門当成独立王国。一貫同情、包庇和支持敌对分子。

在大鳴大放期間散布流言蜚語，在群众中煽風点火，誹謗和攻击省委領导，宣揚資产阶級修正主义文艺观点，歪曲"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方針，取消党在戏曲工作中的政治思想領导。

在反右派斗爭中極力包庇右派分子向一及其反党作品"新連升店"，指揮齐齐哈尔文化局康陈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为之出謀

划策，洩露組織机密。墮落成为資产阶級右派。不但已經失掉了作一个共产党員的条件，而且已經同党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为了純潔党的組織，捍衛党的領导，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开除其党籍。

附：关于高云梯的反党言行

高云梯（原名高鴻达，曾用名高增进）。男。四十一岁。家庭出身：富农（被斗）。本人成份：教員，現有文化程度：大学。河北省任邱县人。一九三八年六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九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現任省文化局副局長。

抗日战爭时期，曾担任过游击队的指导員。在延安抗大和中央党校学習过，並在地下工作人員訓練班受过訓，后来东北做地下工作。抗日战爭胜利后，历任县長、民政厅、教育厅副厅長、友协副会長、青委委員、宣傳部秘書、文教厅副厅長、文化处处長、文化局副局長、局長等职（党內曾任文化局党組、党委書記职务）。

在解放初期做开辟工作时（任海倫县長），在对国民党的关系和伪职員的处理上有右傾情緒，並因执行党的集中統一領导不够而被調动工作。在三反五反时，因有右傾情緒，受过口头批評。

高云梯長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对党的重大方針、政策採取了陽奉陰違的态度。凡合乎他心意的就执行一些，不合乎他心意的他就反对或拒絕。他把党的領导和监督，看做是对他的束縛。在工作中制造个人崇拜，培植个人势力，把个人放在党之上，把党委托給他領导的工作部門当成独立王国；同情、支持和包庇反革命分子、胡風分子、右派分子、貪汚分子；洩露組織机密、散布反党言論；在大鳴大放期間，他和一些右派分子及一些具有反党情緒的分子結合在一起，里应外合，利用“新連陞店”

問題，公开向党进攻，並企圖为胡風分子吕琪翻案。参与和支持齐齐哈尔文化局康、陈反党集团的活动，在反右派斗爭深入开展时並为之出謀划策、傳遞消息、訂立攻守同盟、进行頑抗。

抗拒党的領导与监督，違反党的方針、政策和指示

高云梯長期以来，採用兩面派的手法拒絕党的領导和監督。对党的有关方針、政策等重大問題的处理上事先不請示，事后也不报告。如：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方針之后，省委曾指示文化局党組研究討論，並要提出在文化艺术部門貫徹执行这一方針的具体計划。高云梯未認眞执行省委这一指示。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省委同意文化局召开老艺人座談会，並指示要准备好，但高云梯未很好考虑省委的意見，准备的很不好，在会上的报告未認眞准备，只是在开会时很草率的很随便的講了講（其中很多問題提的很不恰当），同时，在他的主持之下，未經省委同意，就把会議改为戏曲工作座談会（实际上参加的人員很不全面）。当省委文教部發現会議中的問題时，曾提出在会議中应注意这样几个問題：一、根据会議的內容和要求及参加会的成員，仍应把会議改为老艺人座談会；二、会議中应講清"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政策的实質；三、要全面貫徹第一次全国剧目工作会議精神；四、应肯定戏曲改革工作的成績和艺人、新文艺工作者的作用；五、应澄清在扩大上演剧目与衡量剧目标准問題上的一些錯誤認識。要求在会議总結中貫徹。高云梯不但不仔細的考虑这些問題，反而極不冷靜的說："你們省委竟挑这些个事，我們还怎么工作？"並說："要講！你們来人講吧！"为了在会議中正确的貫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方針，文教部就派人去作报告，高云梯对此是極不欢迎的，認为文教部提出的几点意見是無足輕重的，是"教条主义"的，不給安排講話时間，后来只給了一个'業余时間'去講了一下。在报告結束后，他只对大家講："天不早了，到睡覚的时候了，大家休息吧！"表示很不滿的样

子。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省委文教部为了檢查"百花齐放，百家争鳴"方針貫徹执行的情况，召开了省直文化艺术部門主要負責幹部开一个座談会，来討論"百花齐放，百家争鳴"方針在各部門执行的情况和存在的問題，以及会后如何更全面的深入的貫徹这一方針，会前早已通知，要求按提綱精神，認真准备。但高云梯即不認真准备、也不积極的反映这方面的情况，对会議採取了消極观望的态度，不經常出席，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了。但，有人批評"新建旅店"是反党文章时，他就大發雷霆說："这是一棒子打死"。当有人提出：在扩大上演剧目之后出现一些坏剧目，应加强領导，組織自由討論，培育香花，批判毒草，他却說："不要大惊小怪的，坏剧目不是今天才出現的，早已存在。"有人提出：把"賞心悅目"、"延年益寿"做为口号提出是錯誤的。他說："狹隘的理解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是有害的"。实际上他对会議上提出的許多方針、政策性的問題都給否定了，並且写文章批駁那些正确的意見，說这是"以行政命令代替自由討論"。

高云梯經常的散布一些流言蜚語来中伤、汚蔑党的領导同志。在他的心目中，凡是按着省委意圖办事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他認为在文教部座談会上陈元直部長的發言是非常教条的，总是按着省委的看法說。他还汚蔑講馬克思主义的人就是"教条主义"，他說："有些人就是光講一段大道理，那好講！拿个具体剧目来試試？"在他看来，做領导很容易，他說："省長，那好当！出門坐汽車，开会时别人給写稿子，到会上一念就行了。"並說"×××就是跟着領导屁股后面跑"。

高云梯身为文化局党組書記，但却目無党紀，破坏党的集体領导原则，拒絕党組織的监督。对省文化局党組規定的制度他不遵行，不按时召开会議。有的党組同志向他提出：是否把局內的主要工作写出报告請示省委，並在党刊上發表，以便于推动工作，高却說："扯那个呢！"在他看来，向上級的請示、报告制

度是可有可無的。省戏曲会演时，在省委統战部召开的艺人座談会上反映出不少問題，省委指示由文化局党組認真研究处理，而高云梯根本未召开党組会进行研究。中央文化部通知把書店管理权下交到省，省分店經理（党員，請求党組討論一次），高說："你要有意見現在就說，以后誰有功夫給你討論那玩艺兒。"有的应由党組集体研究的問題，但却是个人以党組名义处理了事。如：庆安县人民委員会对省文化局处理庆安戏曲演員王少伯問題提出意見，省委轉給文化局之后，文化局党組根本未研究，高个人以党組名义写了个意見（其中有許多意見是錯誤的）發出（未經党組討論，仅个别党組委員傳閱，有人提出意見也未做修改）。在他的心目中，党組已不是保証貫徹党的方針、政策的集体領导的組織和党的堅强領导核心，而是一种可以由他个人随意支配的工具。高云梯兼文化局党委書記，但对党委的重大工作也很少聞問，如改选党委的工作总結，压了半年之久才处理。高云梯对党的基層組織——支部对他的监督極为不滿。支部許多党員对高有意見，准备召开支委扩大会議，对他进行教育，但高認为解决不了問題，拒絕參加。文化局參加省直机关党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会上揭發了他的缺点和錯誤之后，他十分不滿，發脾气，把群众的批評看成为个人报复。他抱怨的說："有的人是費力不討好，有的人就是牌位"。並鬧情緒，發牢騷說："行啦！局長不幹了，明个到黑河去体驗生活，写个剧本也不錯！"。

高云梯从資产阶級右派的立場、观点出發，曲解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正确方針。他不了解也不願意了解，实行这一方針是为了通过自由辯論和自由竞賽的方法来發展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發展社会主义文艺；他以为党会在思想战綫上放棄馬克思主义陣地，对社会主义的文艺不加領导了。他說："向一在'剧目工作一、二、三，一文里講：多数的"一窍不通"的同志，第四季度可以根本不管，專心去看；别怕乱，最糟糕的是不懂还硬管，一管則更乱。'这是我說的，他給發展

了。”因此，他不积極的去組織香花和毒草竞賽，不組織对毒草的批判和鏟鋤毒草的工作，只是片面的强調放。他以为文艺从此可以离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崇高目标，而把揭露和描写人民生活中的陰暗面做为文艺創作的首要任务。高云梯特別强調“写真实”，而他所說的“真实”就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他極力的为反党的文章“新連陞店”辯护，讚揚“新連陞店”大胆的提出了“势力眼”的問題，並說：“‘新連陞店’批評的主要是‘势力眼’，我認为是真实的，是典型的，因此批評是正确的，而且是应該的”。他主張：那里有‘势力眼’，就把‘新連陞店’的招牌給那里掛上。这实际上是把文艺变成攻击、誹謗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他認为：要求戏曲为政治服务，要有思想性、人民性、教育意义，这都是“教条主义”。他反对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这兩个标准的划分。他說：“……使劳动人民工作之余，解除疲劳，茶余酒后，賞心悅目，有延年益寿的作用，这些不是政治意义嗎”，又說：“政治不等于艺术，但有艺术性的作品不等于不能为政治服务”。这实际上是在“政治性和艺术性的統一”的幌子下顚倒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把艺术性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性来代替政治性。他对国营剧团的优越性怀疑。他說：“国营和民营，究竟那种办法好我还不大清楚，他並且主張办个由个人領导的实驗剧团。他認为：“今天的演員流动，是‘百花齐放’后的必然現象。过去对演員是‘买服’，現在是‘买服’不了，‘压服’不住，他就跑。这是新环境中的事物变化，这是合乎發展規律的，‘压服’是不合乎發展規律的，不要把流动看成是大逆不道的”。这实質上是主張放任自流，取消党对戏曲工作的政治思想領导。高云梯这些反党的文艺思想是与無产阶級文艺思想相对立的，是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鳴”方針背道而馳的。

制造个人崇拜，培植个人势力，把个人放在党之上，把党委托給他領导的工作部門当成独立王国

高云梯非常喜欢别人对他的吹捧，自己也經常吹嘘，並以老幹部、老党員、做过地下工作而自驕自傲。他向幹部吹嘘自己过去做地下工作以及在开辟工作时怎样艰苦奋斗，怎样对敌人英勇斗爭，来显示夸耀自己，博取别人对他崇敬，他在工作中很少提到党的領导作用，总是把个人摆在党之上，把党的功績、人民的功績，說成是他个人之功。少年京剧团是經过省委、省人委的同意才保留下来的，而高云梯却把它說成："少年剧团要不叫我'張罗'着，早完了！"省文艺幹校的校舍修建費是由国庫开支的，是根据工作的需要而修建的，但他說："你們艺校要不是我积極主張能盖起这个楼嗎？"党对戏曲艺术、对戏曲艺人的关怀他很少提及，却在戏曲界中树立对他个人的崇拜，把一切好事說成是他办的。他到海倫县視察工作时，該县評剧团的領导和艺人向他"叫苦"（实际上並不比其他剧团苦）。为了树立个人的威信，他就从国务院撥給我省的救济困难艺人的款項中抽出一千元給了海倫剧团；並且說："給你們一千元，作为半月薪的补貼，讓你們好好过个年"。这就給艺人們这样一个印象，似乎只有高云梯才是最关心戏曲艺人的人，而高云梯也常以自己是最熟悉戏曲艺人，最关心戏曲艺人的人"而自居。为了培植他个人的势力，他經常和一些对党不滿的人和犯过錯誤的人，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互相吹捧。文联崔嵐因不够党員条件未能入党，对党不滿时，高对他說："你上我那里去，我帮你解决。"齐市馬守惠（老艺人）入党問題沒解决，高說："在你們那里解决不了，介紹来我們批，快成立党委了"。他極力的介紹右派分子向一入党，党委同志提出反对意見时，他还說："你們为什么不同意，为什么总看向一的缺点"。当党組討論提拔幹部名單，（未經上級批准）他就当面通知了本人，因不够条件而未批准，引起該人

对省委不满，鬧情緒。他並别有用心的要把反党分子康蒙調到省文化局担任办公室主任，把胡風分子魯琪調到艺术舘編刊物。不难看出，他企圖在各个角落上按上他的人，把文化局变成他說了算的一个独立王国。

同情、支持和包庇反革命分子、胡風分子、右派分子、貪污分子

在肃反工作中，高云梯（当时是省委文教口五人小組成員之一）不認真研究和执行党的政策，忽左忽右，对肃反工作有很大的影响。他对党的肃反工作的認識是極端錯誤的。当有时業务工作和肃反工作發生了矛盾时，他說："还他媽扯那个鷄巴蛋呢！总搞肃反，工作就不用幹了！"

博物館的反革命分子谷甫田（曾参与暗杀李兆麟將軍）在肃反中畏罪自杀后，他对谷的安葬問題想的很周到，高告訴博物館秘書說："不要心疼这几个錢，反革命分子是反革命分子，但是已經死了，我們不要在这上小气。"，在谷入殮时，他亲自去給谷抱头，（因别人阻攔未成），他並答应給谷立一塊小碑（因有人反对未成）。

高云梯站在胡風分子魯琪的立場上極力为魯琪辯护。他說："魯琪不是胡風分子，是文艺思想問題"。他認为：把文艺理論上的一些問題都給魯琪扣上了，說："王殿玉等人写的文章就不服人"。魯琪按着胡風集团的骨幹分子徐放的指示精神歪曲地傳达了全国第二次文代大会的精神，高說："这样傳达，已經請示过省委了"。魯琪翻案后，經过調查，証明魯琪确是胡風分子，但高說："这还解决不了問題"，有人問他："为什么？材料不是已經很清楚了嗎？"他說："文章的奥妙就在这里"（意思是說材料不真实）。显然魯琪翻案是不老实的，但高云梯却說："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是危險的，老实不老实那看怎么說，我看魯琪是老实的，我們要求他怎么說呢？人家实事求是嘛，为什么是

不老实呢？"。他主張不开除魯琪党籍，对文艺人应寬一些。並且經常在下面散布对党不滿和中伤同志的言論，說文联批判魯琪是"小題大作"，說："魯琪不一定是胡風分子，硬給瞎按，都是張向凌給搞左啦"。

高云梯和右派分子向一、李浩章是相依为命，並在反右派斗爭当中为右派分子辯解、开脫。高非常贊揚向一的"才华"和李浩章的"鬼才"。剧目工作会議时，庆安評剧团对向一提出許多意見，他不但不耐心的傾听，反而非常不冷靜的說："不要講了！向一做了这么些年的工作，你們还不信任他?！本来庆安就是水淺养不住大魚嘛！"。省評剧团对向一在大鳴大放期間去該团进行点火的言論，提出反对意見时，高反而說："向一的意見是我們共同的意見"。在反右派斗爭开始时高將向一做为积極分子使用，在反右派斗爭要进入高潮时，高却把右派分子向一、李浩章派到杭州去观摩。当省委文教口提出向一的問題时，他非常不滿，气憤地說："我不知道为什么非把向一搞垮不行呢？"。在他的把持之下（当时高是領导小組負責人），文化局整風領导小組沒有开会研究向一的問題，經文教口再三催促才开始研究，在研究时文艺处打电話要派人参加，他說："来吧！讓他們把我們領导完了！"（意思是你們整吧，整錯了你們兜着）。当已經确定向一为右派分子时，他还說："向一这些問題，都是些个艺术上的問題，有許多是全国尚未結論的問題，因此，是不是右派，我还得想想"。並且在下面"放風"說："向一作了許多工作，說他是右派分子我还沒想通。"他並以强調材料的"眞实性"来涣散群众的斗志。当开始批判向一时，他採取了消極抵抗的态度，开支部大会研究向一的材料时，他拒不参加，而在收發室下棋。在大会上他一言不發，並对別人說：我对向一問題不發言，是採取看的态度。"当他知道向一死了的消息之后，說："完了！完了！"非常惋惜，並抱怨的說："滿可以不死！"，說："向一是抱着"新連陞店进棺材了"'。

高云梯非常贊揚叛党变节分子田仲樵。說："田仲樵是一个很能幹的女同志，她在叛党之前对党的貢献是很大的，叛党前的革命經历是可歌可泣的，这样的材料可写作品"。他和田仲樵談話时，对田說："你不要难过，我們都是一样的老同志，將来有你做的工作。当烈士舘决定开除田仲樵时，他还想办法为田安置工作。

肃反期間，文化局支部开大会討論通过了开除貪汚分子潘学义的党籍，高云梯在表决时棄权，並責問支委說："你們支委会研究过沒有？怎么搞的！"。当时貪汚分子潘学义要求重新处理，对党支部非常不滿。

从洩露党內机密、散布反党言論到大鳴大放期間，利用"新連陞店"問題，公开向党进攻

高云梯一直不滿省委对反党文章"新連陞店"提出的批評。他汚蔑省委，說省委对"新連陞店"的批評是"一棒子打死！"是"教条主义"。他在下面指使右派分子李浩章多找些材料。当有人告訴他，向一的文章中許多地方是揑造的，他說"艺术可以夸張嘛！"。他汚蔑"北方"杂志上發表批評"新連陞店"的文章全是跟着領导意圖跑的文章。並汚蔑文联負責同志是"胆小鬼"，是"不学無术連話也学不好"的人。

今年五月高云梯去中央参加会議，听了主席在宣傳工作会上的講話傳达之后，在小組会上他又重新提出了"新連陞店"的問題。並汚蔑省委是"小手小脚"，說"我省沒有鳴、放起来"。

五月省委准备召开宣傳工作会議，为了做好准备工作，先在省直及哈尔濱市的文教單位召开預备会議，他認为时机已到，就利用預备会議文艺組組長的职权，提出"新連陞店"問題公开向党进攻。在会議进行中他用各种方法引导到会人員来討論"新連陞店"的問題，他公开的說："目前的鋒芒应指向一棒子打死的人"。並用威逼的口吻說："裴华、关沫南、梁志强，你們的發

言就是一棒子打死的”，裴华同志說：“那是我个人的意見”，高接着說：“可你是秘書長啊！”接着他就朗誦一首馬雅柯夫斯基的詩，並煽动說：“在苏联可以發表这样的詩，为什么在我們国家內，象“新連陞店”这样的文章却不可以發表呢？”他看見宣傳工作会議，印發的材料上有“新連陞店”就說：“我看也应該把那个材料（指批判“新連陞店”的文章）也印上，交大会討論討論是什么問題。”就这样把火点起来了。預备会議期間，在各个小組里，“新連陞店”問題成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武器。不仅如此，高云梯还通过报社右派分子章丰散布反党言論和汚蔑省委領导同志的讕言。他对章丰說：“省委对‘新連陞店’問題，不但沒有統一認識，省委也沒放手啊！在一次省委扩大会議上欧陽書記說：“新連陞店”想翻案办不到。态度很严厉。”又說：“虽然是讓大家提提意見，但欧陽書記的話已經作了决定。別人还提什么？还敢講什么？”

在大鳴大放期間，省委召开了文艺工作者座談会，高云梯極力为“新連陞店”翻案。他說“說‘新連陞店’是反党，我就不同意”，“說它是毒草也值得研究”，他並且認为过去对“新連陞店”的批判对他的“压力很大”。他曾对別人說：“我看‘新連陞店’还可能是香花呢！”高云梯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並在会后歪曲事实的說：“于部長自己也認为态度不太好了，看样子省委是拉的不那么紧了。”他进一步的想为胡風分子魯琪翻案，在会后他亲自到魯琪家去看望他，並安慰魯琪，說：“不要灰頹，应該多出去走走，交交朋友”。当魯琪向他表示对过去的批判不滿时，高說：“这些問題你不要談了，关于你的問題已有人在省委提过了（指右派分子向一），將来等省委討論吧！”

参与和支持齐齐哈尔市文化局康、陈反党集团的活动；在反右派斗爭深入开展时，並为之出謀划策、傳遞消息、訂立攻守同盟、进行頑抗。

当齐市市委検査市文化局局長康蒙、陈伯元（党員）的工作时，高云梯站在康蒙一边对市委極为不滿。对康、陈的反党活动积極支持。高云梯到齐市工作时，完全听信康、陈的歪曲性的彙报，因此就說市委不重視文化工作，說市委这样搞会把齐市搞成沒有文化的城市，認为市里收回艺术剧院是“一陣風”。还有意的把高衡市長对康蒙、陈伯元的看法都告訴給陈。他認为，康、陈問題是由于过去文艺工作由省管，市里管不着，而現在由市里管了，康、陈等不大听說，因之，市委想整整他們。他在和陈伯元談話时，肆意議論和污蔑市委的領导幹部及参加検査康、陈問題的幹部，說市委常委还有个水平，說方行和李雨之間是“亲信人”，說有的幹部是腿子。他並煽动康、陈說：你們再不就算了，再不就上告，胆小怕事解决不了問題，要告就告到中央。”以后並具体告訴陈伯元到中央找錢部長或中宣部部長談談，都能解决問題。他多次告訴陈要調他到省里工作，省委也要把康蒙調出来。並說：“叫他們整康蒙吧，越整越不好收拾的。”“反正省里派的幹部在那里总是不合意的，讓他們用市里的幹部吧。”他贊揚“康蒙眞行，正义、能堅持”，在这种种言論的煽动和支持下，康、陈反党集团对高倍加崇信，反党思想更加發展，一直到最后抛出三万六千言的反党控告書，在整个康、陈問題处理过程中，康蒙曾將历次問題的材料亲自复写后送交高云梯留存一分，以便为最后翻案之用。

在反右派斗爭已深入开展后的九月下旬时，康蒙为了“摸底”以便于抵制反右派斗爭，曾隐瞞市委，借治病为名秘密到哈市来和高云梯进行了三次密談（在高宿舍中），高云梯告訴康蒙：“中央把控告書批給省委了。但不知是怎么批的，看来很可能交省委解决。但目前省委領导同志都忙于防汛，等汛期过去后，便会着手解决，希望很大。”出主意讓康蒙立即找省委欧陽書記或馮書記等面談，不要怕事。並說：“我在反右派斗爭中無法呀！不好說話。”高称贊康的反党控訴書“你写的材料正在傳

閱，写的有力量”，只是“写的硬点，告得寬点了”並再次污蔑檢查康、陈問題的幹部是“想搞出点成績报功。”他指使康在反右派斗爭中如何被整到身上时，“整你，你給他爭辯，講。”当康告訴他陈伯元到北京可能已按高的意見向中央講了，並写回了密信时，高說：“这信别保存，燒了它，要不然会說成反党集团呢！”他要康欺瞞省委，說自己来哈事已向市長請假未被批准，並囑咐康說：“你和我談的話我不說，你也别說，陈伯元也不会說。”要康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鎮靜，不要顧虑。当康提出对运动不摸底，心里發愁，間高“要斗我怎么办？”高說：“你沒有記录嗎？这次运动我也不摸底，北京王曼碩很好的同志，也打成右派，你看吧！这回先一般，后高級說不上弄多少人呢”！高要康以住医院治病为名逃避斗爭，高說：“反正你有病也不能斗你，你再等兩三个月后，中央快开三中全会了，会改变的。”他告訴康要受得住寃苦，說：“司馬迁到那种情况，还給人民留下了貢獻。”当談到反右派斗爭运动时，高說自己对反右派运动也很發愁，感到撓头，認为这个运动是“先党外，后党內，先克服右傾情緒，又从右傾里找右派，現在才开始往深發展，將来定会清洗一大批”。最后在分别时，康为了和陈訂攻守同盟，要求高从中为他們傳話，而高則鼓励康要以司馬迁为鑑，說“你回去吧，挨着吧，寃枉不怕，做司馬迁吧。”

中共重庆市委直屬机关委員会
关于开除王匡时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

王匡时，男，三十五岁，江苏省灌云县人，地主出身，学生

成分，一九四一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五年入党。曾任陜南均县区委書記，重庆市工会文教部副部長，市委宣傳部理論教育处長、副部長等职。

王匡时是以張文澄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的骨幹。当去年資产阶級右派向党發动猖狂进攻时，他与党內右派分子張文澄、謝予等相互勾結，在阶級敌人面前公开叛党。与社会上右派分子一道，里应外合，瘋狂地向党进攻。

在市委第五次全委扩大小組会上，他与張文澄一唱一合，积極鼓吹鳴放不要領导，並無边無际地开展鳴放。会后又公开反对这次会議的正确結論，汚蔑市委領导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思想不通”，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他公开反对市委关于积極稳重地开展鳴放的正确布署。他还指使謝予四处搜集反面材料，作为逼攻市委和煽風点火的彈葯。与此同时，他默許宣傳部的工作組到工厂去逼迫基層党委鳴放，直接在工人中“放火”。在五月下旬市委召开的文艺、新聞座談会上，他同意和支持右派分子汪﨑关于主張办同人报的惡毒向党进攻的發言，一再称贊右派分子蔡炎在会上的發言“不錯”，並說：今后“要重新認識这些人”。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討論到当时重庆日报的政治方向問題，会后，王匡时向市委書記任白戈同志說：“等人家鬧大民主了恐怕要逼着通”。在反右派斗爭开展后，他还为右派分子賈唯英等辯护，說：“賈唯英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不同，还不是專心想攻垮党”。

王匡时对党的領导，从中央到地方一貫地进行惡毒攻击。他明目張胆地汚蔑党的領袖，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惡毒地說：“斯大林的迷信破除了，但要破除对毛主席的迷信却还不容易”。並認为“东方紅”歌曲“有个人崇拜”，“应不应唱値得考虑”。在組織“八大”文件学習时，他堅决反对处內同志提出在学習中要强調党的領导作用的正确意見，竟在拟定学習計划时，將“加强党的領导”部分篡改为“思想作風”部分。后市委

又明确批示要强調党的領导問題，王匡时有意違背市委这一指示，並借此为題，搜集我們工作中的缺点来攻击党的領导幹部，丑化党的領导。他一再瘋狂地攻击省、市委領导。汚蔑去年初的省委扩大会議与主席精神不符，一再造謠詆毁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同志"皮气不好"。一九五六年市的第一次党代会上，他接受張文澄的指示，非法地到会外去搜集材料，反对市委提出的市委委員候选人。並指使谢予（当时是列席人員）以講师团問題为借口在大会上發言，对市委領导进行攻击。谢予故意歪曲市委書記任白戈同志关于定息問題的正确解釋，瘋狂地攻击市委領导，他却認为谢是"新生力量"，而予以积極支持、鼓励。不仅如此，他还批准谢予投稿"学習杂志"，並在市委第五次扩大会議小組会上公开說"去年支持谢予是有意义的"。

王匡时还利用各种机会，在党內外大量散播修正主义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毒素，他积極宣揚阶級斗爭熄灭論，認为所有制改变后，"阶級之間的兄弟关系代替了剝削关系"，"在思想領域內誰战胜誰的問題已經解决了"。認为"三改"高潮以后，地主摘了帽子，富农也入了社，反革命分子弄清楚了問題，"都敢說話了"，"都成为人民了"，"都是人民內部矛盾了"。說：現在还用阶級斗爭观点看問題"是認識落后于形势"。他反对在幹部、工人群众中宣傳加强党的領导作用，主張"反对馬列主义的人不要馬上开除党籍"。他以資产阶級的立場、观点曲解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認为思想工作也应有統一战綫，对反动思想也要採取"平等"态度。在理論教育中，提倡理論学習就是放思想，取消思想改造的任务，並支持谢予以"百家爭鳴"代替理論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針。企圖取消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取消思想領域內"灭資兴無"的根本任务。他打起反教条主义的幌子来攻击馬列主义，惡毒地說："只有放出来，教条主义（指馬列主义）的江山才坐不稳"。他攻击肃反运动，說"一九五七年春节热鬧是因为沒有搞肃反，人杀得

少”，污蔑肃反时进行的保密大檢查是“違反宪法”。他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主張“党章的基本原则可以爭鳴”，“在党內盲目搞宗派活动的也不应該一脚踢开”。他还汚蔑社会主义社会“到处箍得很紧，不自由”。他主張报紙要监督同級党委，主張多办几家报紙唱对台戏。他汚蔑党所領导的工会是“官办工会”，說“一切都是自上而下”，要工会摆脫党的領导。他攻击党的幹部政策与人事制度，主張开放人事自由市場。他还到处散播汚蔑苏联、破坏国际团結的言論。匈牙利十月反革命事件發生后，苏联第一次出兵他公开汚蔑說：“这与美国出兵朝鮮有何不同”？他还攻击华沙条約，說：“这会給帝国主义制造借口，造成被动”。

王匡时还經常地大量散布流言蜚語，無中生有，造謠汚蔑領导幹部，破坏領导威信。他对所有市委和市人委的負責同志，都进行惡意中伤，把党的幹部政策和幹部提升，形容成是毫無原則的私人拉攏。並公开咒罵市委組織部，說“組織部是党，宣傳部就不是党”，並在团員中散布机关發展党員条件要求高，基層發展党員要求低等，破坏党的团結与統一。

王匡时与張文澄、謝予等相互吹捧，封官許愿，相互支持，策应，在宣傳部門形成反党集团。他們策划在理論教育系統搞“帮口”，搞“陣地”，企圖利用講师团、馬列主义教学研究会等合法組織把全市理論队伍和理論陣地控制起来，成为他們的集团力量和反党工具。並企圖接办重庆日报“理論学習欄”，把市委宣傳部的“学習簡报”办成“学習杂志”，作为他們反党的“陣地”。他还篡改培养理論队伍的無产阶級路綫，而用物質利益、名誉、地位来引誘、拉攏理論教員，企圖把理論队伍引向歧途。

以上情况，已充分說明王匡时是資产阶級在我們党內的代理人，是个資产阶級右派分子，是党的叛徒。他之所以成为右派分子，决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其父王守濤曾当过国民

党区長、团总及日伪汉奸。其堂祖父王斗光是国民党反动党团骨幹，中統特务。解放后王匡时与他們有过通訊联系。他抱着个人野心混入党內，入党后，拒絕党的批評、教育，一直坚持原有立場，沒有得到根本改造，一直表現驕横跋扈，抗上压下。三查三整时被审查过，对此曾流露不滿情緒。他常以"革新者"的面目出現，在党內爭夺个人权力，以实現其卑鄙的資产阶級个人野心的目的。在反右派斗爭开始，态度很不老实，經过群众揭發、批判之后，被迫承認了反党的罪惡事实，开始低头認罪。为了严肃党紀，純潔党的組織，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經党委全体委員会討論，决定开除右派分子王匡时的党籍，並建議撤消其一切职务。

中共云南人民出版社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起的党籍决定

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

王起曾名王彤淼、殷去疾，男，三十三岁，汉族，湖南省衡山县人。家庭出身旧职員，本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相当大学水平。一九四五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轉正。現任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長兼总編輯。

一、历史情况与主要問題：

一九四四年以前讀書。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六年七月先后在国民党伪九十二軍任扫蕩簡报少校編輯、中校編輯主任，他自称是党組織派去做地下工作，現已查証，他曾向联系他的同志彙报过伪軍中的情況，在伪軍中沒有發生什么問題。

一九四六年九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在北京做地下工作，先后

任記者、編輯，受資产阶級报紙影响很深。一九四九年一月北京解放后，曾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担任記者工作。一九四九年八月随四兵团南下进入云南。一九五〇年四月至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新华社云南分社、云南新聞訓練班、云南省新聞出版处、云南人民出版社工作。其中，一九五二年九月至一九五三年三月在省委党校参加整党学習。

历史上的問題是：王起自称一九四二年起做我党地下工作搞学生运动。据調查：魯就証明王起一九四二年並未参加我党地下工作，未接受我党領导，王起說当时与他联系的是党員王文烈。但王文烈証明說：在解放前他自己沒有入党。王文烈是一九五三年才入党的，这段历史看来是王起編造的。

二、平时言行：

王起平时不听組織招呼，对党对領导埋怨、抵触。一九五一年在新聞出版处时，他不服从副处長馬仲明同志的領导。一九五二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成立时，他不服从刘希玲同志領导，还对刘希玲同志进行人身攻击。当时袁勃部長批評他。他說："袁部長要压我，我才不怕，在旧社会我都沒有被压垮。"一九五三年，文教党委派人檢查出版社工作他也很抵触。一九五四年学習七屆四中全会决議时，党对他进行了教育，他則一直不滿，說是人"整"他。肃反中，文化局小口要調出版社同志去做审幹工作，他拒不执行，駡文化局是"座在大机关里来压人"。一九五六年五月参加全国地方出版工作座談会后，他散布說：会議規定的地方出版方針是"是几个負責同志临时凑起来的"。

苏共二十次党代会及波匈事件后，他对党更加进行攻击。一九五六年十月八日，他以"寒玉"笔名写了一篇"讀报杂感"投給人民日报。文章集中攻击了党报和党对党报的領导，並系統完整的宣揚了資产阶級新聞观点，其观点如下：

1.否認党报成績，攻击党报，宣揚資产阶級报紙。

王起否定党报成績，攻击云南日报，說云南日报是不联系群众的“断桥”，是“死水”、“干巴”、“老一套”、“一般化”、“呆板”、“單調”、“沉悶”，是“居高临下的神气”，令人“不能卒讀”，他說云南日报是“象害着流行性感冒”，甚至污蔑說“現在处处有官僚主义”，“报紙正反映了这一現实”。他又說“群众都不願看党报，云南日报是靠‘只此一家’、‘党报’二字吃飯”，在攻击党报的同时，他大肆宣揚資产阶級报紙。說資产阶級报紙是“了解讀者需要”，有“自己的特点”。他認为这正是“我們今天若干报紙領导人考虑不足之处”，他說党报“往往給人以貧乏，單調的感覚，再加上那些官样文章，八股慣气，人云众云，摆杂貨攤，無怪乎有面目可憎之感了。”

2.否認党对党报的領导，反对党报具有党性。

他說：現在报紙的文章、报导，往往只是內部通报、指示……的翻版、改写、解釋和說明。”“充滿唯唯諾諾的声音。”他說今天是：“某个領导同志作过一个报告、或者發表一篇文章或在会議上發言之后，接着便是“体会”、“同意”、“讚成”、“拥护”，傳达下去，再傳达下去，指示下去再指示下去……很少異議。然而事实上有沒有異議呢！不愿意动腦筋独立思考所謂吃現成飯的人，自然不可能有什么異議，官僚主义者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異議！只有附合声和掌声。他說：“对于这种情況，又是不能过多的責备下面的，关鍵还在于領导者”。他一方面把云南日报說成沒有群众声音，一方面又把报紙發表指示、政策、社論、短評及領导者的文章說是“噪声”，是“居高临下的东西”，他諷刺云南日报可以“改名云南政报”。

王起又提出报紙应有“独立思考”，要靠“自己本身力量来博得讀者欢迎”。他攻击云南日报不受人欢迎是“指导思想上所謂的‘稳’字作怪”，他主張报紙要有“声音”，要有“战斗气息”，就应当“少發表点自上而下的議論，以及一些‘官样文

章’。‘应景文章’”，“就必須干預生活，更必須动員群众来干預生活”。他並且用“干預生活”的招牌，歪曲了云南日报对付食品供应的报导，他說人們当时“联想到波兹南事件”，可是云南日报却“採取了沉默态度”，他汚蔑报紙是“有意吹嘘、粉飾”，不是“老老实实正視”。他要求报紙只有“正視他、干預他、解决他！”

3.歪曲“百花齐放，百家争鳴”方針，主張香花毒草齐放，主張唱对台戏。

王起主張：报紙要“大胆、有魄力的允許反面意見存在”，“比如摔跤，如果只允許一个选手在那里耀武揚威，夸說自己的力量，那末有誰相信这眞是一个好选手呢？如果只讓这个选手摔倒另一个看来就不足为道的对手，那末，又怎么可能証明他的本領呢？既然，馬列主义是放諸四海而皆准的眞理，既然我們党的指示、政策等等都是正确的，既然事实上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見等等，我覚得就不妨讓他們出場，不妨減少些附和声、讚揚声”。他說“如果只要把对手隔离开来，不敢公开相見，或者只宣布战果，是不能博得人們眞正的掌声的”。他說“一本好的小說有正面的人物，正确的思想感情，反面的人物或不正确的思想感情。不能說只允許有正面的人物正确的思想感情，而不准許有反面的人物不正确的思想感情”。他說“如果怕‘思想混乱’，那是‘掩耳盜鈴’”。

他不仅主張报紙在內容上要香花毒草齐放，还再三主張多增加些报紙、刊物，以便和党报唱对台戏。

三、鳴放时言行：

一九五七年四月全国宣傳会議后，全国右派分子向党發起进攻，王起的反党活动更为积極。主要活动有：

1.組織、指使一些人（有历史反革命分子和以后揭發出来的右派分子）攻击、反对中央文化部的地方出版方針，反对党对地

方出版事業的領导。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央文化部規定的地方出版社的方針是："应当根据党的方針政策，結合地方实际情况，結合組織和培养当地写作力量，出版以基層幹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同区乡幹部为主要对象的讀物，宣傳馬列主义、普及文化科学知識，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事業，特别是为农業合作化、农業生产服务。一般省的出版社应当面向农村，以教育农民和区乡幹部为主要对象，同时，也还要照顧工人、知識分子、少年兒童和其他人民群众，供給他們优良讀物；也可以出版一些中級的或其他讀物，但应將主要的和大部分的力量放在組織出版通俗讀物方面。"

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央文化部仍然肯定这一方針，並提出"加强和改进地方出版社工作，主要应由地方党政領导机关加强領导"的指示，王起不仅不研究执行，反而召开編輯組長以上幹部开会，說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主观之見，不适用……"王起並且与历史反革命分子張健（后又划为右派分子）合写了一篇"关于当前地方出版工作中的意見"，攻击中央文化部的出版方針。他又在群众中散布："中央文化部的指示不能解决地方出版社的具体問題"，鼓动群众写稿呼吁，如要陈名安（后划为右派）、段希陶（中右）写稿（陈、段二人未写）；又布置和授意編輯秘書晁世新（中右）历史反革命馬达写稿进行攻击中央文化部，文章写好后，並要馬达不要寄往人民日报，他說："如果都投在一起，怕不好，好象是有組織似的。"結果，分别寄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匯报、通俗出版工作等报刊。

他們写的文章，互相呼应，其观点如下：

王起和張健的文章中右派观点有四：第一、他們認为中央文化部規定的地方出版社方針是不符合客观形势的發展，不切合云南实际情况的需要。他說目前农民及区乡幹部是一無錢，二無閒，三不識字。他們主張农民和区乡幹部不能为出版物的主要对

象，合作化为主要内容的書也不能出版。他並且說：按中央文化部規定的地方出版社方針执行，就产生了又缺又濫，因而他認为文化部原規定的方針应加以修改，甚至不要。第二、他們反对中央文化部提出的通俗讀物內容必須正确的意見，認为这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符合。第三、他說对地方出版社的領导，中央文化部是"推"，地方党委是"拖"，他感到云南人民出版社是"孤兒"，是"孤兒院都不收的孤兒"。並且說"如果对这种情况都沒有一点不滿的心情，那除非是麻木了的人"，又說："我經常爭取領导，还被别人乱戴帽子，真是令人气憤極了！"他們反对中央文化部提出的改进和加强地方出版社的工作主要应由地方党政机关加强領导"的正确意見。他們認为中央文化部不召开地方出版工作会議是不能解决多少問題。第四、他汚蔑省委不管民族出版是"大汉族主义的反映"。(王在整風前后，还在群众中主張書籍的兩重性，引导幹部体会書籍的"趣味性"，並提倡向資产阶級出版事業学習，要恢复出版、印刷、發行三位一体，否定向苏联学習的三者分开的經营办法。)

另外，王起授意馬达写的文章中，露骨地篡改了中央文化部的地方出版方針，他們的方針是：第一、改变把农民群众及区乡幹部以外的讀者需要，放在被照顧的方針（即通俗讀物不要出得太多）；第二、改变出版通俗讀物要特别为农業合作化和农業生产服务的方針，代之以出版各种切合工农群众需要的通俗讀物和适合兄弟民族需要的民族文字讀物的方針；第三、要把出版有关云南民族边疆的学术著作文艺著作提到重要的地位；第四、用"肯定地要适当出版其他方面的中高級讀物（包括工具書）及少年兒童讀物的方針"代替了原来的"也可以出版一些中級的或其他方面的讀物的方針"。

王起授意晁世新写的文章中，反对地方党委对出版社的領导，他說："文化部提出要改进和加强地方出版工作主要应由地方党委机关加强領导的'推'，'拖'态度不敢苟同。这不是地方

党政机关所能解决的，只有依靠中央党政机关的重視与关怀才能得到徹底解决”。

2.在机关內点火、煽动：

一九五七年五月时，他在幹部中散布說：“文匯报办的就是好，标題生动能吸引人，內容丰富，不象云南日报死巴巴的。”並拿着报紙向人推荐。又对和銘（反动分子）說：“你格是有顧虑，是不是要找文匯报看看，启發启發。”又在幹部中鼓动說：“出版社还不是有些問題，你們写文章呼吁嘛！”並指使喻翔生（后划为右派）及文艺組的幹部写了一封信給謝政委，說“問題就是要靠輿論解决”。說什么出版社不被党委重視，待遇不如报刊。

对上級党委組織先后派来出版社帮助整風的閻士頤、謝加林兩同志他不仅鬧对立，要挾，質問“为什么要把我們社做重点？”当話剧团和云大右派分子进攻猖狂时，他鬧着要省委書記来出版社，閻士頤解釋謝政委很忙，他則說：“謝政委能去話剧团，为什么不能来出版社？有三个書記，可以抽一个来嘛！”並要領导小組联名写了一封信給謝政委，信中强調問題不解决，出版社就要关門”。他並在領导小組中散布：“領导上派人来，整到后来还不是要我們揩屁股。”“要提意見可以向宣傳部提三天，”“每个运动都是先反右，后反左，挨批評的都是我們！”对党和領导进行污蔑。

在群众中，他則散布說什么：“党員不如团員，团員不如群众。”“党內問題比团內多，团內問題比群众多。”“中央文化部对地方出版社工作的艰苦和具体情况根本不了解。”“我們过去根本沒人管，中央管不着，省委不管，文化局管不了。”“文化局只会要錢，至于出版社死活他們就不管了，我預先声明，發不出工資，来个請愿我是管不了。”“省委宣傳部某領导同志只知道剪剪貼貼的，眞气死人！”又对麗文会說（后划为右派分子）：現在要看到省委一些比較負責的幹部，半年一年都难碰到

一次，要見到是"不容易啊！候門似海"。段希陶說：王起同志这样談要犯錯誤。他說："我又不是胡風分子！怕什么！"

3.最近揭發出，王起怕自身問題被揭露，对一些和他有关連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进行掩护，企圖逃避斗爭。

反右派斗爭在云南开始前，他即指示馬达以編輯部名义要回他們向外投寄的稿件，由馬达收藏不交給組織。

反右派斗爭开始后，开始斗爭喻翔生、張健时，他捏造大口有指示，說右派分子起义的可以保护过关。斗爭張健的过程中，王起还对右派分子張健說："我們的文章是有些問題，不过問題不大，党的領导我們还是肯定了的。"企圖互相包庇，使問題不能被揭露，到处理右派分子时，王起則一再說張健不是反革命。

出版社斗爭右派的后期，要对右派分子的新聞出版观点进行批判时，王起有意避开批判反动的資产阶級新聞出版观点，而且还为反革命分子馬达辯护，說馬达"現在靠攏我們的"，並当积極分子使用，群众有意見，他公然在大会上說："我代表行政宣佈，馬达不是反革命！"当馬达問題非批判不可时，他兩次在会上打断馬达的交待，不讓交待下去。在云南新聞出版界反右派联合斗爭会中則不愿积極參加。

他亲自負責整理出版社內的全部右派观点时，他把新聞观点及与他有关的出版观点全部有意遺漏，沒有整理上去，至使反右斗爭不深不透。

四、斗爭中的态度：

四級幹部会議以前，他一直对党隐瞞，不交代他的反党事实，甚至採取不正派手法，企圖滑过去，四級幹部会提出他的問題后，他則百般抵賴，虽經領导及支部一再帮助、等待，他仍不正視自己的問題。目前經过支部近二十天的帮助，並展开批評和揭發后，他的态度仍很恶劣，不是推說想不起，就是狡辯，甚至耍賴，不做声，有时态度强硬，至今仍未主动交代其主要問題，

要他交代出文章原稿，他則說“沒了！”

以上事实証明王起已墮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为了維护党的利益，保証党的純潔，根据中央規定——右派分子一律开除党籍，經支部大会討論决定，开除右派分子王起的党籍。